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班

博士學位論文

常民如何思考民主？

——臺灣的社會再現研究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Democracy: A Taiwan Study

指導教授：方孝謙 博士

宋文里 博士

研究生：謝政育 撰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七月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謝辭

本論文之所以能完成，首先要感謝的是方孝謙老師，感謝老師在求學期間，一直提供我擔任課程助理與研究助理的機會，並願意擔任我的指導教授。同時也要感謝從碩士時期，就擔任我指導教授的宋文里老師。老師每每在關鍵時刻都能給予提點，讓我茅塞頓開，也感謝老師慷慨允諾擔任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以及不厭其煩地協助我完成最後的修訂工作。

再者，也得感謝擔任口試委員們的柯裕棻老師、曾士榮老師與夏春祥老師。老師們在口試時的批評與建議，都讓本論文能更完整。

當然，也得感謝參與本論文資料收集的匿名受試者與受訪者們，要是沒有你們的慷慨協助，這本論文也是無法完成的。

另外，與我同屆的倚帆、蕙如、鴻嘉、鴻邦和開朗，感謝你們陪我度過這段有說有笑、有苦有樂的政大生活。

除此之外，也得感謝志宏、晉吾和老 B。在我旅居台北的這段時間，你們總是不計回報地在我有困難時伸出援手，這份友誼彌足珍貴。

最後，雖然我的父親已早一步去當天國的子民，但仍感謝我的爸媽在求學的路上一直支持我，這本論文是最該獻給你們的。

2019 年 8 月 27 日于永和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摘要

本研究的具體問題可分為三個面向，其一是關注「民主」概念的意義建構；其二是關注理想的「民主」與真實的「民主」之間的關係；其三是關注理想的民主體制是否可達成？換句話說，本研究即在探究：常民對於「民主」的思考和想法——關於民主的社會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s）——反映了這些人有哪些或隱或顯的過去經驗、理解、和實踐，並導向了他們未來的希望、期待或恐懼？

從內容的層面來看，用最通俗的詞彙來說，社會再現就是社會中常民的「共同知識」或「常識」（common sense），而本文要探究的社會再現乃是從後者的日常知識（everyday knowledge）層面開始，一直到更廣泛的共同知識為止。

本文的研究主旨，乃是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探究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想法與思考，亦即「民主」不只是一種政治體制，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或政治文化，其中必然包含一些難以從政治體制中發現的價值或私領域的面向，這和哲學或思想史的專家角度並不相同，雖然他們的確也指出「民主」概念的繁複性。

由於社會再現的概念本身相當複雜，所以本研究採用質量並用的混合研究方法。研究一為媒體文本的再現，本文以語料庫分析法為主；研究二為使用研究者根據 Osgood 的語意區分技術所設計的「民主語意區分量表」，以探究臺灣民主化相關事件的排序，以及人們對於民主概念所開展出來的語意空間（semantic space），主要想瞭解一般人在面對去脈絡化的概念時所產生的再現；而研究三則為深度訪談，主要想瞭解難以在前兩種研究方法中探知的面向。

研究一的媒體再現，從詞頻分析來看，發現高頻次詞彙可再依語意分為六大類，主要有「地理區域、時間和事件」、「選舉與投票」、「國家、政府、國會與政黨」、「由人民統治」、「人權、法治與規範」、「經濟與媒體」等六類，其中第一類佔絕大多數的比例。從搭配詞分析來看，本研究指出以《聯合報》來說，搭配詞大致符合學者們所認可的「民主」必要要素，但似乎較缺少強調政府的歸責性與公民社會等部分。而《自由時報》中的「民主」之搭配詞似乎更偏向支持人民的權利，但其實也較缺少政府的歸責性。至於關鍵字脈絡分析，研究者發現政治立場不同，確實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再現。比如說：聯合報會有較多規範意涵及批判民進黨與讚揚中國的文章，而自由時報則對社會運動或是基本人權多所倡說，並賦予正面意涵。

研究二語意空間的抽象再現，就「事件排序」來說，青年世代與壯年世代的結果頗為接近，而且都認為「解除戒嚴」和民主最相關，但是年長世代則認為「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比「解除戒嚴」要更來得和「民主」相關，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於「投票」的感受度不同。而「民主語意區分量表」的部分，三個世代的共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識是：民主具有正面意涵，像是有必要的、樂觀的、幸福的等等。而青年世代與壯年世代的共識則偏向人權、正義等與人權有關的保障。其中，有多組詞語的偏向符合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日常知識，這可視為本量表的效度；另外，有少數幾組詞語（像是很硬/很軟、儒家/道家、基督教/佛教）與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日常知識不同，不但可指出在我們談論一個社會對象時，日常知識仍有其限制與無法顯現之處，也同時凸顯了本論文使用語意區分量表的目的，就是打開這些難以被媒體或日常知識所再現的維度。

研究三則為常民對於「民主」的社會再現，可以發現社會再現之發生與改變，主要來自於父母同儕和網路的影響。至於現實中的民主與理想中的民主雖有差異，但後者仍可由制度和人為努力而達成，且兩者都讓人有正面感受而有所期待。此外，與社會再現有關的兩個面向：說與做，展現在「選舉可說、政治不可說」以及「社會運動不可說也不可做」上。而在關於暴力的議題上，通常年長世代會認為暴力就是不應存在，不論是在日常生活或是社會運動中；但是青年世代和壯年世代則會認為要看情況區分，若在權力不均等的情況下，為了要表達自己的意見，可以允許暴力存在。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議題上，不止讓傳統性與現代性碰了頭，也讓「公領域」和「私領域」碰頭，同時也讓「客觀報導」和「個人價值觀」碰頭。最後，則是本研究浮現出一種新的再現，那就是「民主」作為一種人格特質或是互動關係，這可能是因為傳統性與現代性相互碰撞而產生的新再現。

要之，關於民主的再現，對於常民而言，實際上可能關乎好的生活、好的未來，而不僅止於現在。但是媒體再現通常只限於過去與現在，而且也不引導正面意涵或價值，甚至強調其負面意涵。但這同時也顯現出，常民仍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並非對於大眾媒體的內容與價值觀照單全收，也可反過來批判大眾媒體，比如說：對於假新聞就有能力反省。

關鍵字：社會再現、民主、文化心理學、政治心理學

DOI:10.6814/NCCU201901151

Abstract

Recent decades in Taiwan, some people say ‘Democracy cannot be our food,’ or ‘Taiwan has been too democratic.’ This social milieu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olitics.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Moscovici’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how lay people get senses of the term “democracy” was explored. While ‘democracy’ has a long histor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studies of democracy in terms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re relatively a new endeavor. These representations are likely to be constructed, maintained and changed by both implicit and explicit processes.

In order to explore different aspects of lay meanings (or common senses) of democracy, all subjects and interviewee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enerations, meanwhile, representations of democracy were also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 this thesis: media representations, abstract representations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were used to examine, namely, corpus analysis,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and interview.

It was found that in newspapers, the most important terms associated with ’democracy’ were terms abou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uch as election, government and the President. But the results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and interview indicate that ‘democracy’ is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private sphere, ideal future and positive values, which were rarely stated in all newspaper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lay people can think rationally just like experts do in everyday life, and in this sense, they have shown a societal knowledge and are able to criticize and challenge the media.

Keyword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democracy, cultur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目次

第一章 緒論.....1
一、問題意識及研究問題.....1
二、章節安排.....7

第二章 從社會再現到社會再現取向.....9
一、社會心理學的危機.....9
二、文化心理學的興起.....9
三、歐洲社會心理學的誕生.....10
四、轉向「日常生活」與「常識」：Heider 的觀點.....11
五、Schutz 如何分析知識？.....12
六、從知識社會學到常識的社會心理學.....15
七、社會再現之概念根源.....17
八、狹義的「社會再現」與廣義的「社會再現取向」.....21
九、社會再現的運作之處：潛在空間.....23
十、社會再現如何運作？.....25
十一、心理學如何討論民主？.....26
十二、小結.....28

第三章 如何研究「民主」的社會再現.....29
一、民主的意涵：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29
二、漢語文化中的民主意涵.....31
三、社會再現取向的多元研究.....32
四、研究一：報紙的語料庫分析.....34
五、研究二：民主語意區分量表.....36
六、研究三：深度訪談.....38

第四章 媒體如何再現「民主」.....40
一、整體結果.....40
二、語意分類.....43
三、主題變化趨勢.....45
四、「民主」之搭配詞分析.....48
五、「民主」之脈絡分析.....51
六、本章小結.....55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第五章 民主語意區分量表.....57
一、填答者概況說明.....57
二、事件排序分析.....58
三、民主語意區分量表分析.....61
四、本章小結.....67

第六章 民主與再現.....68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68
二、社會再現（的改變）受誰影響？.....69
三、社會再現的變與不變受什麼影響？.....73
四、民主與烏托邦.....75
五、民主作為社會再現的說與做.....77
六、暴力：讓傳統與現代碰頭.....80
七、兩個文化傳統碰頭了，然後呢？.....82
八、小結.....83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85
一、結論.....85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87

參考文獻.....89
附錄一.....98
附錄二.....108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圖目次

圖 3-1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39
圖 4-1 《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新聞語料篇數長條圖.....41
圖 4-2 關於「民主」之新聞各類別百分比長條圖.....46

表目次

表 2-1 知識庫的要素種類.....14
表 4-1《聯合報 U》與《自由時報 L》新聞語料資料篇數統計表.....40
表 4-2 《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前五十個詞頻列表.....43
表 4-3 本研究收集之總語料的語意分類.....45
表 4-4 關於「民主」之新聞各類別與頻率百分比.....45
表 4-5 《聯合報》關於民主之前 25 個搭配詞彙結果.....49
表 4-6 《自由時報》關於民主之前 25 個搭配詞彙結果.....50
表 5-1 填答者概況.....58
表 5-2 三個世代對於歷史事件的排序結果.....59
表 5-3 民主語意區分量表分析結果.....61
表 6-1 受訪者基本資料.....6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第一章 緒論

一、問題意識及研究問題

> 民主超克了「什麼是政治的」與「什麼是經濟的」，並且合併了社會性的、個體與社會的以及文化和歷史的領域——要是不集中精力去瞭解它的話，就如同天文學家漠視新的銀河系一般。（Moscovici, 1991, p. 6）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主要來自於我個人或我這一代人在臺灣所經歷的生命經驗。

對於 70 年代尾端在臺灣出生的我來說，小學時剛好碰到臺灣的解嚴；中學時遇到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所推行的本土化與民主化與野百合學運；大學時期的投票經驗，則剛好見證了臺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同時在正式教育的場域中，臺灣相比於中國，也越來越是討論的焦點。這些切身的經驗，都可讓人感受到臺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所帶來的自由和開放，恰與中國和回歸後的香港形成強烈的對比。且臺灣在 2014 年時，爆發了對於後來的臺灣民主化有重大影響的「太陽花學運」，當時雖然有許多人支持，但同樣地，也有許多人反對。好比說，郭台銘就曾對此評論：「民主對 GDP 沒幫助，不能無限上綱把各種運動當作民主，民主是過程，不是果實，經濟果實才能填飽肚子，民主的動能須化為經濟的成果。」[1]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經濟才是目的，而民主只是手段；再進一步來說，似乎也暗示著，既然經濟才是目的，那麼當目的達成後，作為手段的民主也未必不可丟棄。然而，這種說法與想法，似乎和我所瞭解的公民素養以及所認知的臺灣史，還有吳乃德（2013）所言的臺灣人民前仆後繼，及不斷追求民主化的進程，乃至於全世界追求民主化的發展歷程完全背道而馳。

假若我們和現今施行「社會信用評分」制度的中國、以及仍無法「真普選」的香港相比，在臺灣，個人資訊仍受到法律保護、也不會因此讓自由受到限制；同時，只要是符合法定年齡的公民，不因族群、性別、階級、性傾向等，都享有相同的投票權與被選舉權。這在在都顯示出，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是相對自由且有人權和財產上的保障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制度應該是可以讓社會更好、讓未來更可想像的好東西。那麼，為何有些人會認為民主僅只是經濟發展的手段、乃至於有過度民主之嘆呢？

「民主」作為一個專用術語，在當代的學科建制中，通常是隸屬於政治學的

[1]〈郭台銘：民主不能當飯吃〉（2014 年 5 月 9 日），《中國時報》。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509000782-260102?chdtv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討論範疇，所以我們可先從政治學的討論來看。義大利著名的民主理論學者 Giovanni Sartori（1987, p. 6）開宗明義就說：「我們活在一個混亂的民主（confused democracy）的時代，我們或許可以容忍民主獲得某些意義，但如果民主無所不包，似乎就太超過了」。從歷史觀點來看，民主曾被視為是來自於群眾力量的暴力，實際上是個有負面意涵的「壞詞」，但到了二十世紀之後，似乎搖身一變而成為一個大家趨之若鶩的「好詞」。而且由於民主這個概念本身就有極其長遠的發展歷史，所以基本上可以說是「同名不同義」。這個意思是說，就連學術界本身對「民主」的概念也是眾說紛紜，未必有共識。

以世界的歷史發展情勢來看，根據北美學者 Samuel P. Huntington（2014）的分析，從美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以來，至少已經歷了三波的民主化，以及其間的兩次回潮。再者，若我們把眼光放到歐洲，中歐與東歐的共產主義相繼崩塌，以及對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貶抑，我們也可發現現代國家的民主化、與對於民主價值的追求，似乎也成為一股全球化的浪潮，就連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極力宣稱其具有所謂的「中國式民主」（黃彪, 2014）。不過，正如 Huntington（2014）在前兩波民主化所觀察到的民主回潮，另有其他學者也悲觀地認為：在許多西方國家，當代的民主其實正在退潮，人民不再認為民主是一種好的選擇、或是一帖萬靈丹（Kurlantzick, 2015）。縱使很多人在批評民主的概念，但他們的目的，都是想要讓制度變得更符合他們自身所認為的民主精神，而非走回極權或專制的老路。

上一節簡介了國際間追求民主化的潮起潮落情形，至於本文所關懷的重點：夾在——西方國家所引領的全球化浪潮與鄰近中國之間——的臺灣呢？如果對於「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採取非常寬鬆的定義，亦即由非民主的政治體制轉變為民主的政治體制，通常是指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轉變成為民主體制的過程（Huntington, 2014），那麼臺灣的民主化歷程，我們可以怎麼談論呢？

以較為線性的敘事方式來說的話，應該可以這麼說：1986 年，當時的黨外人士，在國民黨的強烈阻撓與恫嚇下，仍排除萬難成立了「民主進步黨」。而在 1987 年的 7 月 15 日，蔣經國則宣布了解除台澎金馬地區長達 38 年的戒嚴，一般都認為這算是「台灣民主化」的開端。1988 年時，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依法繼任為總統，也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工作。在 1990 年初，李登輝為了連任總統，曾尋求「萬年國會」的支持，但當時國民黨內的外省籍權貴為保障既得利益，因而想利用此機會修憲擴權，反而於 1990 年 3 月 16 日引發了由大學生所發起的「野百合學運」。隨後，李登輝與學運代表們在總統府進行座談，座談結束後，學生們投票表決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結束了為期六天的「野百合學運」。1990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宣誓就職後，為回應「野百合學運」的訴求，召開了「國是會議」，邀請國、民兩黨的領袖來協商以解決重大憲政爭議，並自 1991 年 5 月 1 日起，比解嚴更徹底地終止「動員戡亂」。1996 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象徵對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的肯認和尊

DOI:10.6814/NCCU201901151

重。而在同年的 3 月 23 日，李登輝則再次當選，成為第一任的全民直選總統。至於 2000 年的總統選舉，則由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的陳水扁當選，完成了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第一次因投票而產生的政黨輪替。2007 年，陳水扁在任總統時，也將中正紀念堂廣場牌樓上的「大中至正」四字卸下，而改為「自由廣場」，彰顯和過去的威權政體說再見，以啟動「轉型正義」為目的。

而臺灣在近年來，從 2013 年 7 月 20 日因為洪仲丘事件透過網路的自發性連結而引爆的「白衫軍運動」，以及 2014 年為了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發起的「太陽花學運」，似乎又進入了社會運動的活躍期。可以想見的，社會運動一旦蓬勃發展，原本看似風平浪靜的臺灣社會便開始浮現許多衝突，難免會給人「破壞和諧」、「社會很亂」的印象。也因此許多人就開始發出「臺灣就是太民主了，才會這麼亂」[2]的意見，像是藝人江蕙也曾在臉書上提及「臺灣言論太自由」[3]等字句。這些現象，多少反映了某些臺灣常民的看法或意見。

至於在實際的政治領域，除了產生了許多新的社運團體（如：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公民 1985 行動聯盟、……等等）或是新興政黨（例如：時代力量或是社會民主黨）外；也是在 2014 年，以「白色力量」為競選口號的臺大醫師柯文哲，當選了臺北市的首任無黨籍[4]市長。上任後，因為要跳脫「藍綠惡鬥」的政治現況，因此總是以「進步價值」、「解決問題」為首要處理原則，但也曾發出「過度的言論自由也有併發症」[5]之喟嘆。即便是曾加入民主進步黨的前高雄縣長楊秋興，也曾表示：「過度民主自由會妨礙國家」[6]。姑且不論這些論述想要達到的政治目的為何，這些人的看法，似乎都暗示著臺灣已經太自由、太民主了，所以我們要節制民主和自由。

假若在當代社會，國際間所顯示的大趨勢乃是：民主是可欲的、有值得追求的價值；或即便只是要顯示跟得上時代的時髦口號（好比說：中國共產黨在推行的「中國式民主」也很跟得上時代），那麼，「民主」都應該對於人們有鼓勵性與吸引力才對。但為何許多人的看法並非僅僅如此？易言之，假若民主是善的、好的，那理應不會存在「過度善」，或是「過度好」的問題，但在台灣的我們似乎也常可聽到對於民主的負面意見，如：「民主是為了經濟服務」或是「臺灣已經過度民主」──這些意見有些是來自於名人，但很多就是常民的想法。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的民主指數[7]也指出，臺灣「還不是完整的民主國家」；另者，2018 年美國

---

[2] 吳傳立（2015 年 10 月 3 日）。〈台灣就是太民主了，才會這麼亂？那我們離普世價值還很遠〉，《關鍵評論》。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5821

[3] 〈江蕙一句「台灣言論太自由　鄉民群轟：票賣得好就囂張」〉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50423/597571/

[4] 然而，當時無黨籍的柯文哲在 2019 年 8 月已創立了「臺灣民眾黨」。

[5] 〈柯 P 談言論自由 苗博雅批「太失格」〉（2016 年 4 月 6 日），《自由時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655967

[6] 〈楊秋興驚人語：臺灣過度民主自由阻礙發展〉（2014 年 10 月 27 日），《自由時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142160

[7] 此智庫依據收集到的資料，將國家分為四類：完全民主國家、部分民主國家、混合政權以及威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報告則指出：臺灣目前已是完全自由的國家，但就世界而言，民主似乎正面臨著衰退的危機[8]。雖說兩者結果的測量對象與指標不盡相同，但這些專家論述，隱約也透露出民主本身概念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乃至於這些專家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要之，民主做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好價值，似乎是現代的、工業化的西方社會之共識；然而，不論從常民或傳統知識份子的角度來看，對於具有目前全世界最長戒嚴時期（1949 年到 1987 年）的臺灣來說，似乎未能對此概念有完全的共識。再者，「民主」一詞，雖然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價值，但對其內涵或定義，在經歷至少兩世紀的發展之後，可能仍處於百家爭鳴或莫衷一是的狀態，因此它實際上仍是一個「可爭議的」（contestable）概念。也因此，民主概念所側重的不同面向與當前的實際政治情況之對應，其實都在在影響著我們如何去思考「民主」此概念。

本論文針對以上所述的概念狀況提出問題來進行研究。這個研究的具體問題可分為三個面向，茲分述如下：

其一是關注「民主」概念的意義建構：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台灣人是如何理解「民主」的？這些人彼此之間有何共通或差異之處？而常民和專家以及不同的世代之間又有何差異呢？總的來說，就是想瞭解「民主」對一般人來說是什麼意思？與什麼概念、意象或情感有關？有什麼意義或價值嗎？

其二是關注理想的「民主」與真實的「民主」之間的關係：心目中是否有理想的政治體制，讓人想要去追求的？與目前台灣的政治體制是否有差異？

其三是關注理想的民主體制是否可達成？亦即：根據他們的想法，理想中的民主體制是否為純粹的烏托邦？若不是的話，可以採取什麼行動來達成這個目標？

換句話說，本研究即在探究：這些常民對於「民主」的思考和想法——關於民主的社會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s）——反映了這些人有哪些或隱或顯的過去經驗、理解、和實踐，並導向了他們未來的希望、期待或恐懼（Bauer & Gaskell, 1999）？

從內容的層面來看，用最通俗的詞彙來表示，社會再現就是社會中的「共同知識」或「常識」（common sense）——同一個語詞的兩種譯名帶有極不相同的語義，而本文要探究的社會再現乃是從後者的日常知識（everyday knowledge）層面開始，一直到更廣泛的共同知識為止。

就當代社會而言，不論傳播媒介為紙本、電視或網路，新聞仍是一般社會大眾瞭解世界乃至於想像世界的主要文類。不同於學術期刊，為了能讓一般人都能瞭解，其所使用的語彙應當相當接近日常用語，即便碰到一些專業術語時，也會將其轉化為日常語言以達到傳播效果，或是利用額外解說的方式來加以解釋。因

權國家。評分方式則是根據選舉過程與多元性、政府效能、政治參與、民主政治文化以及公民自由此五大範疇及其下總和的六十個細項，請智庫的專家提出意見、利用各政府的統計資料及「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來綜合評分。而「政治參與」跟「民主政治文化」兩項，是臺灣未能躋身「完全民主國家」的原因。

[8]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8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此，從學術的觀點來看，以新聞為研究對象的新聞學，乃至於更為廣義的傳播學，理應對於日常知識有深入瞭解，然而實際上，我們卻可以發現：日常知識乃至於一般人在私領域中對於相關議題的討論鮮少變成探究重點。至於社會再現取向所探討的「常民」，最簡單的說法即是並非專家或學者的那一群人，比如說，本文討論的議題是「民主」，那麼常民就會是指非政治學者或政治人物的那一群人，但實際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都實踐著所謂民主的程序，像是選舉，或甚至有機會成為民意調查中的受訪者。簡單來說，「常民」的定義是和某領域的專家的相對關係來互相定義的，當我們界定好了某議題的專家之後，其餘的人就可稱為常民。

至於本文所欲探究的「民主」意涵，向來是政治學的研究熱點。但政治學多半從政治哲學或政治思想史來指出「民主」定義的繁複性，乃至於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來討論適合當代社會的測量指標等問題。換句話說，前者乃是討論民主的範疇包含哪些概念，以及不包含哪些概念，後者乃是受到量化研究的影響，討論某個國家或某些人有多麼符合民主或是不符合民主（Bratton, 2010）。至於臺灣的相關研究則可見於中研院的「台灣社會變遷全記錄」網站，尤其是主題六的「政治參與與認同」[9]。然而，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種取向都只將民主視為政治體制的一種，同時也未必關注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實踐民主及彰顯其價值意涵；另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政治心理學家也極少使用質性研究的方法，來探究民主對於一般人的意義，他們多半偏好近似於態度量表的量化研究法來研究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態度，並稱之為「民意調查」（public opinion polling）。回到本文的研究意旨，乃是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10]來探究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想法與思考，亦即「民主」不只是一種政治體制，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或政治文化，其中必然包含一些難以從政治體制中發現的價值或私領域的面向，這和哲學或思想史的專家角度並不相同；另者，「民意調查」往往將其結果視為民意的展現，這種研究技術似乎觸及了一般人的思維內容，但實際上仍是將受測者視為行為主義觀點下「刺激－反應」的行為者、或是更精緻的認知主義觀點下處理訊息的中央運算系統而已；在這些觀點中的民意，也不過是就在那裡（out there）的某件事物，只需等待民意調查學者將其挖掘出來而已。職是之故，政治學或北美傳統[11]的政治心理學雖然對本研究有所啟發，但仍難以觸及本文欲探究的宗旨。

至於同樣關注一般人行為或思考的北美心理學或是北美社會心理學，由於受到實證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影響，多半不關心常識的內容及其社會性。往往將一個人對於社會對象的看法或意見，看成個人信念系統的一個局部面向罷了。尤有甚

---

[9] 相關網址為：
http://www2.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E6%94%BF%E6%B2%BB%E5%8F%83%E8%88%87%E8%88%87%E8%AA%8D%E5%90%8C

[10] 至於什麼是文化心理學的角度，簡單來說，就是從意義詮釋的角度來探究常民的思考與實踐，在本論文第二章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11]之所以特別強調北美，乃是因為本研究所援引的社會再現理論屬於歐洲的（社會）心理學傳統，故其人觀與北美的心理學大相徑庭，詳細的討論可參考 Jos Jaspers(1986)、Willem Doise(1986)或謝政育（2007）。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者，更是將作為信念系統之載體的個人，視為現時現地的一個佔據時空的原子而已，是一個沒有歷史質性（historicity）的人。然而，這是一種非常素樸的人觀（naïve concept of person），因為每個人當下的行動，必定是受到過去的經驗所影響，乃至於對未來也是有所預期的。亦即，人不可能是一種不思考的（un-thinking）中央訊息處理系統，只負責訊息的輸入與輸出而已[12]。

然而在社會科學的其他學門裡，好比說：社會學。由於對於「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關注，再加上現象學的影響，因此除了有研究科學知識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外，還產生了以 Alfred Schutz 為主，關注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平凡思維（mundane thinking）的現象學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換句話說，相較於其他社會科學的學門，社會學可能是比較關注當代常民與常識與現下處境之關係的學門。

根據陳雨君（2010）對於報紙的敘事分析指出，臺灣的「去政治化」現象包含了三個層面：人們對於政治有負面看法（政治很污穢，充滿欺騙、貪腐、教條、……等等）；再者，人們對於政治人物有負面看法（政治人物總是自私自利、工具主義的政客）；最後，則是經濟力量掩蓋一切，重點是讓資本流通，而不是追求更好的價值。對於熟悉臺灣大眾媒體的讀者而言，應對於以上幾個層面不陌生，因為我們的媒體再現往往強調的即是上述幾個層面，而非政治乃至於民主所帶來的好價值。此研究的資料來源，與本論文的研究一類似，皆為臺灣流通的報紙。固然可分析出不同階段的敘事模式，但無法瞭解政治或民主對於一般常民的意義，亦即只關注媒體再現的部分。

另者，何孟樺（2016）的論文指出，臺灣的民主進步黨（下文簡稱為民進黨）之參與者，主要可分為「政治菁英」與「基層群眾」兩大類。然而，後者卻幾乎消失在臺灣民主化的論述中，他們的參與程度不亞於政治菁英們，但終究是沒有臉孔的人。因而，該研究者想要將他們辨識出來，探究他們為何及如何集結和動員，因為什麼樣的信念而參與反對運動，以及民主化對他們而言的意義是什麼。這個研究宗旨的確相當接近於本文的構想，因為所謂的「基層群眾」，確實是臺灣過往的民主化研究所忽略的。不過，相對於「政治菁英」的「基層群眾」，在該研究者的定義中，仍是指參與反對運動的人甚至是組織者，而不是本文所欲探究的芸芸眾生。這樣的常民（lay people）可能只會在家裡讀報紙、看電視或上網，乃至於參與選舉活動，他們縱使對於臺灣民主化有深切的期待，卻也未必會去聽演講或上街頭參與反對運動；即便對於民主有滿肚子的想法，但可能也只會與街坊鄰居閒聊中提及而已，而這些一般人才是本研究所欲關注的研究對象。而這些常民的社會再現，很可能帶有批判乃至於改變前述媒體再現的潛力，這才是本論文所欲開展出來的部分。

要之，本研究的目的是想瞭解：在臺灣，不論基於什麼理由，既然「民主」已經變成公眾的關懷議題，不斷地被思考及討論著，甚至讓局面變得緊張或是引

[12] 某種程度上，這相當接近於傳播學中效果學派的魔彈理論（magic bullet theory）對於閱聽人之預設。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起行動。那麼就內容面而言，「民主」這個概念，在臺灣人的共通感受中，往往和哪些觀念、價值、事件、生活經驗或是故事連結在一起？而凡此種種再現，有其共享的意涵嗎？以及他們如何被產製、轉化或實踐？而就功能面來說，這些再現產生了什麼作用，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作？同時，回過頭來看，這樣的社會再現與媒體再現有何差異？並進而產生批判的潛力？

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第一章以當下臺灣的現況為背景，並從相關學門（傳播學、心理學、社會學）的既有文獻中，指出當我們對於常民思考有興趣之時，舊有的學科觀點有所缺漏之處，包括覺得常識無關緊要、難登大雅之堂；或是把人看成是與歷史無涉的（ahistorical）；或是所謂的民意也不過就是一個在那裡等著被調查技術所發現的某物而已，因此，在這個觀點下，民意測量的問題不是測不到或測不準，而只是測量的技術夠不夠好而已。

而第二章則會進入文獻回顧。首先鋪陳文化心理學的興起背景與關注焦點，接著再討論本論文所援引的理論取向，亦即法國心理學家 Serge Moscovici 於 1961 年[13]所開啟的「社會再現理論」（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此理論雖發軔於 50 年前，但目前仍有許多學者應用此理論來分析新議題，比如說：創意（Glaveanu, 2014）、記得（Wagoner, 2017）、歷史（James H. Liu & Sibley, 2015）、……等等。再者，普遍來說，臺灣的社會科學一向奉北美的學術傳統及議題為主流，而對於歐洲的學術傳統較不瞭解，所以會在該章有較為詳細的介紹。從這個面向來看，社會再現理論仍是新興的（emerging）或另類的（alternative）。Moscovici 和 Hewstone（1983, p. 99）就曾指出：社會再現的原初問題往往是「關於各種科學的常識性想法，其起源為何？當科學從專家們進入到社會時發生了什麼事？」，且 Moscovici（1988）也曾謂：社會再現理論就是想要「闡明人類心理學和當代社會文化問題之間的連結關係」。最後，本研究同時涉及政治（心理）學、傳播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等已建制的學門，而歐洲取向的社會科學理論，往往以論題為中心，而不侷限在某一學門中，好比說：Emile Durkheim 在法國不但是社會學家、也是人類學家；Pierre Bourdieu 雖然受哲學訓練，但其田野研究奠定了後來社會學理論的基礎。是故，本論文以具有跨學科特性的社會再現理論來分析問題，應具有相當的適切性。綜上所述，社會再現理論不但關注科學與常識，還有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同時又具有跨科際的文化研究特質，因此是相當適合用來分析本研究議題的理論取向。

第三章除了先簡介西方學者所討論的「民主」概念外，藉以說明即使在專家的論述中，「民主」一詞的意義仍是難有共識的與不斷變動的，且通常與常民的生活方式或政治文化無涉。再來則為簡介社會再現取向常用的研究方法與設計，

[13] 法文原書名為 *La psychanalyse: Son image et Son Public*，在晚了 15 年後，也就是 1976 年，才被翻譯成英文版的 *Psychoanalysis: Its image and its public* 出版。

DOI:10.6814/NCCU201901151

並會提出本研究所規劃的研究程序與研究架構。在社會再現的研究傳統中，由於 Moscovici 瞭解到再現本身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所以並未偏好某種特定的研究取向或方法，甚至被某些評論者稱之為「方法論上的放任主義（methodological laisser-faire）」（Augoustinos & Walker, 1995, p. 144）。也因此，在此陣營中有人採用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Jodelet, 1991），有人則採用訪談法（Herzlich, 1973b），也有人採用實驗法與量化分析（Abric, 1993），為的是探究再現的不同面向或功能。職是之故，本研究不單獨使用量化或質性研究方法的單一研究設計，而是採用質量並用的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Creswell & Clark, 2010）。首先，從互補的面向來看，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可互相補足彼此的不足之處；再者，相比於只採用質性方法或量化方法，兼容並蓄的研究設計可針對研究問題收集到更豐富的資料；最後，對於研究者來說，混合研究方法乃是務實的（practical）作法，因為研究者可自由選擇所有可能的方法來探究某一問題，而且基本上，我們確實也會同時使用文字與數字來理解與處理問題。

是以，本文的研究程序說明如下：研究一為媒體文本的再現，本文以語料庫分析法為主；研究二使用了研究者根據 Osgood 的語義區分技術所設計的「民主語義區分量表」，以探究臺灣民主化相關事件的排序，以及人們對於民主此概念所開展出來的語義空間（semantic space）。這種量表主要想瞭解一般人在面對去脈絡化的概念時所產生的再現。至於語義空間的概念，會在第三章中有較詳盡的討論。至於研究三則為深度訪談，主要想瞭解常民對於民主的社會再現為何？可探究民主對於受訪者的意義為何？以及具有哪些價值？受訪者可以想像活在一個非民主體制的國家嗎？為什麼？……等等較難在前面兩種研究方法瞭解到的面向。

至於本論文的第四章、第五章與第六章則為上述三個研究的結果呈現與分析。而第七章則為結論，會針對本研究所收集之資料與社會再現理論作綜合評論與分析，並指出本研究的限制與提出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第二章 從社會再現到社會再現取向

Moscovici（2008）最原初的研究乃是關注「精神分析」從專業領域進入法國的社會後，發生了什麼事？這也是他所謂的「由科學進入日常生活的過程」。換句話說，社會再現原本是關注專業知識從專家進入廣大受眾時，知識本身的循環歷程（Bauer & Gaskell, 1999）。然而，後續的許多經驗研究都擴充了原先的「社會再現」意涵，探究健康與疾病的日常概念（Herzlich, 1973a）、瘋狂（Jodelet, 1991）或是死亡（Bradbury, 2012）、……等等，未必是科學或專家知識發展而來的社會再現。亦即，這些研究「不僅環繞在普及化的科學理論而已，也關注廣泛的且具有爭議性的社會現象或文化現象」（Wagner, 1998, p. 299）。而本論文所關注的「民主」，無論是從臺灣的現況或就此概念的發展歷史來看，都算是一種可爭議的文化現象或社會現象，再加上本章所談的諸理論，最後就會綜合成為「社會再現取向」，在本論文中也常簡稱為「社會再現（理論）」。

一、社會心理學的危機

在 1960 與 1970 年代，主流的（北美）社會心理學變成一種僅看重技術性的事業，只關注是否符合科學的判準，而逐漸遠離了學科在早期所具有的承諾，對於壓迫與剝削的解放性，也失去其批判性。因此，興起了所謂「社會心理學的危機」（the crisis in social psychology）之討論，總歸來說，主要可分為三個議題來批判這個危機：偏重個體的認知解釋、採用狹隘且不當的實驗法來理解人類的行動、以及毫不關心更廣大的社會結構（Hepburn, 2003）。為了因應這三個議題的批判，北美與歐洲各自誕生了不同的新領域或新理論，前者乃是文化心理學的興起，後者則是出現了有別於北美社會心理學的歐洲社會心理學。我將會在下兩小節討論這兩個因應的新領域與新理論。

二、文化心理學的興起

承上所言，依我之見，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的興起可視為對於社會心理學之危機的北美因應，我們以下將簡介北美三位重要的文化心理學家作為代表。

芝加哥大學的文化心理學家 Richard A. Shweder（1990）曾在一篇近似宣言的文章中，指出：要瞭解文化心理學是什麼的話，可從它「不是什麼」來瞭解。文化心理學不是預設人類心靈具有同一性（psychic unity of humankind）的普通心理學；文化心理學也不是尋找能引起相異國家受試者有不同反應的刺激或變項之跨文化心理學；同時，文化心理學仍舊不是利用文化內涵來標誌中央訊息處理系統（central processing system）的心理人類學；最後，文化心理學其實也不是不關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注實際心理功能與主觀生活的民族心理學（ethnopsychology）。換句話說，Shweder 認為人類心靈的同一性乃是神話，生活在不同在地文化的人，就會產生不同的心態（mentalities）。相異的在地文化，對於其中的人們會形成相應的實在，所以他們的心理功能必須依賴這個實在來理解。也因此，北美的理論心理學家 John D. Greenwood（1994）就認為可將 Shweder 的文化心理學看成詮釋性社會科學（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的分支。

至於另一位對於文化心理學戮力甚深的北美心理學家 Michael Cole，他認為文化是意義與行動的脈絡，而且是以人造的文物（artifacts）——不論是物質的（如：斧頭、車輛）或是非物質的（如：象徵、語言）——作為中介的，而這些文物不但構成了人們運思的媒介，同時也促進與限制了人們的心理發展。換句話說，文化與心靈是相互交織的。根據 Greenwood（1999）和 Gustav Jahoda（1992）的看法，相較於 Shweder，Cole 更像是一個普遍主義者，想以歷史文化心理學的理論來補充標準化心理學實驗之不足。

另外，發起兩次認知革命的 Jerome Bruner 也可算是北美文化心理學的重要推手之一。他認為心靈不只是訊息處理的工具而已，文化心理學要去探究的是人們如何利用象徵與敘事，對他們的諸種實在（realities）賦予意義。而且這諸種實在是互為主體的（intersubjective），也就是透過社會互動培育出來的，並不是外在的或客觀的（Bruner, 2018）。

總結來說，三位代表性學者側重點或有不同，但是都提到要對人類行動詮釋其意義，而不是對於認知作因果解釋；再者，某種程度上都批判了獨尊實驗法的意識形態；最後，則是個體並非和其環境分離的獨立存在，而是鑲嵌在其中。至於下一節，我將討論北美社會心理學的危機，反而啟發了歐洲社會心理學的興起。

三、歐洲社會心理學的誕生

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北美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恰好給歐洲帶來重新評估社會心理學之本質與價值的契機。

英國社會心理學家 Jos Jaspers（1986）就曾在一篇文章中，開宗明義提及：歐洲在智識上需發展獨立於北美的社會心理學，這種社會心理學需直接關注個體的心理功能與社會歷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這個社會歷程不但形塑了心理功能，同時也被其形塑。

而 Moscovici（2000b）也曾批判北美社會心理學的個體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預設，會將存在的現狀（status quo）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是普世不變的規範，結果反而會強化政治的現狀。但人們其實是他們的行動之產物，而文化也是經由溝通所創造，所以變遷不但是有可能的、也一直在發生中。他認為當代的社會心理學應將集體的作為（collective conduct）放在分析的首位，像是語言現象、與社會有關的想法之影響、意識形態、……等等。也因此，社會心理學不應關注刺激與反應模式下的個體認知，而是要關注由語言和非語言的顯示所構成的象徵行為

DOI:10.6814/NCCU201901151

（symbolic behaviour），他們只有在與共同的意義（common meanings）有關時才能被理解和變得可見（visible）。那麼，我們該從何處著手呢？Moscovici（2000a, p. 237）認為應從常識（common sense）切入，因為「當我們研究常識或是俗民知識（folk knowledge）的時候，其實是在研究將社會或個體連結到他們的文化、語言、熟悉的世界的某物」。

總之，歐洲社會心理學在建立之初，就相當有自覺地要走一條和北美社會心理學不同的路。首先，是關注集體性，而非個體性，亦即主要從社會位置的層級（the positional level）或是意識形態的層級（the ideological level）來分析討論，而非從個體內的層級（the intra-personal level）或是人際間的層級（the inter-personal level）來作分析解釋（Doise, 1986）。再者，關注語言和象徵，而非認知（Jovchelovitch, 2007）。最後，則是將社會心理學教科書中極少提及的日常生活與常識，視為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的一種版本，因此可連結到常民的思考、該群體的歷史與文化（Billig, 1990; Wagner & Hayes, 2005）。以上三點，都是本文所援引的社會再現理論所關注的，所以毫不意外地，許多學者都將社會再現理論視為歐洲社會心理學理論的代表之一[14]（Gough et al., 2013; Hepburn, 2003）。言及此，我認為需重新檢視歐洲社會心理學——尤其是社會再現理論——所關注的「日常生活」與「常識」之概念，所以下一節將討論這兩個被視為理所當然、卻富含文化旨趣的概念。

四、轉向「日常生活」與「常識」：Heider 的觀點

整體來說，雖然諸種社會科學關注的是社會現象、以及發生在與其他人有所關連的世界中之行動，但由於每個學門為自身界定的研究焦點並不相同，以致於對於發生各種行動的基地——亦即，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並非同等重視。在現有的學科分類裡，可能又以人類學及社會學對此議題戮力最深，但是兩者仍有細微差異。早期的人類學較關心的是異文化，亦即關注的是非西方、非現代化的地域，發現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神話是分不開的；然而，社會學從學門創立以來，一向關注研究者當下所處的社會，尤其是現代化、或工業化後的西方國家，因而如社會學家 Jack D. Douglas（1970）所論證：實際上，瞭解日常生活為所有社會學的基礎[15]。

然而，在社會心理學中，雖然早期有些理論觀點確實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概念，

[14] 另一個歐洲社會心理學理論通常是指英國社會心理學家 Henri Tajfel 所開啟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之研究傳統。然而，評論者多半同意社會認同理論仍立基在個體主義上，再加上以實驗室研究為主，所以反而大量地被吸納至北美的社會認知心理學中(Gough, McFadden, & McDonald, 2013)。

[15] 雖然 Douglas 曾提及嚴格遵守 Durkheim 格言的社會學家可能不會同意，因為社會性的（the social）要由社會來解釋。不過，本論文之後所討論的社會再現理論，其概念根源雖然也是來自於 Durkheim，但卻避開了他的社會化約論（social reductionism）。因為在社會再現理論中，個體與社會是相互構成與辯證的，而不是如 Durkheim 所設想的社會相對於個體乃是上下從屬關係，詳細討論可見謝政育(2007)。

DOI:10.6814/NCCU201901151

但就只是拿來用作材料以及當作背景交代而已，並沒有真正去深究它的概念意涵，亦即，日常生活不過就是各種事件發生的場景（scenario）而已（Emiliani & Passini, 2017）。比如說：有位研究者就曾抽樣十二本社會心理學的教科書，發現內文只找到兩次「日常」和「日常知識」，連參照的索引也只出現在三本教科書中。從這個例子大約可以推測，「日常生活」的概念在社會心理學中仍是相當罕見的（Wagner & Hayes, 2005）、或至少是被視為理所當然而無須探討的。

另外，也因為社會心理學家偏好實驗室的操作情境，因此反而形成了實驗室的實在與日常實在的二分對立（dichotomy），使前者變得似乎更具合法性。這情況直至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和社會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s）的研究傳統出現後，才略有改變。因為這兩個研究傳統，都關心日常情境中的人們如何思考及組織社會知識，所以日常生活的概念才重新獲得重視（Emiliani & Passini, 2017）。好比說：以認知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家 Fritz Heider 之素樸心理學（naïve psychology）或稱常識心理學（common sense psychology）為例，他將每個人都視為素樸的科學家（naïve scientist），會不自覺地以常識來推論事物的成因、尋找事件中的因果關係，建立一套和日常生活的行為有關之內隱理論（implicit theory）。因此，界定哪些事件為因、哪些事件為果，就形成一個所謂的歸因（attribution）過程。人們會根據時間上的接近性和事件間的相似性，而把一個原因和結果結合成一個知覺單位；若是有些對象和事件比其他的更容易結合在一起的話，就會形成一個因果單位（Augoustinos & Walker, 1995）。他的理論核心在於區分兩種形式的因果歸因模式：內歸因與外歸因，前者與個人的內在稟賦有關，而後者則與外在於個人的情境力量有關（Hewstone & Augoustinos, 1998）。總而言之，對 Heider 而言，常識的功能是為了作日常事件的因果推論，至於其內容為何，似乎就無關緊要。但下一節所討論的現象學傳統，某種程度上，則是較為注重常識的內容的。

五、Schutz 如何分析知識？

在社會學的研究傳統中，受到現象學家 Edmund Husserl 影響的 Alfred Schutz 及其所開啟的現象學的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學派，應是對日常生活與常識的概念最感興趣、並將其作為研究主題的關鍵取向。首先，以下先簡介 Schutz 對於日常生活的看法。

Schutz（1970, p. 163）曾這樣描述過日常生活的世界：「我日常生活的世界絕不是我私人的世界，而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互為主體的世界，是我與周圍的人共有、由他人經驗和詮釋的這樣一個世界：簡而言之，它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世界」。他對於日常生活的看法，主要承繼自 Husserl 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是一個不摻雜理性與科學知識的普通人所直接經驗的世界，而且，即便現在科學昌明，生活世界仍是人們主要的知識來源。某種程度上，Schutz 所認為的生活世界比 Husserl 超驗性的概念更具體，因為人們是在其中生存並進行各種日常活動的，所以是構成各種社會實在的基礎；再者，它在我們來到世界之前已然存在，所以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是既予的（given），有它自己的歷史；最後，它是以一種有組織的方式呈現給我們的。而既然我們所有的行動都立足於這個社會實在的基礎上，那麼對於社會學家來說，分析日常生活便是他們的首要任務（范會芳, 2009）。

但是我們在理解事物時，心靈不可能如白板一般，每次都得從頭開始，一定會有如詮釋學家 Hans-Georg Gadamer 所謂的定見（prejudice）存在。在我們透過自我反思瞭解自己之前，我們就以某種方式在我們所處的群體中來瞭解自己了（Gadamer, 1975）。換句話說，定見即是理解的前提，不但先於你存在，也讓你的理解成為可能，其中可能有先於經驗的結構，也有某些知識的內容。某種程度上，這相當接近於 Schutz 所謂的知識庫（stock of knowledge），也就是我們儲藏各種經驗與知識內容的地方。從現象學的觀點來看，知識的要素在成為一個真正的被證成的（justified）——亦即，有好理由支持的——信念以前，乃是一個實用上已被確認的事實（a corroborated fact）（Hachour, 2008）。

Schutz 的知識庫主要由基本要素（basic elements）、慣例的知識（routine knowledge）和特定要素（specific elements）所組成（Schutz & Luckmann, 1973; 郭諭陵, 2005），我將會分論如下：

（一）知識庫的組成要素：

1. 基本要素（basic elements）：又可稱為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這種知識並非特殊經驗沉澱的結果，而是「對於所有經驗的限制條件之認識」所組成的。其中，又可分為時間上的限制（先到的事物就優先，發生的事情就是發生了）和身體上的限制（身體即是經驗生活世界之空間安排的條件），以上兩者即是情境的限制。而前述的時空限制，便也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觀經驗結構，我們只能基於空間上、時間上和社會的（與他者有關的）這些安排，去經驗生活世界。這些面向都不關心特定的、具體的、變異的經驗，而是關心生活世界的基本結構，且也不在意識的掌握中，也不成為經驗的核心，但它們卻是形成個人經驗的先決條件。要之，它們完全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無需再被進一步分析，而且還是形成社會實在的基地。
2. 慣例的知識：介於基本知識和特定知識之間，屬於例行的或是習慣的知識，這些知識主要都帶有實務或實用上的目的，用來（有限地）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依 Schutz 的看法，應有三種次類別：第一種知識可稱之為技巧（skills），是和身體運動有關的內化的儀式，而且完全是受限於時空和社會現況的，比如說：走路與表現出某種走路方式；第二種是有用的知識（useful knowledge），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工作領域，我們為了達到目的而使用的某些手段，通常是接合了習慣化的技巧和逐步學來的技巧，亦即有部分是內化的，但也有部分是外化的，好比說：彈鋼琴、騎馬等等；第三種則是秘訣的知識（knowledge of recipes），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是一種與身體脫勾的慣例，它同時牽涉到更複雜的、更明顯的技巧知識和有用的知識之連結，好比說：船員判斷天候、獵人判斷野獸的足跡等等。這類知識是 Schutz 分析知識庫時的重心所在。

3. 特定要素：完全是被匿名的（anonymized）和被主題化的（thematized）知識構成成分。

要之，我們可將上述三類知識庫的要素種類整理如下表 2-1：

表 2-1 知識庫的要素種類（Hachour, 2008）

基本知識	慣例知識	特定知識
內在的要素（形體、天資、能力）	要素能實際使用的網絡	外在的要素（主題化的資料）
完全依附情境	隨情境而變的	與情境無關
主觀的	互為主體的	客觀的
默會的	可說明的	外顯的
視為理所當然	視情況而定的	可疑的

除此之外，Schutz 也提出了四個概念來分析知識庫中的要素，分別是熟悉性（familiarity）、確定性（determination）、相容性（compatibility）和可靠性（credibility）。

4. Schutz 認為知識庫的功用有以下三種（郭諭陵, 2005, pp. 62-63）：

（1） 可作為個體的參考基模與詮釋基模：知識庫就是各種類型化的總和，可以形成一種參考基模，讓我們在面對眼前大部分的實際問題時，都是夠用的，即便它可能充滿不一致性或不透明性。而所謂的詮釋基模，則可以讓我們瞭解自我與他人的行為，並建構意義、甚至可讓我們瞭解行為背後所隱含的意味（implication）。

（2） 可幫助個體預測類型化的行動與後果：在類型化的世界裡，所有的事件都是照章行事的，不會讓人感到不尋常。亦即，基本上只要採取相同的行動，就會得到類似的或相同的結果，也因此，個體便可預期類型化的行動之後果。而這種類型化行動及結果之預測，唯有藉助知識庫才有可能達成。

（3） 可協助人群建立共識：知識庫中若有某些相同的知識要素，就會讓行動者產生視域的共通感，並建立起所謂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本小節討論了 Schutz 的知識組成要素，某種程度上來說，Schutz 著力甚深的慣例知識頗為接近社會再現的內容，以下我將進一步討論知識和常識的社會心理學。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六、從知識社會學到常識的社會心理學

從上一節可知，雖然 Schutz 的知識社會學關注常識，但對他來說，常識的重要性仍是在於它是科學知識的起點。亦即，「所有的科學構念（scientific constructs）終將會取代常識的構念（common sense constructs）」（Markova, 2016, p. 72）。換句話說，常識是長出科學的土壤，科學的知識是從常識而來的，雖則兩者的思考方式的確有所差異；另者，或多或少，也將常識看成是思維的糧草（food for thought）而已。所以即便 Schutz 承襲了現象學的哲學傳統，但其對於常識和科學之間的關連性之看法，反倒相當接近於前面所提的社會認知研究中 Heider 的歸因理論——雖然 Heider 似乎還更進一步暗示了相比於科學知識，常識是較不理性的。

回到社會心理學來看，正如同十九世紀時，法國的社會學家 Durkheim 想要將社會學建立成一門有獨特研究題材——有別於心理事實（psychological facts）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s）——的學科，在 1960 年代，法國的社會心理學家 Moscovici 也有類似的企圖和野心，想將社會心理學發展成一門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學門，以和當時北美崇尚個體主義及實證取向的實驗法，以及採用化約論和缺乏社會性的社會心理學有所區別。好比說，Moscovici（1990c, p. 164）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課題：「對於社會心理學來說，它的特殊問題就是想法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意指人們為何以及如何共享知識，並據此構築了他們的共同實在（common reality）以及他們如何將想法變成實作」。

在這裡，我想為自成一格的學門多作一點說明。在北美的學門框架中，社會心理學一向被視為是心理學中的次學門，亦即是說，它和其他次學門間（比如：發展心理學、認知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等等）基本上共享一套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甚至價值論的典範（paradigm）[16]，僅在研究對象上有所差異而已。但也因其研究對象是社會中的個人，所以通常會被視為是心理學與社會學交叉重疊的領域。從集合的觀點來看，社會心理學就是心理學與社會學的交集之處。而這個交集中，比較靠近心理學的那一端通常會被稱為心理學式的社會心理學（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簡稱 PSP），研究被社會因素或情境所影響的個體；至於比較靠近社會學的那一端，就被稱作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簡稱 SSP），研究的是社會如何被行動者所創造或生產出來。所以即便都被稱為社會心理學，但研究對象和旨趣仍是有所差異，並非單一的獨立自主學門。

然而，在談到當時的社會心理學時，Moscovici（2000b, pp. 106-109）還曾仔細區分出三種社會心理學，茲分論如下：

（一） 分類式的（taxonomic）社會心理學：想從變項的性質來說明個體受到刺

[16] 根據科學哲學家 Thomas Kuhn(2004)的看法：典範就是科學家在實踐時，對這世界所展示的認可與承擔。這些承擔的東西可能包括了概念、理論、儀器、方法論、形上學、價值、範例、……等等，前述種種都從屬於一個更大的脈絡，而這個脈絡也就是典範。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激時的行為。這種心理學不但忽略受試者的的特質，也把社會定義為對象的屬性（property），像是 Carl Hovland 想從來源的社會特徵（像是來源可信度或是論點的次序等等）來研究如何改變人們的態度。簡單來說，就是想瞭解受試者對於不同的刺激之反應有何不同

（二） 區辨式的（differential）社會心理學：是從個體特徵中尋找可供觀察之行為的來源，所以受試者會依據其個體的特徵（認知風格、情緒特徵、動機差異等等）而有所區分，但作為刺激的對象則不作區別。此取向的目的是想探究當人們遇到某一問題或是某一個人時，擁有不同特徵的人的行為模式為何，像是研究成就動機或智力。簡言之，就是想瞭解相異的受試者對於同一刺激有何不同的反應。

（三） 系統性的（systematic）社會心理學：它的研究興趣聚焦在一群人和他們所處的共同環境，由於相互依賴而產生的整體現象。在這裡，自我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因其他主體或對象的介入而被中介。也因此形成一個複雜的三角形結構，因為其中的任一部份，都被其他兩部分所共同決定，好比說：Robert Zajonc 的社會促進、Kurt Lewin 的小團體研究等等。換句話說，不管是刺激或反應、自我與他者，都得經由某個中介來互相定義與調節。

對於前兩種研究對象特質或受試者特徵的社會心理學，Moscovici 都認為貢獻不大，唯有第三種心理學才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而不令人驚訝地，這相當近似於社會再現理論看待主體與客體之關係的觀點。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說明：Moscovici（1993, p. 5）在評論 Durkheim 的理論時，指出「Durkheim 在區分了社會領域（social domain）和心理領域（psychological domain）後，便建立了一個前者比後者更重要的階層系統（hierarchy）」。前者是理性的、神聖的、普遍的、是集體性的縮影，而後者則是非理性的、世俗的、自私自利的、是個體性的展現。對 Moscovici（1990a, p. 386）來說，再現就是處在這兩者的張力間，而這其實也是他認為社會心理學要去研究的基本主題。Moscovici（1976, p. 16）在原著的第二版中，就曾提出「要從社會再現的現象出發，重新來定義社會心理學的問題和概念，堅持它所具有的象徵功能（symbolic function）與建構真實的能力」。

Moscovici 和 Hewstone（1983）曾討論在現代社會裡，科學與常識雖屬兩個不同的領域，但人們日常的談話和互動，卻充滿著來自科學領域的術語，好比說：基因改造食物、風力發電、或是本論文所欲探究的「民主」、……等等；當然，日常交談的內容也可能來自於科學的概念，比如說：當人們在觀賞魔術師的漂浮魔術時，也就是能讓人漂浮在半空中的現象，可以瞭解到這是一個魔術表演，而不是真的有人可以克服「地心引力」。假若你學過物理學，那就會知道「地心引力」的概念；但假若你沒學過物理學，你也能從日常經驗或和別人的交流中，知道「人是不可能漂浮」的這個概念。

亦即，科學和常識之間的關係，並不像 Schutz 所認為的科學脫胎於常識，在當代社會，可能恰恰相反，反而是常識來自於科學。而且，這些常識絕不會是事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態的描述或摹本而已，事實上，它們會因為人們彼此的溝通而生產出來，其表述樣態也和參與其中的人類旨趣有所連結。既然知識傳播並非如 Claude Shannon 和 Warren Weaver 所提出的線性傳播模式（linear model）一般，原本要從 A 傳到 B 的訊息，因為其他因素（噪音/雜訊）的干擾，而歪曲了原本的訊息；那麼，所謂「知識的社會心理學便是關注知識被產出、轉變及投射到社會世界的過程」（Duveen, 2000, p. 2）。至於再現的過程，英國社會心理學家 Martin W. Bauer 和 George Gaskell 曾使用了一連串的動詞來表達：「從科學而來的新常識（社會再現）既非是與質地（quality）有關的歪曲的通俗化（distorted vulgarisation）、也非是和數量（quantity）有關的尊貴知識之簡單傳佈（simple diffusion of dignified knowledge）而已，事實上社會再現是指日常談話與信念，漸漸地被現代科學所取代（displaced）、告知（informed）、變得豐富（enriched）、增強（enhanced）、浸潤（impregnated）和殖民（colonized）」（Bauer & Gaskell, 2008, pp. 335-339）。

再進一步來說，除了少數的例外，大部分的社會科學家都認為常識乃是不科學的，因而對其有所質疑，並貶抑它的價值和反對它。好比說：在回答像是「人為什麼會相愛？」這樣的問題時，社會心理學教授就會殷殷告誡學生，不要以常識作答，而要以實驗證據來作答。放棄以往熟悉的常識並（以實驗證據）超越它，向來就是社會心理學（教科書）的第一條金科玉律（Billig, 1990）。相對於這些反對常識的看法，Moscovici 和 Markova（2000, p. 237）想作的正是「恢復常民思考（common thinking）和普遍知識（common knowledge）的名譽」；從詮釋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常識本身就是一個文化體系，雖然它通常不是整合得很緊密，但是它作為一種思考框架或是思維範疇，卻具有無與倫比的席捲能力。說得更清楚一點，常識就是北美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筆下需要深描（thick describe）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Geertz, 2002）。

另外，Moscovici（2000a, p. 240）還指出日常思維和科學思維不同，「科學思維可以獨立於他的內容，用一種形式化的、數學邏輯的方式來理解它；但是日常思維無法一分為二，它的內容直接影響推理，讓他變得貌似可信的，若非如此，形式就會變得無法理解或無意義」。要之，依 Moscovici 的看法，科學思維中的形式與內容可以相互分離，而不影響我們對他的理解，但日常思維則無法分開兩者，否則我們無從瞭解它的意義。

截至目前為止，我已經說明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再現，而它最普遍的說法即是日常思維（everyday thinking）與常識（common sense）。下一節就會進入它的思想根源。

七、社會再現之概念根源

從學科的角度來看，我們不難在其他鄰近的學門找到與「社會再現」類似[17]

[17] 因為本節著重在「社會再現」此概念的歷史根源，所以這裡的類比只是一種很粗略的說法而已。就理論層次而言，「社會再現」仍舊與上述幾個概念有所差異，無法完全等同。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的概念，好比說：人類學中的神話（myths）、社會學中的慣習（habitus），心理學中的態度（attitudes）等等。從共時性的（synchronic）角度來看，雖然可以藉由比較這些概念的異同，來定位並釐清「社會再現」此一複雜的概念，卻可能看不到觀念本身的轉變之處。不過，如果從思考上之貫時性的（diachronic）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看到觀念本身的發展，以及 Moscovici 是受到哪些人的啟發而開展出他的理論，所以本小節主要採取後者的途徑。

Moscovici（1989）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及：「社會再現」主要的理論來源有法國社會學者 Emile Durkheim、法國人類學家 Lucien Lévy-Bruhl、瑞士心理學家 Jean Piaget、蘇聯心理學家 Lev Vygotsky 和精神分析學家 Sigmund Freud。但本文主要選擇 Durkheim、Piaget 和 Lévy-Bruhl 來說明，因為基本上，我認為這三者算是構成了社會再現理論的主要框架，而且也來自於和社會心理學最鄰近的三個學門，分別是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然而，下文的討論順序並非依照各學者的年代，而是依照其對於 Moscovici 社會再現理論的影響而排序的。以下，我分別討論這三人的理論中和社會再現有關的部分：

1. Durkheim 的集體再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如上一節所述，19 世紀時，Durkheim 在當時為了將社會學變成一門經驗性、有獨立地位的科學，所以提出了「社會事實」（social facts）這個概念。此概念主張我們應像對待事物一般來看待社會事實，意思是說社會事實「外在於」我們的心智及行動者以外，和哲學上所討論的內在於人的觀念、與生俱來的、以及和知覺有關的心理學事實（psychological facts）有所不同。再者，這個社會事實對行動者有「強制性」，因為我們一生下來就在一個既存的社會中，而且單一個體不可能造出一個社會。接下來，他將社會事實粗略地區分成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前者是真實的物質實體，好比說：社會、國家、法律、建築物、人口密度、住宅配置等等；而後者則是現今社會學所謂的規範與價值，Durkheim 當時稱為道德、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或集體再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同時這也是他分析的重心所在。

   Durkheim 所提出的集體意識是指一般社會成員所共有的概念、信仰或再現的整體，個體意識當然也存在，只是專屬於個人、沒有開放性；但某種程度上，集體意識的概念仍過於廣泛及難以捉摸，所以他改用另一個比較容易實際研究的概念，就是集體再現[18]，我們可將它視為集體意識的具體狀態。以現代的術語來說，集體再現就是特定的集體（家庭、職業、宗教、黨派、世代等等）之具有系統性的規範、價值或知識體，它雖然更具體，但仍不能化約至個體再現（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s）。而 Moscovici 正是在這個概念上發展出他的社會再現理論之核心概念，像是英國社會心理學家 Sandra

[18] 參照 Pickering(1999, p. 99)的說法：Durkheim 本人其實未曾替 la réprésentation 這個關鍵概念下過定義。可能是因為在當時的法國，這個概念普遍地被使用，以致於研究者認為沒有定義的必要。因此，依我之見，將集體意識更改成為集體再現，對我們現代的研究者來說，未必讓概念變得更清楚，但是，對於想從事經驗研究的 Durkheim 和其他研究者來說，確實更有方法論上的便利性。

DOI:10.6814/NCCU201901151

Jovchelovitch 就評論到：社會再現理論就是 Durkheim 知識社會學所轉變而來的社會心理學（Jovchelovitch, 2007, p. 51）。

然而，Moscovici 並未沿用集體的（collective）這個形容詞，反而改用社會的（social）。這是因為 Durkheim 的研究對象是原初社會，而 Moscovici 關注的是現代社會，相比於前者，更為分化、開放與複雜，幾乎很難找到固有的集體性，故而他選用社會的（social）前綴；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集體再現可能也是當代社會中，相應於某些社會集體（好比說：臺灣的例子可能是新興宗教）的一種社會再現。這樣一來，一方面可避開 Durkheim 社會學理論中集體與個體的二元對立；再者，他認為再現的概念要單獨用來研究與特定的知識或信念有關的範疇；最後，則是要將社會再現視為當代社會的標誌，一種與慣例有關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之產物（Serge Moscovici, 1984a, p. 954）。雖然 Durkheim 藉由集體再現把知識和社會拉上關係，但是再現對於他來說，似乎只是一個觀念，而非理論化的概念，也不關注再現的歷程等等。相反地，同樣關注再現的發展心理學家 Piaget 則嘗試將它理論化，我們下一節將會介紹他的理論。

2. Piaget 所關注的兒童如何再現世界：與 Durkheim 強制性的集體再現相反，Piaget 從兒童的觀察中發現再現的創造性面向（creative aspect of representations），亦即「當兒童再現這個世界的時候，牽涉到一個他要再次創造（reinvent）先於他的這個世界的過程」，因而再現是有社會發生（sociogenesis）和本體發生（ontogenesis）的性質（Jovchelovitch, 2007, p. 58）。「前者是指社會再現產生（generate）的過程；而後者則指個體重構社會再現，並藉此讓他們得以闡述特定的社會認同之過程」（Duveen & Lloyd, 1990, pp. 6-7）。要之，再現本身是產生而來的，而且會轉變。

而 Piaget 藉由和兒童聊天（或稱訪談）來瞭解他們如何認識世界，其聊天內容很多都和民間傳說、常識或知識有關，比如說：問兒童覺得夢從哪裡來？你覺得夢是從我們自己、還是外面來的？我們是用什麼東西作夢？……等等（Miller, 2008, p. 31）。換句話說，Piaget 也關注到再現中和常識有關的部分。

最後，Piaget 曾把結構定義為一套轉換的系統，藉由同化（assimilation）與調適（accommodation）這兩個不斷變動的過程，來調節兒童自身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前者是指有機體將外在環境的因素，整合至自己的知識架構中之歷程，亦即用自己的基模來解釋外界現象與活動；而後者則是指有機體改變自己的內在結構來應付環境之過程，亦即為了適應外在現實世界而調整、修正自己的基模。當這兩個歷程——同化（assimilation）與調適（accommodation）——能達到調和或平衡（equilibrium）[19]的時候，也就是能夠保持結構的穩定狀態而接受或適應外在環境的時候，依 Piaget 的看法，就是他的個體適應完

[19] 正因為此種近似於「正—反—合」的辯證關係，也使得一些學者認為 Piaget 的發展理論和 Marxism 有類同之處(Duveen, 2001)。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成了。而且，對 Piaget 來說，所謂的發展並不是量變（quantitative changes），而是質變（qualitative changes），是從上一階段往下一階段發展，亦即從非科學性的思考到科學性的思考，在他的心理學中，即是指從兒童發展成為成人（Miller, 2008）。

然而，Moscovici 的社會再現理論雖然有兩個和同化（assimilation）、調適（accommodation）可作類比的運作過程，亦即淀錨（anchoring）和具體化（objectification），但是他並不認為理性要朝向唯一的方向發展，比如說：必然得從兒童發展到成人或是從原初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事實上，理性具有多元性（plurality）。而這在 Lévy-Bruhl 的研究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所以我們下一節就討論他的人類學理論。

3. Lévy-Bruhl 的人類學：Durkheim 本身是以相當抽象的方式，在處理集體與個人的對張問題、以及宗教和科學間的連續性，若我們想要具體地探索這個議題，那就應該注意不同集體再現間的差異性而非相似性。與 Durkheim 同年代的 Lévy-Bruhl 就採用了更為具體的、並可進行實質比較的人類學資料來處理這些議題。

對於再現，他有四個堅持，茲根據 Moscovici 的看法，分述如下（Moscovici, 1998, pp. 132-134）：

1. 具有整體性的（holistic）特徵，也就是說，我們無法把某個單獨的信念或類別看成是某個個體或群體固有的屬性。再現的整體論指出，每個想法和信念都依賴於它與其他想法和信念的連結。因此，初民的想法對我們來說，若將它當成一個獨立的事實看待，或許會覺得奇怪，但假若將它看成某些想法或行為模式的一部份，那就變得有意義了。
2. 再現不只是智識上的（intellectual）或是認知上的（cognitive），實際上，它會和情感等要素連結在一起。所有存留和活在社會中的象徵，都同時遵守著理性和情感的邏輯。好比說：當你歧視一個群體時，你不只表達了你對於此範疇的偏見，也表達了和這個範疇緊密連結的蔑視。Moscovici 就認為這適用於任何社會，而不只是初民社會而已。
3. 再現不但是一個意象（image），也是一個被想像事物（the thing imaged）的肌理（texture），亦即它不僅向我們顯現了事物的可見性，也讓我們得以觸及從事物本身看不到的面向，亦即讓事物可見或可理解的呈現背景或脈絡。也因此，我們應該去關注語言或行為的最瑣碎之處，藉以發現他們的功效和意義。
4. 所有的集體再現都有相同的一致性和價值。他指出原始心態（primitive mentality）與現代心態或科學心態（modern or scientific mentality）之間有質的差異，亦即存在不連續性。但兩者同樣複雜與發展完備，各自具有和它們的集體再現相應的範疇、以及能和外在世界產生關聯的想像方式，並無優劣或前後之別。所以，這應視為兩種不同的理性。正是奠基在這個觀點上，Moscovici 研究精神分析從學院進入到日常生活後的社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會再現，並不是單純的通俗化（vulgarization）或扭曲（distortion），而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建構出來的思考，所以具有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性質，無法化約至其他種思維形式。

總之，從觀念總是不斷發展的觀點來看，Moscovici 的社會再現理論是從 Durkheim 的集體再現獲得啟發，關注再現（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再借助 Piaget 的分析，將再現的概念理論化，並指出再現所具有的動態歷程；最後，則是從 Lévy-Bruhl 的人類學討論中，找到支持多元心態（mentalities）的基礎。更進一步來說，Moscovici 認為日常思維不必然得和科學思維相互比較，因為理性思考不是專屬於知識份子或科學家，事實上常民也能夠理性地思考。從法國社會對於精神分析的再現，Moscovici（2008）發現在再現的領域中，同一個群體或是同一個人都可能會共同存在（coexist）許多種思維方式或推理方式，即便它們本身是互相矛盾的，這個概念被他稱之為認知多相性（cognitive polyphasia）。這個概念用來強調認知並非線性地發展，而是具有可塑性與對於情境敏感的。我們對於某個社會對象或文化對象的理解，事實上混雜了各種不同形式的知識，好比說：居住在英國的中國移民，對於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同時包含了傳統的中醫（食物有分冷性的、溫性的和熱性的，可用來維持健康與預防疾病，並可用來去除疾病的根源，所以效果緩慢）與西方的生物醫學（遇到急性疼痛或是有生命威脅的疾病時，就會去尋求相關的治療），兩者並行不悖（Gervais & Jovchelovitch, 1998）。

準此，以下我將會直接進入社會再現的定義及其理論的介紹。

八、狹義的「社會再現」與廣義的「社會再現取向」

社會再現理論的開發和運用，具有從狹義發展為廣義的理論情態。我們首先要知道這個理論的奠基概念，即「會思考的社會」（thinking society）。雖然只有動物和人類具有思考和意向的能力，但是在譬喻的面向上，社會彷彿也是會思考的。好比說，英國的人類學家 Mary Douglas（1986）就奠基在 Durkheim 和波蘭科學哲學家 Ludwik Fleck 的認知社會學上，指出制度（institutions）常用的機制（mechanism）就是類比（analogy），制度會藉此來控制不確定性，並協調行為。所以 Moscovici（1984b, pp. 15-16）使用了「社會是會思考的」（thinking society）這個隱喻，來同時強調思考本身就是社會性的、以及社會生活中思考的重要性。但至於為什麼強調「會思考的社會」這個隱喻呢？Moscovici 認為可先從兩種認為社會是不會思考的觀點來討論。首先，是心理學家所認為的訊息處理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觀點，他們認為「大腦是關在一個大黑盒子裡的小黑盒子，僅接收訊息、字彙和想法，進而將它們加工成為行動、歸因和評價，完全依賴外在的制約」。換言之，個體的大腦彷彿就是中央訊息處理系統，所謂的思考便是處理訊息，而不是詮釋或轉變成可溝通的常識，同時，也將社會性的、尋求意義的思考化約成形式化的、單獨的運算。另一種不思考的社會，則是社會學家所認為的「群體或個體總是受到主宰性的意識形態所控制，亦即，他們不作任

DOI:10.6814/NCCU201901151

何思考並且不創造任何新東西」。換句話說，在這個觀點下，個體是沒有思考能力的，他們只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反映而已。Moscovici 對這些觀點所提出的反駁乃是：「個體和群體都不是被動的接收體。為了對付他們所遭遇的問題，他們會不斷思考，並持續生產與交流溝通彼此間的再現。不論是在馬路上、咖啡廳裡、工作場所、甚至是實驗室裡，他們都會評論、批判或是謀劃一些自發性的、非正式的哲學，而這些哲學事實上都對於他們的選擇、他們教育孩子的方式等有明確的影響力」。因此，對他們而言，「科學和意識形態不過是思想的糧草而已」（Moscovici, 1984b, p. 16），確實對於日常思考有影響力，但不會全然決定日常思考的內容、甚至形式。

在說明了社會的思考性以後，我們就可進入「社會再現」的定義了。我先從一段學者們最常引述的一段話開始。Moscovici（1973, p. xiii）曾提及：

> 一個社會再現就是一套價值、想法與實踐的系統，這套系統具有雙重的功能：首先，建立一套秩序，使得每一個個體都能在物質世界與社會世界裡找到自己的定位並進而掌控它們；再者，則是藉由提供社會交換的規則，以及利用能替自身所處的世界、群體與自身的歷史命名與分類的規則，而促使社群裡的成員能交流互通。

根據這段話，我們可以瞭解社會再現首先是一個系統，其內容包含了價值、想法和實踐，其運作過程主要依靠命名和分類，而它的功能則是讓人可以在社會中定位自己，得以對世界有掌控力，並使得社會成員間彼此的溝通成為可能。

我們再看另一段法國學者 Denise Jodelet（1988, pp. 361-362）的說法：

> 社會再現的概念指出一種知識的特別形式，也就是日常生活的知識，其內容顯示了其過程的運作乃是能再生產的，並為明顯的社會目的服務。更擴大來說，它指出了一種社會思考的形式。社會再現乃是有實踐意味的思維方式，可讓我們更能理解與掌握社會環境、物質環境或理想環境。

這段引文進一步指出：社會再現的內容是一種特別的知識，也就是日常生活的知識，它具有再生產性並且會相應於某些社會目的。而且，社會再現即是社會思考的一種形式，並可幫助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實作而不會遇到障礙。

再者，Moscovici（1988, p. 214）另在別處提及社會再現乃是什麼，茲引述如下：

> 社會再現……關切日常思考的內容與種種想法的儲備，這些理念可以讓我們的宗教信念、政治想法具有一致性，並且毫不費力地將它們互相連結。它們使得我們得以將人與事作分類、比較行為與解釋行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為，並將其具體化而變成我們社會環境的一部份。

這段引文，除了指出社會再現可讓我們的信念和想法具有一致性、並連結在一起，而且還可將這些想法具體化變成我們社會實在的一部份。

總的來說，社會再現理論中的再現就是一套動態系統，關乎價值、觀念與實踐、……等等。其主要功能是對於社會對象（social objects）（亦即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現象或知識）作描述或因果解釋，並可構成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ies）。同時，其社會性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起源，我們所使用的概念是這個社會中或群體中已有的；其二是功能，藉由再現我們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與人互動、協商和溝通，同時又經由這個過程而形成新的社會再現（謝政育, 2007）。

從上一節的概念根源可知，正如 Durkheim 所論證，雖然社會某種程度上仍能施展力量於個體，然而 Piaget 也指出個體並不是被動地照單全收，而是有再創造的能力，那麼社會再現便是處在這個社會與個體的張力中。

雖則社會再現的最初研究，是關於「精神分析」這個專業概念，進入法國社會後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後來的經驗研究，未必都只將社會再現侷限在「科學」或「專業知識」進入日常思考的狹隘看法。事實上，很多研究都在探討更為廣泛的（且引起爭議的）社會對象或是文化對象，進入日常思維後有何特色或轉變，像是健康與疾病（Herzlich, 1973b）、瘋狂（Jodelet, 1991）、死亡（Bradbury, 2012）、非裔美人（Philogène, 1999）、或是本文所關心的「民主」、…等等，這其實已擴充了原先「社會再現」的定義，因此，這些後續的研究或可稱為「社會再現取向」（social 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的研究（L. Liu, 2003）。

然而，正如 Durkheim 曾區分集體再現與個體再現，Moscovici（1988）也曾將社會再現區分為三種，其核心的想法是社會群體會發展出某些方式，用來理解實在之特定面向：其一是霸權式的再現（hegemonic representations），非常近似於 Durkheim 筆下的集體再現，亦即這些再現會被某個高度結構化之群體中的所有成員所共享；其二是解放式的再現（emancipated representations），亦即或多或少有密切接觸之次團體會創造他們自有的某種版本的實在；其三則是引起議論的再現（polemical representations），通常與社會衝突或是社會矛盾有關，而其中的成員乃是互相對抗的、或是互斥的。

九、社會再現的運作之處：潛在空間

誠如前文所討論，為了因應北美的社會心理學之危機，北美興起了文化心理學，而歐洲則產生歐洲社會心理學，社會再現理論正是在這個脈絡下誕生的。那麼，在簡介完社會再現的理論之後，我們就可以來討論一下這兩者之間的重要橋樑：符號（symbol）。

文化心理學除了關心「文化」是什麼以外，背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預設：那就是人和其他物種之所以不同，就是因為有文化，而且顯然這種文化是經過天擇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與生物性的篩選，才能持續被保留下來。然而，這裡所談的「文化」究竟為何？在前文中討論的三位北美文化心理學家 Shweder、Cole 和 Bruner，雖然他們各有不同立場，但應該都會同意和符號有關。亦即，人之所以能思考、推理、溝通以及和他人合作，就是因為人類有創造與使用符號的能力，具體來說，也可以說是創造和使用語言的能力。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就接近北美社會心理學家 George Herbert Mead 的核心關懷了。

Mead 流傳最廣的一本著作，應該就是他的學生們幫他整理的上課筆記，也就是《心靈、自我與社會》。其中最重要的想法即是：一個人先擺出一種姿勢，然後就會引起對方的反應，隨即這個反應又變成我的刺激，我又會據此而改變自己，如此反覆循環。這就是 Mead 所謂的姿勢的交談（conversation of gesture），其實就是一個行動的環節、一種社會互動。但是這個互動的過程之所以能夠持續，而不會逕行終止，是因為有一個中介，那就是有意義的符號（significant symbol），簡單來說，就是它可以引起我自身和我的互動對象相類似的反應，而最有可能成為有意義的符號的就是（發聲的）語言（Mead, 1995）。換句話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會有一個鋪設好的環境，讓其間彼此互動的人可以相互溝通與瞭解。好比說：臺灣人在發ㄥ這個音的時候，常常會唸成ㄣ，但是當有人發出蔡（ㄘㄞ）文的聲音時，對其他臺灣人來說，通常是不需解釋即可知道指的即是目前的臺灣總統。

言及此，讓我們來看一看這個行動環節中的三角關係：「自我—有意義的符號—他人」這三者相互依賴、缺一不可，否則社會互動就無從發生、思考也無從發生（因為 Mead 認為思考就是自我對話）。然而，當我們面對一個陌生的他者的時候，可能也會感到威脅、害怕、喜歡或厭惡。好比說：AIDS（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剛開始曾被稱為（男）同志的癌症（gay cancer），從現今的眼光來看，這當然是一種歧視特定族群的命名，而且還帶有令人厭惡、避之唯恐不及的情緒，所以歧視通常不只是將他者歸類為和我不同群體而已，往往還對他者帶有強烈的情緒（Moscovici, 1990a）；另外一個鮮明的例子則可見於北美社會中，對於某一群體的稱呼，從最早的黑奴（slave）、黑人（black）、有色人種（colored）到目前的非裔美人（African American）（Philogène, 1999）。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命名（naming）絕對不是中立的，甚至帶有強烈的情感或情緒。那麼，這些情感是否已被編碼寫進「有意義的符號」中呢？

Mead 似乎較未注意到這個面向，然而，敏銳的精神分析學者卻注意到了，他就是英國的 Donald W. Winnicott，一般會將他歸屬在對象關係理論（object-relations theory）的學派。他原本是一位小兒科醫生，所以他的理論從觀察嬰兒和母親的互動開始。Winnicott（2009）認為，在嬰兒的最原初狀態時，需全部依賴外在的照顧者來滿足他的生理需求。但是，在這個狀態下，他完全無法區別我（me）和非我（not me）的差異。他活在一個全然主觀的世界，因為他隨時都被照顧者抱在手裡，隨時都有人可以滿足他的需求，並據此建立起信任感。這時候，嬰兒會發展出全能（omnipotence）的體驗，認為他可以創造出任何東西並對其有魔法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般的控制力。但是漸漸地，照顧者不一定隨時都會在他身邊，他會開始體驗到失落和失敗，發現有些外在的東西是他所不能掌握的。從絕對依賴到相對獨立的過程，會出現過渡對象（transitional objects），這是第一個非我的佔有物，像是玩具熊或毛毯，用來安撫分離時的焦慮。過渡對象會座落在生活中的第三個領域，亦即「潛在空間」（potential space），這個空間是介於嬰兒與外在對象之間。「潛在空間」實際上就是符號運作的空間，而且嬰兒也會投注情感或慾望在其中，比如說：生氣或控制欲。要之，這個可供符號運作的空間，既不在自我裡面、也不在他者或外面的實在裡，而是在兩者之間（in-between），而這個空間裡面發生的事，不只是 Mead 所關注的認知上的或詮釋性的，還有 Winnicott 所關注的情緒和慾望，回到本論文所援引的社會再現理論來看，其實就是在說，社會再現的過程及其內容正是發生在這個第三空間。

十、社會再現如何運作？

在上一節，我們主要介紹了社會再現的定義。既然社會再現本身是一個動態歷程，那必然牽涉到不同的運作方式。依照 Moscovici 的觀點，主要的運作歷程有兩個：淀錨（anchoring）與具體化（objectification），茲分述如下：

（一）淀錨歷程（anchor-ing），把不熟悉的某物變得熟悉（make something unfamiliar familiar）：意指當我們遇到一個新奇或陌生的對象（不論是物質的、或是社會的），感覺受到威脅或不安時，我們會將其帶回自身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之範疇或意象之中，藉以降低不確定性。換句話說，就是將新事物安置在我們已有的社會再現（常民知識系統）當中，使其變得有意義、可理解、可溝通，某種程度上這和 Piaget 的同化（assimilation）概念有相似之處。

在淀錨的過程中，還包含兩個次要的歷程，也就是分類（classify）與命名（naming）。分類的基本機制就是比較，可將不熟悉的對象與某類已熟悉事物的原型（prototype）相對照，若欲強調相似性則採取普遍化（generalization）原則，將兩者間的差異減少；反之，若想要強調殊異性，則採取特殊化（particularization）原則，用來凸顯不熟悉對象的特徵。Moscovici（1984b, p. 32）還提供了一個很鮮明的例子：「我們很難說我們認識或是瞭解一個人，充其量，我們也只是試著辨識他屬於『哪一種人』或『哪一類人』」。

而將新對象歸類好之後，我們就需要一個名號來稱呼。不過命名並不只給予標籤，它同時也界定了與其他對象間的關係，也就是能讓某物件「在文化身份的母體中（the culture's identity matrix）找到安居之地」（Moscovici, 1981, p. 196），這也是前文所謂的整體性（holistic）觀點。至於命名後，則會產生三種結果：其一為對象變得可被描述，因其具有自己的特性；其二是它也因此和其他事物有所區別；最後則是該對象被約定俗成（conventionalize）了，使得在此再現中的人都可以採納與共享該物。而這個結果則是社會再現理論和其他知識的認知模式

DOI:10.6814/NCCU201901151

（cognitive models of knowledge）最大的差異，因為我們正是藉由社會性的共享而將經驗或知識約定俗成（Moscovici, 1984b, p. 34）。

要之，這個歷程強調的便是社會再現的動態本質（the dynamic nature），且能使無意義變得有意義。一旦新的概念或知覺被整合進來，社會再現的內容和結構也跟著改變。換句話說，此過程會將個體拉進他的社會脈絡及其所屬的文化傳統，也正因此，淀錨並不是一個純粹認知的歷程、也非僅只是發生在個體內的歷程，它就是一種社會的歷程（Flick, 1995, p. 75）。它同時也是一種普遍的機制（mechanism），可在所有的社會與歷史時代中發現。也因此，Billig（1993）就認為淀錨（anchoring）應是所有思維的基本特質，而不只是專屬於社會再現的過程。

（二）具體化（objectify-ing、objectification[20]），把抽象的變得具體（turn something abstract into something almost concrete）：將實在（reality）浸滿不熟悉之物，將其轉變成構成實在的要素（essence）。剛開始，不熟悉之物還相當抽象、離我們很遙遠，但經由此歷程，隨即出現在我們眼前、具有實體、甚至隨時都可上手、可供我們使用。亦即將抽象的觀念、特徵或關係轉變成具體的意象（Moscovici, 1984b, p. 38）。

Moscovici（1984b：38）還提到此過程要經由以下幾個步驟來完成：首先是去發現不夠精確之想法或概念的肖似性質（iconic quality），並將這些概念轉變成為意象。然後這些被轉化完成的意象、象徵、……等等都會被整合進一個圖像核心的模式（a pattern of figurative nucleus）或與此圖像核心產生關連。最後這個意象複合體（a complex of images）——也就是圖像化的核心——就變成概念複合體（a complex of ideas）的象徵。這個核心具有三種功能：其一是不論是在認知的倉儲上或是論述的使用上，圖像化的核心都是再現的精髓；其二則是變成處理某類現象的日常生活話題；其三則為這些圖像可被隱喻性地用來解釋某些惱人的事物（Flick, 1995, p. 78）。

簡言之，誠如 Jodelet（引自 Flick，1995：79）所指出的，具體化的歷程就是將理論元素加以選擇並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接著形成圖像化的核心，最後則將這些元素自然化（naturalize），彷彿其原本就是如此。其結果是抽象的對象就變具體了，我們開始使用這些圖像化的類型來詮釋新的事件及感知，並可讓我們與人溝通。且此歷程也如 Billig（1993）所補充，應為某種思維的特定類型。亦即，不是普遍性的機制，僅適用於「科學知識所變成的常識」此部分。

十一、心理學如何討論民主？

承上所言，社會再現理論基本上是關於知識或常識的社會心理學。回到本論文所欲探索的「民主」而言，通常是被歸類在政治心理學的領域，然而，社會心

[20] 這裡有一點需要特別說明，Moscovici 在 1976 年的法文第二版中，所使用的是 l'objectivation 這個字，翻譯成英文是 objectification；不過在英文文獻中，似乎 objectifying、objectification 兩種譯法都有。Moscovici 使用 objectification 的有 1963 年、1981 年等兩篇，而使用 objectifying 則有 1984 年此篇，然而後來的詮釋者幾無例外地使用 objectification 此詞。但就歷程性來看，我認為 objectify-ing 可能更適切。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理學和政治心理學這兩者的界線其實也沒有那麼嚴明。

讓我們先回到 Moscovici（2000b）念茲在茲的社會心理學，作為一種有別於北美社會心理學的歐洲社會心理學，他對社會心理學的看法相當接近於英國心理學家 Hilde T. Himmelweit（1990）所倡議的「具有社會關聯性的心理學」（societal psychology[21]）。Himmelweit（1990）指出這種心理學是在研究社會現象、社會體制與文化，以及它們與社會成員間的關連性和互動。其中有幾個特點需要我們特別注意：其一是需在社會脈絡中研究人；其二是就本體論來說，個體性與集體性根本無法分開；其三是環境作為中介性的實在（mediated reality），也應被研究；其四是保持具有歷史敏感性的觀點；其五是對於社會現象和社會系統的分析，往往需要來自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養分，但同樣也需要社會心理學家、發展心理學家與人格心理學家所注入的養分；其六是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皆不可偏廢，且應互相促進；其七是廣泛採納各種研究工具。

政治事件或概念不在真空中發生、也不只存在個體的心靈裡，事實上和社會現況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跟隨北美傳統的政治心理學，往往關注人們的投票行為與民意（Tileagă, 2013），也就是只關心個體而已。好比說，Moscovici（2008, p. 7）曾指出「民意的觀念就隱含了對於既予的外在對象之反應，是獨立於社會行動者的意圖或偏見而存在的」；以及將民意和行為直接連結，亦即「把對於對象或刺激的評價看成行動的前奏或是該行動的內在摹本」。

但正如前文所述，行為與民意實際上都只是社會再現的一部份而已，它會同時界定什麼是刺激，以及什麼是反應，社會再現應該是這些行為與態度的背景。正如社會再現所提示的，假若我們想探究的是一般人對於社會對象的想法或觀念，那麼應該強調的是個體當中的社會性（Magioglou, 2014）。另有些研究者（Tileagă, 2013）不從實證主義的角度出發來研究政治心理學，而提出所謂詮釋性的（interpretive）政治心理學，主張經由研究不同的社會或政治秩序（政治的、文化的和符號學的），我們可對政治行為有更深一層的瞭解。詮釋性的政治心理學會把政治心理學家比做探究當代文化的人類學家，可揭露出組織社會及再製社會的各種賦義（meaning-making）層面（Moscovici, 2000b）。

Tileagă（2013, pp. 2-4）認為將詮釋的面向包含進政治心理學中，有三種主要的涵意，其一是拓展傳統政治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論框架，因其採用了過度窄化的個體主義；其二是重新思考政治心理學中，藉由實驗與問卷調查所得到的科學知識的意義何在？常民知識與日常理解真是該移除的阻礙、噪音或錯誤嗎？真要

[21] 德語世界的批判（社會）心理學家，細緻地區分成 social（德文是 sozial）和 societal（德文是 gesellschafilich）。前者是指最廣泛意義的社會存在（social existence），因而我們可以有社會性的動物（social animals）、動物的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s of animals）或是動物的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s of animals）這些說法。當然，人及其組織也是社會性的，所以，社會性並非專屬於和人類有關的事物。話雖如此，但人及其社會組織卻不僅止於社會性而已。因為我們不只臣服於生物學的演化規則，事實上還會創造歷史與文化，所以我們和其他動物具有本質上的差異（qualitative difference）。而這正是「具有整體社會關連性」（societal）所意謂的。所以這也同時說明了 societal 是專屬於人類社會的，且普遍存在於社會當中的各個層面(Tolman, 1994, pp. 37-38)。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用專家或科學知識的真理來取代神話或錯誤信念嗎？易言之，人既然是活在日常生活與慣例的傳統中，那麼，常識與文化傳統該被摒棄在科學研究之外嗎？其三則是讓我們再審慎思考當代科學中人與社會的意象，以及重新檢驗政治心理學中人類本質、語言和文化之間的關係。事實上，依作者的看法，政治心理學不應只分析普遍的法則和心理概念，還要分析人們的日常生活及實作。

要之，從以上的討論及社會再現的定義，我們可以知道再現至少牽涉了語言、文化與符號三個層面，因而將其作為一種理論上和方法論上的框架，可將實證主義式的政治心理學轉向詮釋的政治心理學。

十二、小結

本章主要討論了本研究的理論框架：社會再現理論，從其概念根源、定義及歷程來做說明，它預設了社會再現的內容與意義是有道理可循的，而且其理論目的是去辨識、描述與分析這些有跡可尋的內容和意義。若我們將社會再現理論放到更大的「具有社會關聯性的心理學」（societal psychology）之脈絡來看的話，就可以發現正如詮釋的政治心理學取向所倡議的，它不但可用來探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科學概念，其實也適宜用來討論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政治概念，比如說：本論文所關心的民主議題。為了收集到這些議題的具體資料，下一章將會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架構。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第三章 如何研究「民主」的社會再現

本論文關切的既然是一般人如何思考「民主」，但是社會思維並不會從真空中迸生，仍有其可作為參照的思維體系。一般來說，這個參照體系即是專家知識，因此本章先從專家們如何思考民主開始。職是之故，本章會先討論政治學或政治哲學中西方的民主理論，目的在於指出，即便是作為民主發源地的西方，其意義仍是不停變動的，恰好足以顯示在專家知識中，「民主」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多義性（polysemy），難以定於一尊。再者，會進一步討論所謂漢語文化中的「民主」意涵，以與西方——乃至於台灣所實施的——自由主義式的民主作對照。最後一部份則會討論本文所援引的社會再現取向如何做研究，以及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式。

一、民主的意涵：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

北美政治學者 Robert A. Dahl（2006）指出，如今，民主理念早已變成舉世皆然的大趨勢。各式的政體都會提出某種冠以「民主」之名的訴求，即便其內涵未必涉及民主；即便某些採取非民主統治的政體，也經常以最終會抵達民主的過渡階段來說服別人接受當下的非民主境況。我們似乎已處在一個時代，只要宣稱自己是「民主的」，那麼就可以輕易獲得統治的正當性。「民主」在語意上似乎已經完全變成所有正面價值的化身，「民主就是好的」這種連結，不但被視為理所當然、同時也極具說服力。然而，也正因此，「民主」這個詞語，似乎也變成無所不包，無怪乎 Dahl（2006, p. 2）會說：「『民主』已經淪落到這種境地，這項名詞特有的狹義內容如今也未必比街談巷議的道聽途說更為精確」。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根據 Huntington（2014, pp. 18-19）的說法，民主的定義不論具有權威的來源或目的，都會出現含糊不清或意指不精確等問題，因此他採取北美經濟學家 Joseph Schumpeter 的「另一種民主理論」。這種民主理論有別於古典民主理論或近代民主理論，不以「人民的意志」（來源）和「公益」（目的）來界定民主，因為實際上難以尋求共識，而是改用程序性來界定民主，亦即「民主的方法是為了達成政治決定所做的一種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個人藉由激烈的競逐獲取人民手中的選票而得到做決定的權力。」簡單來說，民主乃是一種政治方法，是一種用來選擇政治領導人的機制而已，因此可稱之為「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李酉潭, 2011）。Hungtington（2014）認為採取這種定義的好處在於：有別於古典民主理論或近代民主理論的理想主義式的、烏托邦式的和理性主義式的定義，Schumpeter 的民主概念則是經驗性的、描述性的、制度性的和程序性的，更能夠提供分析上的準確性和經驗上的參照架構。

以上兩種看法，其實都嘗試從政治學的觀點來廓清「民主」的意涵。其中一個最被廣為引用的、最理想化的定義是由 Dahl（2006）所提出的，主要由七個要

DOI:10.6814/NCCU201901151

件所構成：(1)政府決策由民選官員所控制，(2)這些官員是透過非強迫性的定期選舉而產生，(3)每個公民基本上都有投票權可選舉這些官員，(4)角逐這些官位的參選權原則上也完全開放，(5)在選舉過程中可自由表達意見，(6)公民可接觸到不同的資訊，以及(7)可成立相對自主的組織，如：政黨或利益團體。臺灣政治學者李酉潭（2011）也稱之為「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另有其他學者又將這七個要素濃縮成為四個對民主而言必備的要求：法治（rule of law）、自由且公平的選舉（free and fair elections）、政府的可歸責性（accountability of government）、以及公民社會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civil society）（Rose, Mishler, & Haerpfer, 1998）。

至於 Rose & Shin（2001）又更進一步將這四個必需的要求，分成兩個獨立的歷程：現代國家制度的存在（existence of institutions of a modern state）與公平和自由的民主選舉。例如：英國是先有法治、有所成長的公民社會、以及政府的可歸責性，然後才慢慢有選舉的普選權；而在中歐或東歐，則是先有自由的選舉後，然後才有基本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總而言之，這些學者們所關注的是：作為民主的核心面向，自由選舉的想法幾乎變成了民主的最簡概念（the most minimalist conception of democracy），亦即若要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的話，至少要先有自由的選舉，這似乎也是之前所提的「選舉式民主」與「自由式民主」的主要交集所在。即便看似有共識，但與選舉有關的兩個基本問題：誰有投票權及被選舉權？以及該採用直接選舉或是間接選舉？實際上在民主概念的長遠發展過程中，也未必具有共識。以歷史發展來說：雅典城邦時期，婦女與奴隸就被排除在公民之外，所以他們並沒有選舉權，但現今普及全球的公民概念，原則上只排除被褫奪公權的人；另者，由於城邦的幅員較小，所以當時認為直接選舉才符合民主，但進入民族國家後，因為疆域擴大及其他考量，間接選舉也漸漸變成一種可為人接受的方式（張明貴, 2003）。

然而，我們可以發現政治學者所關心的「民主」仍侷限在政治體制的面向，而且看似維持著價值中立。然而，實際上，民主在過去兩千多年多半被認為是「壞東西」，直到二十世紀開始才被認為是「好東西」（王紹光, 2010）。也是直至二十世紀，民主的想法才扎根在政治術語中，並作為一種支配性的信念或普遍價值，讓任一國家都想躋身民主國家之列或擁有民主國家之名（Sen, 1999）。換句話說，對於民主有正面評價，其實也不過是晚近這一百年來的事，也因此，「民主」一詞並非一直是價值中立的，只是一般政治學者或是媒體不見得會彰顯民主與價值之間的關連性。

本文的基本立場是：「民主」不只關乎政治體制，也關乎政治文化與日常思維，但我們可以發現，對於「民主」意涵的多半圍繞在前者，而對於後者較少著墨，亦即較為關注「民主」在公領域、實際層面與價值中立的再現。好比說：北美政治社會學者 Larry Diamond（1999）也曾指出，關於民主實際上是什麼的辯論一直缺乏共識，主因是：不知是否該包含經濟或社會面向，以及不知是否該將此詞彙的使用限制在純粹的政治面向。而本論文所欲探究的正是在私領域中、理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想上的與和個人切身價值有關的「民主」的再現。

二、漢語文化中的民主意涵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在古代漢語的政治思想史中，曾出現過「民主」這個詞彙嗎？答案是有的，但是其意思和現代漢語幾乎不同。比如說，尚書曾謂「天惟時求民主」，其中的「民主」是指「民之主」，恰好和今日所理解的民主相反（金耀基, 1984）。晚清以前的「民主」都指「民之主」，但晚清時期來自東洋的漢語詞彙「民主」，有些是指民主政體，但有些確實已開始有「民為主」的意思了，像是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中，就指出「有一人專制稱為君主者，有庶人議政稱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權稱為君民共主者」（熊月之, 2007）。

事實上，從漢語的政治思想史來看，有的一向是「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但是「以民為本」只是說明在上位的君主要體恤人民，實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仁政，並非指統治者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現代民主」思想（金耀基, 1984）。再者，共享漢語文化的部分亞洲國家之改革者（像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或是中國的習近平）往往將民主視為增強國力的手段，經常設法展示民主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連。民主之所以能合理化，乃是因為民主能增強國家經濟和政治權力（Bell, 2009）。最後，則是漢語文化中，自古以來即有的「唯有讀書高」風氣及唐代之後的「科舉制度」，可以穩定地製造出「最優秀的人所組成的政府」。讓學習成效佳的人來為眾人謀福利，而非只為特定的工商業機構服務，這對整個社會而言都有維持管理功能，乃至積極促進發展之效，所以在「底層」人民的心中，政府的「王法」仍具有合法性與合理性。總之，為了達到體恤民情與增強國力的目標，還有科舉制度的支持，因此漢語文化下的「民主」多半有著「菁英統治」的特色。然而，當代的臺灣雖然也與中國、新加坡等共享漢語文化，但是臺灣發展出來的民主制度主要承襲自美國，較接近「自由主義式的民主」，而非「強調威權或法治的民主」，此點必須加以區分與說明。我們也可從以下報導[22]略知中國雖稱其有民主，但仍和臺灣目前所實施的「自由主義式的民主」迥然有異。比如說：臺灣人對於選舉的舉行與造勢皆相當熟悉，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類似的活動，但是中國學生在中國無法見識到這些場面，因而常常感驚訝，有如奇觀。

> 「來台觀選的陸生對台灣選舉都非常肯定，一位來自山東的魏姓學生表示，以前在大陸電視上看到台灣選舉造勢場合，都以為只是演出來的，不是真的，但實際參觀後才發現，不但是真實情況，而且壯觀的場面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主持人和底下數十萬名民眾打成一片，

[22] 〈陸生來台觀察選舉　讚嘆選民熱情但理性〉，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20115/19433.htm#ixzz5xiTohoCG。擷取時間為 2019 年 8 月 23 日。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場面非常熱鬧。

魏姓學生還觀察到，台灣的選民雖然在政治立場上，壁壘分明，但都非常理性，有獨立思考的特性，不會輕易被家庭、媒體或政黨等左右，對候選人的好壞和政績都有自己的想法；另一位來自福建的朱姓學生表示，之前在大陸，大家都說台灣選舉很混亂，選民非常激情，但實際體驗後，他也同意台灣選民雖然很狂熱，但相當理性，也相當有民主的風度和精神。」

三、社會再現取向的多元研究

本章的前半部主要針對「民主」的專家知識以及在漢語世界中發展出來的所謂「中國式民主」作討論。由於民主具有多義的性質，因此在進入本論文如何研究「民主」的社會再現之前，我要先指出社會再現的研究取向相當多元。其中主要的研究方法，根據義大利社會心理學家 Annamaria Silvana de Rosa（Rosa, 2013）的語料庫分析結果，可看出下列幾個典範取向（paradigmatic approaches）：

1. 結構取向（the structural approach）：由法國 Aix-en-Provence 的 Jean-Claude Abric 所提出，主要將社會再現視為個體的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s），其中包含兩個運作系統：核心系統（central system）與邊緣系統（peripheral system）。前者具有階層性的結構，與主流群體的價值、規範和歷史有關，也可確保再現的永續性以及對群體的同質性有貢獻；而後者則與群體中個人的經驗有關，能緩解矛盾與變遷，為群體的異質性留下空間。

   至於其再現的內容則被稱為核心要素（central elements）與邊緣要素（peripheral elements），兩者有數量上和性質上的差異：核心要素與對象的普遍特徵和定義有關、較為抽象、表達不因條件而變的信念、是不可協商的、且數量較少、並代表了群體成員的重要共識、以及不隨時間改變；反之，邊緣要素則與特殊的個案有關、較為具體與脈絡化、表達會因條件而變的信念、在數量上較多、在群體成員間有諸多差異甚至充滿衝突、而且會隨時間改變。因此，此取向的目的即是在尋找共識性的觀點，以及各種不同觀點之權重。

   換句話說，Abric 所發展的結構取向，雖然和英國科學哲學家 Imre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是在不同的學術脈絡中發展起來的，但這兩個運作系統非常近似，可以互相參照（Wagner & Hayes, 2005, p. 191）。核心系統可與研究綱領中的硬核（hard core）類比，是固定不變的、也是不可駁斥的；而邊緣系統則與研究綱領中的保護帶（protective belt）相似，當差異出現時，會將其緩解或吸收，藉以保護硬核，使其更加穩固。
2. 社會動態取向（The socio-dynamic approach）：由瑞士日內瓦大學的 Willem Doise 所發展，所以又可稱為日內瓦學派。Doise（1993, p. 157）認為社會再現理論是關於「社會調節（social regulation）的後設系統（metasystem）介入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認知運作（cognitive functioning）之系統」的理論。此學派跟隨 Moscovici（2008, pp. 166-168）的看法，認為人基本上具有反思性，所以同時有兩種認知系統在運作，其一是認知操作系統（cognitive operational system），是根據關連、包容或歧視來運思，其二是後設系統，會根據規範性的調節（normative regulations）來控制、證實或指導前面的認知操作系統。而此取向的目的就是去找出不同脈絡中，影響認知系統運作的後設系統之組織原則（organizing principles）。

而實際上，社會再現也會與兩種知識的內涵有關，一種稱為共享的知識（shared knowledge），會與個人的經驗產生連結並能讓個體主動地詮釋事物的意義；另一種則稱為後設知識（meta-knowledge），在溝通的情況下最容易意識到，亦即我們不只會知道自己在想什麼，還會知道別人在想什麼，甚至是知道別人怎樣思考我們的那種知識（Elcheroth, Doise, & Reicher, 2011）。

3. 人類學取向（Th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由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的 Denise Jodelet（1991）所開啟的研究取向，她認為再現同時是結果與過程，而且會不斷與幾個面向接合，這幾個面向是鑲嵌在社會實在、理想的實在與物質實在中的情感元素、認知元素和社會元素，且它們會顯現在語言、溝通與社會關係中。因此，她認為研究社會再現的適當方法就是要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研究，因為社會再現無法和其湧現的脈絡相分離（Jodelet, 2008）。而任教於劍橋大學的 Gerard Duveen 和任教於薩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 Barbara Lloyd 則發展出民族誌取向（ethnographic approach）用來佐證他們所提倡的社會再現之發生觀點（genetic perspective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這裡所謂的民族誌法，其實是在自然的環境中觀察兒童的互動，並詳細地說明他們的活動與脈絡，目的則是為了在互動的脈絡中探究社會再現的發生與發展。他們主要是從三個面向來闡述社會再現的形塑，其一是社會發生的（socio-genetic）、其二是本體發生的（onto-genetic）、第三則是微發生的（micro-genetic），以下將簡單說明一下：首先，社會發生意指社會再現會不斷地在社會中發展或演化，以致於有些再現會不斷在社會中循環，並成功進入歷史的歷程；再者，本體發生則是指當我們來到世上的時候，已有一系列的再現裝備在各社群之中，也就是再現先於你誕生，所以假若兒童要參與社會生活，那他就必須先瞭解這些再現；最後，則是微發生，意指社會再現仍會透過人們的溝通與互動而不斷被塑造，所以它很可能是變遷的來源。

4. 對話取向（dialogical approach）：主要的倡議者為英國斯特靈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的 Ivana Markova，她認為社會再現是常識和語言的關係性（relational）和動態性（dynamic）的組織，所以研究它就是要去探究社會共享知識與個體共享知識之間的互賴關係，是在變化的基礎上叩問知識穩定性的問題，然而這是奠基在關注變遷的黑格爾式本體論（Hegelian ontology）與關注互動與溝通的對話性知識論（dialogical epistemology）上的（Markova,

DOI:10.6814/NCCU201901151

2000）。再者，如匈牙利的社會心理學家 Janos Laszlo 所發展的敘事取向也被納入此一取向。敘事理論的前提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敘事的世界裡，透過創造故事、交換故事而獲得意義，能讓無序的事件變得有秩序，並藉此找到自己的社會定位、認同、生命的意義等等。雖然 Laszlo（2008）認為社會再現理論與敘事心理學可相容，但前者較關心範疇式的再現（categorical representations）而較少關心敘事，他認為可將敘事的原則應用到社會再現的研究中，藉以強化敘事認同理論與社會再現理論之間的連結。至於本章後面會提及的，由 James Liu（2005）等人所發展的歷史的社會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history），與 Laszlo 的敘事取向有相當的親近性，所以我也將他歸入此類。另外，de Rosa（2013）也認為此取向常和論述心理學（discursive psychology）互相構連，在其中，由於 Michael Billig（1991）的語藝(rhetoric)取向與本論文的主旨較為相近，所以會在下文花點篇幅討論。

5. 模型取向（modelling approach）：由 de Rosa 自己所發展的取向，簡單來說，就是整合相關的理論構念和模型（好比說：態度、意象、集體記憶、神話、……等等），並採取多元的研究方法設計。

準此，雖然 de Rosa 為不同的研究取向作出了分類，但其中凸顯的乃是：社會再現本身無論在那個研究取向中都是個複雜的現象。另外，我認為這套分類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意涵：其一是每個取向可能都捕捉到了社會再現的某些不同面向，同時，也和相關的學科特性有所關連，譬如：結構取向與認知心理學有關、社會動態取向與社會認知心理學有關、民族誌取向與人類學有關、對話取向與語言學或文學有關、……等；其二也和各種慣用的研究方法有關，像是：結構取向和社會動態取向偏好實驗法、人類學取向偏好民族誌、對話取向偏好訪談、敘事法與焦點團體法、……等等。

另外，誠如 Farr（1990, 1993）所言：社會再現理論總是和社會變遷的研究有高度關連，包含民意的改變等等；或者更進一步來說，Elcheroth, Doise& Reicher（2011）直接指出：社會再現取向可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政治心理學的主題。政治心理學的研究議題，當然也可包括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民主」。而臺灣自 2013 年後似乎又進入了社會運動的高峰期，有與政治直接相關的、有關居住正義的、和年金改革有關的等等，可說是臺灣社會進入高度變遷的時期。因此，本論文以社會再現作為理論框架來研究一般人在社會變遷的背景下對於民主的思考，應是相對合理的研究設計。以下就依序說明本論文的各種研究方法與設計。

四、研究一：報紙的語料庫分析

語料庫分析（corpus analysis）是指利用相關的軟體來分析文本詞彙的一種研究方法，此研究方法與計算論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的發展息息相關。計算語言學原本就是資訊科學和語言學的交叉學門，其目標是利用電腦來分析自然語言。語料庫分析在語言學領域有較長遠的發展歷史，但是在傳播領域或文化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研究領域則是方興未艾，尤其是在使用現代漢語的世界中（郭文平, 2015）。

若與傳播領域所熟知的內容分析法相較，可發現內容分析法原則上是一種量化分析方式，其背後的預設仍是實證主義式的。它是由研究者依其研究目的來訂出類目，並設定分析單位來進行文本的分析，通常以詞彙出現的頻率來彰顯其重要性（王石蕃, 1999）。但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的詮釋典範而言，研究者通常想瞭解的是文本資料的意義和詮釋，以及語言如何建構實在，而非只是哪些詞彙常被提及而已。因此，哪些特定概念被使用？其在文本中的意義為何？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在文本中被形塑出來？——這些都會是研究者想要探究的問題。簡單來說，除了要瞭解哪些意義被詞彙建構出來外，還需瞭解語言論述的潛在規則或模式（紀慧君, 2018; 郭文平, 2015; 闕河嘉 & 陳光華, 2016）。那麼，內容分析法在此時就難以達到此目的，再加上文本資料的庫存較為龐大時——正如本研究所關心的「民主」一詞，使用上相當普遍——藉由軟體來進行語料庫分析是較便捷的方法。

根據郭文平（2015）的說法，強調文本再現的語料庫分析，主要關注「媒體文本如何再生產（reproduce）不同的價值與觀點，以及如何在文本中嵌入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並彼此競逐」。經由分析詞彙的相對出現頻率和其使用方式，研究者可以「發現詞彙選擇的規律，避免以經驗或直覺作為唯一的判準」（紀慧君, 2018, p. 216）。因此，固然語料庫分析仍以量化數據作為基礎，但此法通常會結合其他質性研究方法（比如：論述分析）以達到研究目的。易言之，語料庫分析仍關心「文本字彙背後的社會與文化意涵，而非僅關心字彙的使用或文法結構而已」（郭文平, 2015, p. 104）。

至於本研究所使用的語料庫分析軟體，是國立臺灣大學的闕河嘉與陳光華所共同開發的「庫博中文獨立語料庫分析工具」（CORPRO，以下簡稱『庫博』）。與目前其他的英文語料庫分析工具（如：WordSmith）相較，「庫博」對於現代漢語使用者較友善，不需要將文本做任何的前置處理，因此較為省時省力。而就文本呈現上來說，現代漢語與英文最大的不同在於：英文的詞彙相當明顯，每個字之間皆有空格隔開，但是現代漢語則不然，真正能構成意義的是詞彙而不是字，但是現代漢語的詞彙與詞彙之間並不會有間隔，所以會造成語料庫分析上的困擾。幸好，中央研究院的中文詞知識庫小組，曾開發出 CKIP 中文斷詞資料庫[23]，可將現代漢語依詞彙意義斷開。本研究即以此作為斷詞基礎，再搭配「庫博」本身的「辭典編輯」功能，可因研究需要而增加新詞彙，好比說：在中文斷詞系統中，馬、英、九三個字各有意義，所以會各自計算頻率，但是在與政治相關的文本中，實際上可能都指向「馬英九」，這時候就需重新編輯字典，將「馬英九」設定成一個有意義的詞彙軟體才能加以判讀。

由於報紙仍是一般社會大眾瞭解社會的主要媒介，因此就本文的研究目的來說，想要探究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想法，報紙的文本分析仍可提供關於內容面的豐富資料。正如同在 Moscovici（2008）關於社會再現的經驗研究中，書中的第二部分即是在探究「精神分析」在報紙與雜誌的內容如何呈現，以及使用什麼形式

[23] 中研院中文斷詞系統請參考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DOI:10.6814/NCCU201901151

來溝通。

另外，民主畢竟是一個與政治有關的概念，由於臺灣的大部分媒體有明顯為特定政治傾向辯護的色彩，因此本研究挑選《聯合報》與《自由時報》作為分析的對象，前者大致偏好為國民黨或其他泛藍政黨辯護，而後者則主要替民進黨或其他泛綠政黨辯護(劉嘉薇, 2018)。從第一章關於臺灣民主化發展的重要事件中，我將臺灣民主化發展分為三個時期，每個時期之間隔為五年：首先，我稱為「民主化的萌發期」(1986-1990)，從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到 1990 年野百合學運；其次，則命名為「民主化的深耕期」(1996-2000)，從 1996 年臺灣第一次總統全民普選，到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最後，是名為「民主化的成熟期」(2014-2018)，從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到近來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雖然本研究的歷史分期為斷代史，但是社會再現的轉變與社會變遷通常有密切關連，因為人們對社會對象的看法會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Farr, 1990）。是以本研究的三個歷史分期大致已涵蓋了與「臺灣民主化」有關之重大的、有特殊意義的事件，所以應可說明社會變遷與社會再現之間的關係，尤其在社會變遷越劇烈時，社會再現的改變應越明顯；反之，社會越趨於穩定，社會再現也會較為固定不變（理論上，這就是「淀錨」作用的結果）。

將本研究的年代分期之後，我從「臺灣新聞智慧網」的資料庫中，以「民主」為關鍵字，搜尋《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各時期的資料以作為研究的語料庫。但由於《自由時報》在 2003 年之後才將內容電子化，因此為了配合本研究的分期，《自由時報》的部分只有收集 2014 年到 2018 年的資料而已，亦即，本研究在兩大報比較的部分只以「民主化的成熟期」為主，但是《聯合報》仍可呈現三個時期的貫時性資料比較。

此研究的資料主要可呈現出關於民主的社會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democracy），並可作《聯合報》不同時期之比較、以及《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在相同時期但不同政治立場的比較。

五、研究二：民主語意區分量表

本問卷總共包含三個部分，全部皆以匿名的方式來填答，詳細的問卷可參考附錄一。第一部份為填答者的基本資料，除了年齡及性別外，還包括詢問 18 歲以前的居住區域及現在的居住區域，另外，則是目前的職業、是否修習過政治學相關課程以及是否有特定政黨偏好。

第二部分則是「事件排序」，針對研究者所挑選的十個與「臺灣民主化」有關的事件，請填答者們依他認為與「民主」最有關連性之事件來排序，最相關者排第一、次相關者排第二、其餘依此類推。這十個事件依時間來排序分別是：1947 年中華民國憲法施行、1986 年民進黨成立、1987 年解除戒嚴、1988 年李登輝繼任總統、1990 年野百合學運、1996 年凱達格蘭大道更名、1996 年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2007 年自由廣場更名、2014 年太陽花學運。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至於在問卷中的呈現，首先，並未提示發生年份，避免有貴古賤今或是喜新厭舊的引導效果，再者，也已將十個事件隨機排列，並非按照發生的年份來呈現。至於為何挑選這十個事件作為排序？首先，正如英國歷史學家 Edward Carr（2009）在《何謂歷史？》一書中指出：並非所有的事實都是歷史事實，必然要有歷史學家介入其中挑選、編排並加以詮釋，才會有歷史事實。換句話說，歷史事實絕非純然客觀，而是帶有主觀性的。因此，這十個事件的挑選，當然是建立在我的研究目的之主觀性上。比如說：我基本上挑選「促進」民主化的事件，而非「破壞」民主化的事件，那是因為我認為臺灣朝向民主化確實是值得追求的方向。如前文所述，這基本上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共識，當然，每個國家實際上的作法仍可能是不同的。通常，民主會與法治相輔相成，因此我將 1947 年中華民國憲法的實施視為重要的事件；另外，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作為當時第一大的反對黨，對於臺灣的民主政治有其重大意義；再來，1987 年臺灣終於解除了 38 年的戒嚴，臺灣社會也因而越來越開放；而在隔年 1988 年，蔣經國逝世，所以當時由本省籍的李登輝繼任總統，而他在位期間，1990 年也發生了野百合學運，對於近來的社運與 2014 年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有極深遠的影響；至於 1996 年的全民普選總統，則代表民主國家中直接選舉國家元首的里程碑；而臺灣也在 2000 年由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完成了臺灣史上第一次經由選舉而來的、和平的政黨輪替；另有兩個在政治上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的事件，一為 1996 年的凱達格蘭大道更名，另一為 2007 年的自由廣場更名，前者不但讓總統府前的空間解嚴，也讓原住民族的名稱進入公共視野，後者則象徵告別威權，作為轉型正義的一環。這兩個象徵性的事件被我放進排序中，是因為法國史學家 Pierre Nora（1996）的啟發：記憶所繫之處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記憶的環境（milieux de mémoir）乃至於承載的團體已不存在了，所以需要依靠這些地點才能記得。因此，前者是讓遺忘的被喚起，後者則是改寫被威權編碼的國族認同。

第三部分則為「民主語意區分量表」，為研究者根據 Osgood's Semantic Differential Technique 而編製的語意區分量表。基本上是由 47 個兩極化（相反或相對）的詞組構成，每一組兩極化的詞語間有七點量尺，請填答者在這七點量尺中，選擇他認為「民主」會較接近哪個意思。在研究者的設計裡，前 15 組主要是形容詞，如：快捷/緩慢、光明/黑暗、很硬/很軟、……等；後面 32 組主要為與「民主」有關的描述或概念，如：服從多數人的意見/尊重少數人的意見、追求正義/維護公平、選舉/罷免、拼經濟/堅守主權、……等。這樣的設計格式，主要承襲自北美心理學家 Charles E. Osgood 等人（1957）所發展出來的語意區分技術（semantic differential technique）。這是一個可對「意義」的多義性(polysemy)作測量的技術，因此，從方法論上來說，此研究方法可同時兼顧多向度內省報告與量化分析（宋文里, 1998）。對於 Osgood 而言，意義本就是一個多向度的語意空間（semantic space），後來雖改稱為情感意義（affective meaning）的空間，但不變的是他關心的仍是意義中相對主觀的內涵（connotation）面向，而非較為客觀的外延（denotation）面向。但正是為了打開語意空間，所以在內容設計上往往會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加上一些較不常與研究主題相關連的語彙，譬如形容溫度、速度、亮度等概念的詞語，像是本研究的光明/黑暗、很硬/很軟、……等皆屬此類，是要讓受試者以隱喻、而非直接對應的方式來嘗試表達其體驗內容（宋文里, 1998, p. 92）。從許多經驗研究來看，這個多向度的語意空間有三個因素會相對穩定，亦即評價（evaluation）、力度（potency）和活動性（activity），但在後續的跨文化研究中，實則發現了更多不同的因素（Osgood, Suci, et al., 1957）。由此可知，情感意義空間的結構確實是複雜的，應也包含著認知、態度等面向，而意義的問題也難以像一對一的函數那般的對應關係（宋文里, 1998, p. 90）。至於本論文所援引的社會再現取向的研究中，多半會為了研究目的而有所改變，較少直接使用此技術的原始形式（Clemence, Doise, & Lorenzi-Cioldi, 1993, p. 54），所以本論文也在原始的形容詞形式上略加變化，改成更為複雜的，但維持與「民主」有關的相關概念，而其他學者，像是 Li Liu（2003）在研究生活品質的社會再現時，也曾使用此研究方法。

在本意義量表的設計上，我讓前 15 個兩極化的形容詞組，較為接近 Osgood 原先的設計方式，而後面 32 個意義相對的詞組內容，原則上我是以兩難（dilemma）的形式來設計的。根據 Billig 等人（Billig et al., 1988, p. 17）對於兩難（dilemma）的看法，對立的論題不只提供對論（argument）的機會，它們本身也提供了思考的種子。易言之，沒有這些對立的論題，社會中的人們根本無從思考。但是我並不是像傳統心理學家或賽局理論學者，將兩難當成決策的歷程。本量表的設計反而是以兩極的概念來引導受訪者思考，藉以探索意義的複雜性與辯證性，因此我認為在目的上仍與 Osgood 的語意區分技術並無二致。

總而言之，研究二的「民主語意區分量表」主要是關注一般人對於「民主」的較為抽象的且去脈絡化的社會再現（decontextualized social representations），但是嘗試在語意空間中開創更多的可能性，甚至加入兩難的情境，以刺激人們思考。

六、研究三：深度訪談

就前面兩個研究來說，都較於偏重再現的內容與結構面向，但無法探究再現的動態面，亦即淀錨與具體化的過程，也無法顯現出再現與時間（或歷史）之間的關連性。因此本研究的深度訪談，主要就是想瞭解在臺灣歷史與社會中的個人，如何形成關於民主的想法、有哪些想法、以及他如何用這些想法來和別人溝通或採取什麼行動。

社會再現由於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所以在時間的維度上，分析者往往只看重過去或歷史的部分，然而，正如 Philogène（1999）的研究及 Duveen（2013）敏銳的提醒，再現其實還有朝向未來的維度存在，亦即預期性的再現（anticipatory representations），這涉及到人們如何想像未來。這種正在產生中的再現，特別容易發生在危機產生，以及新的社會再現浮現的時候，或者換個方式來說，就是社會變遷劇烈的時候。

在研究社會議題或政治概念時，我認為這個面向可能更需重視，畢竟一般人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的生活總是脫離不了與政治、權力有關的事，正所謂「個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對於政治或民主的知識、分類體系乃至於對政治的體驗，都與權力有關，但同時也是帶有個人期待的、朝向未來的。至於本研究的訪談問題，可參考附錄二。舉例如下：你認為什麼是民主？從哪裡瞭解這個意涵的？有什麼歷史事件或生活事件影響你的想法嗎？這些想法或是有讓你產生什麼行動嗎？你認為一個民主社會和一個不民主的社會有何差異？那你覺得臺灣是一個不民主、民主或是太民主的社會？為什麼？你對於臺灣社會的期待是什麼？你覺得民主的優缺點是什麼？你會和誰討論政治話題？通常討論什麼？在什麼情況下討論的？……等等。

本研究的受訪者有 15 位，依照年齡分為三個世代，每個世代皆有 5 人，世代的劃分與前述所提之臺灣民主化的分期有所關連。1989 年以後出生的屬於青年世代，這個世代至少都經歷過臺灣民主化的成熟期階段；至於 1969 年到 1988 年出生的屬於中年世代，這個世代至少都成長於臺灣民主化的深耕期；年長世代則為 1968 年以前出生的，經歷過完整的臺灣民主化的階段。我認為，正因為這三者所經歷的民主化階段不同，所以在對於民主的再現上，應會顯現相當的差異性。

準此，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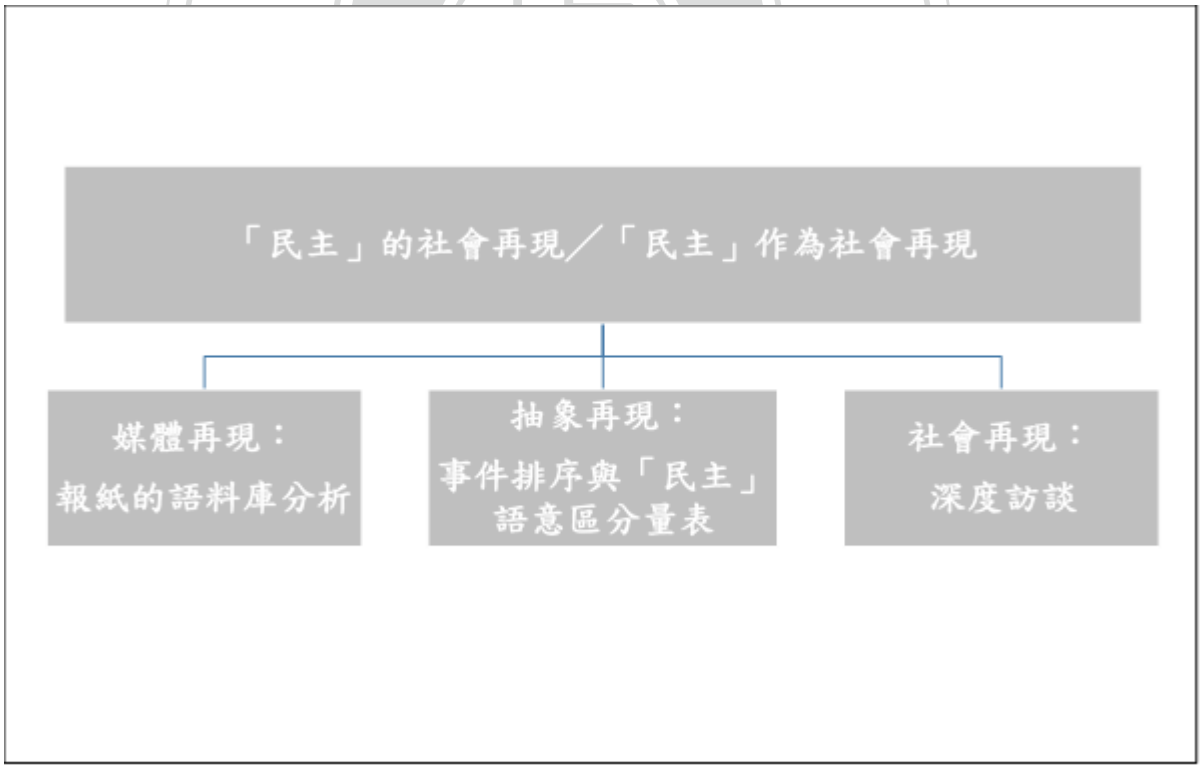

圖 3-1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由研究者繪製）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第四章 媒體如何再現「民主」

一、整體結果

本研究從「臺灣新聞智慧網」的資料庫中，以「民主」為關鍵字，搜尋《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各時期的資料以作為研究的語料庫。另外，我採用斷代分期的資料收集方式，而非貫時性的資料收集方式。

根據臺灣的民主化發展過程，我將 1986 年以來的歷史分為三階段，分別為 1986 年到 1999 年的「民主化的萌發期」、1996 年到 2000 年之「民主化的深耕期」、以及 2014 年到 2018 年之「民主化的成熟期」，每個階段皆包含 5 年。研究者所持的理由為：其一，「民主」一詞在報章雜誌上的使用過於普遍，若從本研究擬定的 1986 年算起，至 2018 年已有 33 年，資料量會相當龐大，受限於人力物力，因此本研究採取分為各個不同階段的方式作為收集資料的方式；其二，根據社會再現的理論指引，在社會變遷越劇烈的時代，越有可能發生社會再現的改變，因社會中的人們需對新的環境與事態有所因應。本研究所劃分的三個階段，皆發生與臺灣民主化有關的重大事件，因此收集到的資料應已具備相當的代表性。另外，尚有一點需說明的是，由於《自由時報》從 2003 年開始才有全文電子化，故而在本研究的分期下，只有收集 2014 年到 2018 年之第三個時期的資料。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採用關鍵字搜尋法，先以「民主」為關鍵字進行搜尋，再將關係較小的關鍵字串排除，如：三民主義、民主黨（因為是美國的政黨，與本文的核心關懷較不相干）、……等等。在研究者分期的階段內，總共收集到 8685 篇新聞報導。

表 4-1《聯合報 U》與《自由時報 L》新聞語料資料篇數統計表
（搜尋關鍵字：民主）

年份	篇數	年份	篇數	年份	篇數	年份	篇數
U1986	161	U1996	362	U2014	646	L2014	333
U1987	221	U1997	274	U2015	457	L2015	147
U1988	448	U1998	425	U2016	653	L2016	175
U1989	1502	U1999	302	U2017	372	L2017	137
U1990	1195	U2000	293	U2018	403	L2018	179

本文將 1986 年以來的歷史分為三階段，分別是「民主化的萌發期」、「民主化的深耕期」、以及「民主化的成熟期」，以《聯合報》而言，第一階段總共有 3527 篇，第二階段共有 1656 篇，第三階段計有 2531 篇；而第三階段的《自由時報》卻只有 971 篇。至於各年的詳細篇數，可參考下圖 4-1。

DOI:10.6814/NCCU201901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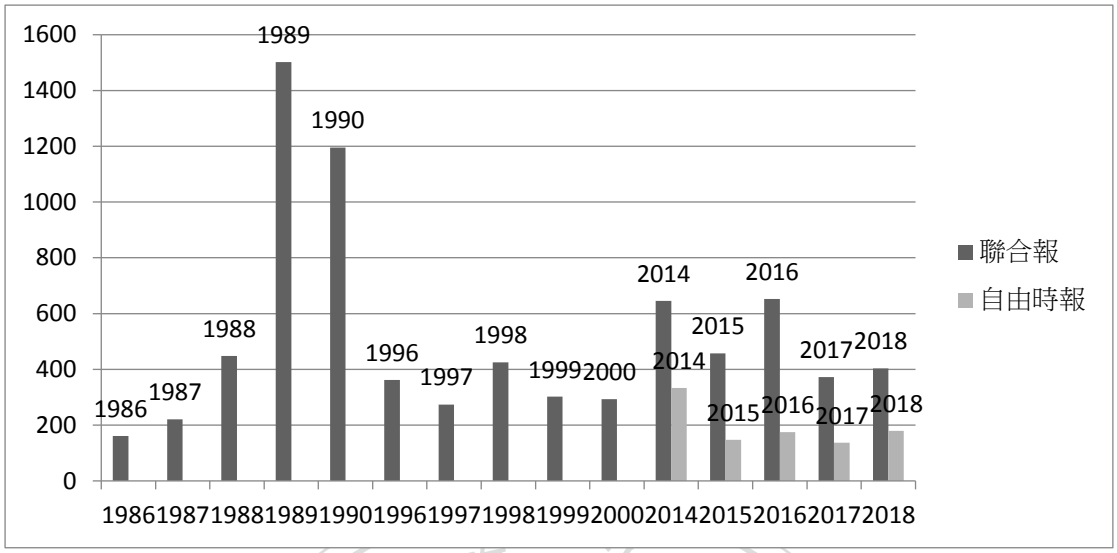

圖 4-1 《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新聞語料篇數長條圖（搜尋關鍵字：民主）

從整體趨勢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聯合報》提及「民主」的篇數遠大於《自由時報》，在數量上，以 1989 年為最高峰，有將近 1500 篇左右，隔年的 1990 年也有將近 1200 篇。我們從臺灣及鄰近國家歷史中可以發現，1988 年因為蔣經國逝世，所以由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以及當選了國民黨黨主席。當時已迫近 1990 年的總統選舉，這是 1987 年解嚴後的第一次總統選舉，再加上 1989 年也舉辦了公職選舉，因此意義重大。而李登輝當時提名的副總統人選李元簇，國民黨內部仍有歧見，所以爆發了國民黨的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反對李登輝）之間的權力鬥爭，且還牽涉到當時敏感的「省籍」之爭。值此之際，從未改選過的國民大會，又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修正案，因此引發了社會的不耐及抗議，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即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正因此，許多與後來臺灣民主化發展有關的重大事件，幾乎都在那個時期發生，所以當時討論民主相關議題的需求，可能也因此變得強烈許多。以下的報導可略作範例。

凡認為這次選舉的結果攸關國內民主政治品質、國家發展前景的選民，務必要珍惜自己的選票。唯有將選票投給心目中認為最可靠、最負責的候選人，才能支持改革。

【1989-12-02/聯合報/02 版/選舉新聞/焦點】

執政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宋楚瑜今天凌晨一時指出，對執政黨而言，這次選舉結果，在某些地方確有未盡完全實現自我期許和理想之處。

宋祕書長重申，中國國民黨推動現代化改革，貫徹民主政治理念以及為全民謀福祉的政策決心與誠意絕不會改變。今後並期望與其他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政黨與全體民眾攜手合作，共同努力，開創國家光明前途。

他說，解嚴以後的第一次公職人員選舉，也是我們國家邁入政黨政治新里程以後的第一次選舉，在廣大選民的熱心參與投票中，已經順利結束，中國國民黨對於此次選舉，在公開、公平的原則下，在理性、和諧的氣氛中完成競選，投票與計票。我們確信，經過這次選舉，將為國家進一步民主化奠定良好的基礎。

宋祕書長表示，面對政黨政治時代的來臨，這次公職人員選舉，比以往的選舉，參與更為熱烈，競爭更為激烈，原在我們預期之中，這也是民主社會選舉常有的現象。中國國民黨因此曾一再宣示，維護社會的安定與祥和，更重於贏得公職人員的席次，而避免暴力介入，破壞社會秩序與紀律，也正是社會普遍對此次選舉的最高期許。

【1989-12-03/聯合報/02 版/選舉新聞／焦點】

今年大選昨天深夜揭曉，在執政黨中國國民黨及主要反對黨民進黨之外，各小黨派及無黨派候選人僅少數擁有既定資源者當選。選舉結果，預示了我國未來民主政治的發展，已然朝向兩大黨競爭政權的模式發展。隨之而來的政治生態變化，值得觀察。

【1989-12-03/聯合報/02 版/選舉新聞／焦點】

至於前兩個階段的其他幾年，雖仍有數量上的增減，不過仍未有太大差距。下一次的高峰則是到了 2014-2016 這幾年，2014 年剛好是「太陽花學運」爆發的那一年，所以情況可能與上一次高峰的情形類似，都是在社會發生重大學運的時期。且 2016 年臺灣又恰好要進行總統選舉，雖然此時已是全民直選的階段，但與 1989 和 1990 兩年的時空背景倒是非常類似。這時就回到一個問題：為何臺灣的學生運動總是能引起廣大的迴響？從社會再現的觀點來看，這其實是和臺灣人對於「學生」的再現有關。首先，學生尚未踏入社會，還不具有社會人士的身份，所以通常會被視為「還沒長大的小孩」。尤有甚之，回到臺灣的脈絡來說，不管自己的小孩長到幾歲，父母親都還是會把他們當成「還沒長大的小孩」。這與崇尚個體主義的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因為他們通常在 18 歲的時候，就會被要求離開原生家庭，想辦法作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再者，臺灣絕大多數的父母（尤其是成長於本論文中「民主化的萌發期」的年長世代），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參與政治。參與的涵義其實很廣泛，可能小到觀看與自己不同立場的媒體、大到直接走到街頭上參與社會運動都有可能。這在後面的深度訪談中會有更多清楚的例證。最後，則是因為學生尚未「出社會」，所以通常被看成具有較高的理想性，因為還未被現實所砥礪。我認為基於這三個理由，學生運動通常會被視為是整個國家或社會發生了重大的問題，他們才需要站上街頭去力挽狂瀾，所以總是能激起很大的迴響。但就《自由時報》的篇數而言，除了 2014 年篇數將近 300 篇以外，其他四年倒是維持百來篇而已，不算有太大變化。可能是因為《自由時報》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的立場較為偏向泛綠陣營，會把民主制度當成現代臺灣的背景，而無須一直重申或討論。

二、語意分類

在語料庫分析法中，詞頻分析通常都是此分析法的起始點，至於哪些詞彙是有分析意義的，以及選擇分析多少數量，基本上取決於研究者目的、研究問題以及研究者的時間和能力等等，幾乎沒有一個語料庫研究能夠分析所有字彙（郭文平, 2015）。詞頻列表的排序主要可顯示語料文本整體的「字彙使用偏好」，可對語料庫文本進行「全觀」的意義探索（Baker, 2005），其作用可說是類似於描述統統計中的圖表分析。以下表格 4-2 則顯示本研究以「民主」為搜尋關鍵字所收集的語料，以詞頻統計前五十個使用次數最多的詞彙。

表 4-2 《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前五十個詞頻列表（本研究整理）

排序	詞彙	頻次	排序	詞彙	頻次	排序	詞彙	頻次
1	中國	2,507	18	大選	411	35	立委	250
2	台北	2,004	19	蔡英文	410	36	民眾	249
3	兩岸	1,981	20	華盛頓	404	37	憲政	245
4	臺灣	1,937	21	自由	392	38	政策	230
5	總統	1,521	22	民主化	366	39	學運	225
6	香港	1,491	23	國家	364	40	歷史	219
7	美國	1,036	24	候選人	357	41	服貿	216
8	北平	1,003	25	學者	352	42	執政	210
9	選舉	917	26	共和黨	350	43	投票	208
10	民進黨	732	27	政黨	345	44	執政黨	194
11	川普	632	28	經濟	326	45	選民	194
12	中共	598	29	人民	309	46	法治	191
13	學生	521	30	民主政治	305	47	民調	190
14	政府	498	31	改革	288	48	未來	185
15	國會	478	32	發展	276	49	市長	183
16	希拉蕊	460	33	議員	257	50	媒體	174
17	國民黨	421	34	主席	255			

關於此詞頻統計表，我有兩點需要說明：其一，由於「民主」本身一定是使用頻次最多的，所以本表並未將其列入。再者，因為庫博語料庫分析本身即有停用字功能，因此研究者已將一些較具功能性，而未必有實際意義的詞彙予以刪除，像是：的、是、或數字等等，因此最後的詞頻統計結果並不會出現此類功能字。

研究者從詞頻分析中，想瞭解的仍是這些詞彙數量多寡的意義何在。詞彙使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用數量越多，越是顯示媒介內容生產者覺得有新聞價值；另外，也顯示媒介文本實踐者背後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或知識背景（郭文平, 2015），簡單來說，就是本文對於某議題的社會再現。例如：當我們討論到民主時，總是會和選舉、民調有所關連；而目前臺灣的政黨格局為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黨為主導，因此在討論政黨時，原則上就比較不會見到親民黨、新黨等泛藍政黨、或是與民進黨較友好的社民黨、臺灣基進等政黨。

首先，根據本研究目的及過去文獻，會將詞頻數量較多的字彙進行「語意分類」（semantic catrgories）以作為後續分析之用（林意璇, 2015; 紀慧君, 2018; 郭文平, 2015）。因此本研究將詞頻統計結果後的前五十大字彙，歸納為下列主題類別：

（一）與地理區域、時間或是事件有關的詞彙：普遍來說，民主是一個與政治體制有關的詞彙或概念，再加上臺灣獨特的歷史發展過程與夾在中國和美國等大國之間，因此與地理區域、時間或是事件相關的詞彙仍具有相當的意義。像是：中國、台北（臺北也計入）、兩岸、臺灣（台灣也計入）、香港、美國、北平（北京也計入）、華盛頓、改革、學運、歷史、服貿、執政、未來、……等。

（二）與選舉和投票有關的詞彙：一般來說，這通常是常民與民主制度最常接觸到的環節。好比說：選舉、大選、候選人、投票、選民、民調、……等。

（三）國家、政府、國會與政黨有關的詞彙：這是民主制度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除了基本的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及其人員外，本研究也把某些政治人物歸為此類。像是：總統、民進黨、川普、中共、政府、國會、希拉蕊、國民黨、蔡英文、國家、共和黨、政黨、議員、主席、立委、執政黨、市長、……等。

（四）與「由人民統治」有關的詞彙：從第三章的民主理論分析，我們可知這原本就是民主一詞的最原初意思，裡面牽涉到兩個概念，其一是人民、其二是統治，因此與這兩者相關的都歸為此類。好比說：學生、民主化、學者、人民、民主政治、民眾、執政、……等。

（五）與人權、法治和規範有關的詞彙：從上一章的討論可知，民主的目的通常與保障基本人權、自由和平等有關，而為了達到此目的，又會與法治有不可分的關係，才能一邊保障人民的權利、一邊又能節制政府的權力，因此，本研究將民主政治的目的與規範歸為一類。像是：自由、憲政、政策、法治、……等。
因此，本研究也將其歸為一類。像是：憲政、政策、法治、……等。

（六）與經濟和媒體有關的詞彙：在臺灣，不論是常民或是政治人物，經濟與民主通常是被放在一起對照的兩個重要概念，究竟是民主促進經濟發展？還是經濟發展會促進民主政治產生？當然，不可否認地，在西方國家，他們對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是相當感興趣（Huntington, 2014）。另外，媒體與民主的促進和阻礙關係也常被拿來討論，再加上媒體對於人們瞭解世界和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本文也將其歸為一類。因此在本研究中，仍有必要將其歸為一類。計有：經濟、發展、媒體、……等。

以上為研究者根據前五十個使用次數最多的詞彙，歸納而來的語意分類，共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計有六大類，分類結果請見下列表 4-3。之後的分析即會以此六大類為基礎。

表 4-3 本研究收集之總語料的語意分類（由研究者整理）

語意分類	相關詞彙
地理區域、時間和事件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對岸）、台北（臺北、北市）、兩岸、臺灣、香港、美國、北平（北京城、北京）、華盛頓、改革、學運、歷史、服貿、未來
選舉與投票	選舉、大選、候選人、投票、選民、民調
國家、政府、國會與政黨	總統、民進黨、川普、中共、政府、國會、希拉蕊、國民黨、蔡英文、國家、共和黨、政黨、議員、主席、立委、執政黨、市長
由人民統治	學生、民主化、學者、人民、民主政治、民眾、執政
人權、法治與規範	自由、憲政、政策、法治
經濟與媒體	經濟、發展、媒體

三、主題變化趨勢

利用上一節的語意分類為基礎，研究者將本文語料的三個時期、四個區段前五十大字彙先分類完畢，再計算其在當時期的數量與相對比例，以觀察其在三個時期以及不同報紙之間之異同，如表 4-4 與圖 4-2。

表 4-4 關於「民主」之新聞各類別與頻率百分比

（年份前的 U 表示《聯合報》、L 表示《自由時報》，由研究者整理）

時期	地理區域、時間和事件	選舉與投票	國家、政府、國會與政黨	由人民統治	人權、法治與規範	經濟與媒體	合計
U1986-1990	59.3	3.4	19.4	9.4	6.7	1.8	100
U1996-2000	60.8	5.2	20.2	7.5	3.6	2.7	100
U2014-2018	42.5	8.8	39.4	5.5	1.7	2.1	100
L2014-2018	59.5	6.3	23.2	6.6	2.3	2.1	100

DOI:10.6814/NCCU201901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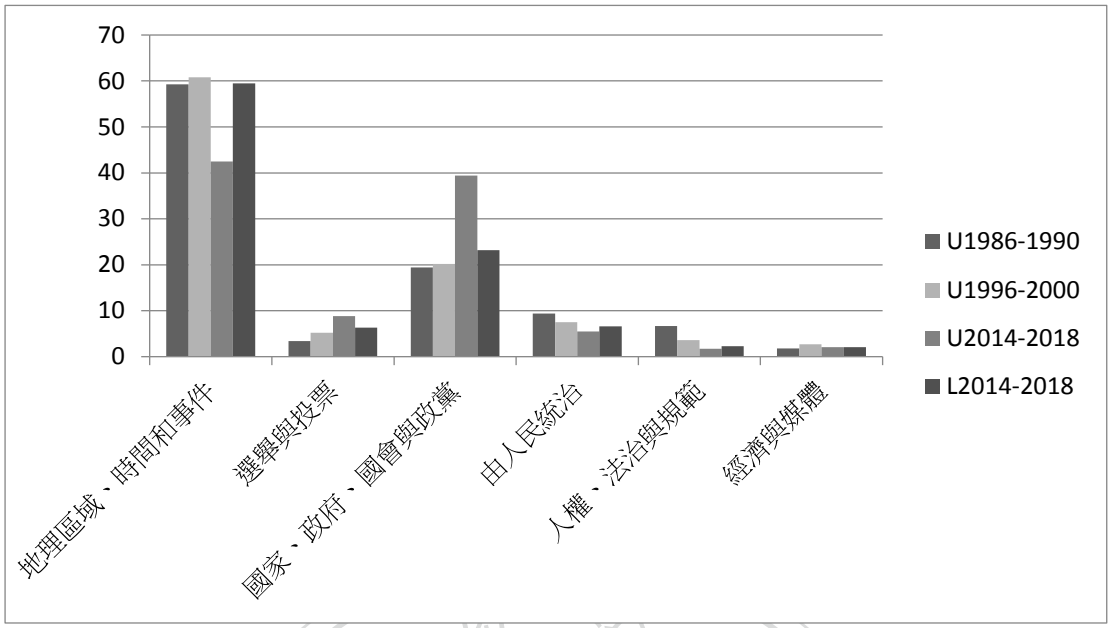

圖 4-2 關於「民主」之新聞各類別百分比長條圖（由研究者繪製）

根據表 4-4 與圖 4-2 的結果，以下我們先針對各類別作趨勢比較與說明：

（一）「地理區域、時間和事件」：不管是在哪個時期或是哪個報紙，「地理區域、時間和事件」此類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幾乎都有超過 50%，除了 2014 年至 2018 年此時期的《聯合報》以外。這個趨勢其實說明了臺灣在國際關係中的拉扯與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說：除了臺灣本身及其首都臺北以外，詞頻比例最高的就是中國與美國等兩大國，還有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如：兩岸、對岸），但是鄰近且殖民過臺灣的日本就未進入前五十大的詞彙，反而是香港有被計入；至於歐洲做為民主思潮的發源地，基本上都未進入前五十大的詞頻裡。事實上，探究詞彙的缺席分析，對於瞭解文本的意義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Van Dijk, 1997）。另外，在本研究分期階段裡的兩次學運，也進入前五十大的排名，正如之前所提：在臺灣，學生運動的能見度、討論度和迴響，往往都勝過其他種形式的社會運動，如：勞工運動、性別平權運動、……等等。而攸關時間面向的歷史與未來，其實也被計入前五十大的詞頻裡，可見得一種政治概念或政治制度，確實會和人們對於時間的感受有關（Philogène, 1999）。但光從《聯合報》的三個時期來看，仍可發現它減少的趨勢，我認為這是因為其他重大的社會變遷，而導引了媒體的吸引力之故，好比說：太陽花學運或是總統大選等。若我們將媒體的報導比例也看成是社會再現的一個面向的話，那麼社會變遷確實是會影響社會再現的，因為人們需要不同的因應策略來適應新的狀態（Wagner & Hayes, 2005）。

（二）「選舉與投票」：在討論民主的概念時，選舉往往被視為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尤其是從 Schumpeter 的程序性民主定義來看，更是如此（Huntington, 2014）。除此之外，選舉本身可能也是一種常民最容易接觸到的民主政治的化身，因為它基本上可以讓每個人去參與一個民主政治的運作歷程，而且參與的結果（不論成功或失敗）通常是有影響力存在的。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佔有一定的比例也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是可以想見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雖然臺灣的選舉常有激烈或盛大的造勢晚會，看似大家都為選舉而狂熱，但其實在新聞中的報導比例，相對於其他類別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但以聯合報的三個時期來看，似乎略有增加趨勢，除了人們的體認外，可能也與國民黨在選舉時，不再全面勝選有關。

（三）「國家、政府、國會與政黨」：此類別在比例上，大致來說也都相當穩定，維持在 20%左右，除了《聯合報》在 2014 到 2018 年此階段有將近 40%的高比例，而且似乎和「地理區域、時間和事件」此類別的減少有因果關係。這段時間內，臺灣在 2014 年發生了太陽花學運以及 2016 年的總統選舉，兩者都與臺灣的民主化歷程有莫大關連性。前者是拒絕服貿，希冀保障臺灣自身的經濟發展並減低對於中國的經濟依賴；後者則是由代表民進黨參選的蔡英文執政，並取得立法委員多數席位，可以說是進入臺灣有史以來由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新局面。再加上我也把政治人物的名字歸入此類，而作為傾向泛藍陣營的《聯合報》，對於這些議題和人名多所著墨，應也不令人意外。

（四）「由人民統治」：從西方的民主理論來看，「民主」最原先的定義就是「由人民統治」（rule of people；rule by people），從結果來看，四個時期變化都不大，除了《聯合報》在 2014 到 2018 年，有偏少的情形外。至於偏少的原因，可能與上一節所提，因為選舉和學運的關係，而大量將報導重點放在第三類，導致其他類別的減少。而從《聯合報》的三個時期來看，是呈現略有減少的趨勢，可能是在臺灣逐步民主化的歷程中，因為民主似乎變得理所當然，所以一般人或媒體對於民主的概念或定義的興趣就越來越減少了。

（五）「人權、法治與規範」：原則上，這也是民主想要達到的目標或理想之一。雖然四個時期的比例都不高，但是《聯合報》有明顯的減少趨勢。這個減少趨勢，究竟與理想的衰微或消失有關，還是與臺灣已逐步邁向民主化，而無需一直提及有關，則有賴不同媒體間的比較方能回答。另者，在私領域的語意中，政治或民主的理想與目標，通常都隱含著正面的意涵，但是大眾媒體往往忽略這種關連，或甚至以「中立客觀」來避免此意。關於此點，我們在下兩章的討論中，會有更詳細的討論。

（六）「經濟與媒體」：經濟與媒體兩者，常常被拿來與民主一起討論，想要瞭解它們之間的關係為何。但從本研究來看，相比於其他類別，比例一直都不高，但《聯合報》整體來看，還算是有慢慢增加的趨勢。原因可能在於中國做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成長上突飛猛進，但其目前仍為一黨專政的獨裁政體，恰與臺灣較低的經濟成長率但卻是民主政體作一對照；再加上，有越來越多學者注意到，中國也擅長利用媒體來製造有利於自己的輿論（何清漣, 2019），因此，相關議題的討論上應會有增無減。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兩大報的政治立場雖不盡相同，但是在本研究所歸納之類別的報導比例上，兩者似乎仍具有高度正相關。這點確實頗為有趣，因為「民主」是一個政治學上的概念，在媒體的報導上應該會與政治立場有所差異才是，但本研究收集到的資料並未呈現這種結果。可能的原因如下：其一，本小節所探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究的是各類別的相對比例，實際上只能將其看成各類別的發展趨勢，與個別字彙間的消長未必有正相關；另者，正如前文所提，本研究所選取的時期，臺灣都有發生影響民主化的重大事件，可能反而造成了媒體報導的趨同性；最後，則是這幾個類別的相對比例，很可能就是臺灣媒體關於「民主」的霸權性再現（hegemonic representations），這相當近似於 Durkheim 的集體再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因為幾乎會被該群體的所有成員所共享（Moscovici, 1988）。

四、「民主」之搭配詞分析

上一節主要探討語料庫的詞頻分析，詞頻終究是以數量為基礎的分析方式，因此較難以掌握字彙使用的社會脈絡與使用意義，而本文後續要討論的搭配詞分析，某種程度可以解決這個研究上的限制。我們將在下一段說明其意義。

搭配詞分析（collocation）是想要探究「某個目標詞彙與哪些詞彙在文本中經常一起出現？」，主要利用庫博語料庫分析軟體來找出目標詞彙的前置與後置詞彙，可以讓研究者瞭解「民主」經常與哪些其他字彙或議題相連結，因為這實際上會影響閱聽人對於「民主」之理解、詮釋、想像或再現（郭文平, 2015; 郭柏傑, 2018）。基本上庫博會利用統計的方式，檢驗詞彙與詞彙之間的連結程度。本節依研究目的，將「民主」作為節點詞彙（node word），以探究有哪些詞彙會和它連用。

（一）《聯合報》搭配詞彙之分析

表 4-5 顯示本研究所收集到之《聯合報》的語料，與「民主」一詞的相關聯繫搭配之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臺灣」、「自由」、「憲政」、「法治」、「發展」等是較常搭配在一起的詞彙。而以「臺灣」來說，「臺灣民主」又比「民主臺灣」更常出現，這確實比較符合現代漢語的使用習慣，而且這也顯示出，《聯合報》做為臺灣出版的報紙，當談論到民主的時候，確實最常討論的是臺灣民主，而不是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可能也是比較偏向國內民主現況的討論，而較少顧及較具世界觀的國際關係之面向的討論。

至於「自由」和「人權」等民主所欲達到的目標或目的，也經常搭配出現，且「自由民主」又比「民主自由」更常出現，但是「人權」一詞卻比較常放在「民主」之後，顯示人權比較是討論的重點。而「憲政」和「法治」都較常在「民主」之後和其搭配，在這個情況下，顯示「民主」通常是作為形容詞使用。與第三章的民主理論以及上一節的語意分類一起參看，我們可以發現《聯合報》的搭配詞彙相當中規中矩，基本上大致符合 Rose et al.（1998）所提及的民主之必備要素：法治、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政府的歸責性與公民社會的存在。但除了這些常用搭配詞彙外，《聯合報》還出現了一個與經濟有關的詞彙，就是「均富」。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表 4-5 《聯合報》關於民主之前 25 個搭配詞彙結果

排序	詞頻	搭配詞彙	左置詞彙	右置詞彙	t 值
1	1,125	臺灣	659	466	16.07917
2	315	自由	190	125	10.91163
3	198	憲政	28	170	8.480445
4	157	法治	30	127	7.661455
5	169	發展	45	124	6.076668
6	116	人權	47	69	5.973023
7	178	經濟	80	98	5.37135
8	104	正義	41	63	5.229581
9	159	改革	68	91	5.128125
10	157	人民	73	84	4.628613
11	67	體制	16	51	4.601584
12	82	開放	19	63	4.527526
13	177	國家	75	102	4.384273
14	83	世界	42	41	4.207449
15	98	服貿	51	47	3.737337
16	362	選舉	141	221	3.643512
17	160	政黨	50	110	3.636287
18	297	民進黨	169	128	3.558417
19	121	民眾	47	74	3.484572
20	185	國民黨	105	80	3.455135
21	96	執政黨	46	50	3.197702
23	60	李總統	46	14	3.14125
24	59	公民	25	34	3.124366
25	22	均富	0	22	3.055817

（二）《自由時報》搭配詞彙分析

從表 4-6，我們可以發現最常搭配的仍是「臺灣」，這點與《聯合報》類似。但是有趣的是出現「北平」這個地名，這倒是和《聯合報》大不相同，可見得《自由時報》的在報導民主相關新聞的時候，更常與中國（北平、北京、中共）做對比，藉此顯示兩者之間的差異。「香港」一詞的情況也頗為類似。更重要的是，由於《自由時報》只選取 2014 年至 2018 年，所以與社會運動相關的詞彙更常與「民主」一起出現，像是「學運」、「太陽花」等等。再者，就兩大黨而言，「民主」比較常和「民進黨」一起出現，但是「國民黨」仍進入前 25 個搭配詞內。另外，則是與「民主」有所搭配的人權部分似乎更被強調，像是「公投」、「人權」等等。最後，則是「獨立」一詞，雖然詞頻不高（但相對來說，本研究所收集到的《自由時報》總篇數仍比《聯合報》還少），但還是和「民主」有搭配的情況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出現。從這個結果看來，這確實比較接近《自由時報》泛綠的立場，和上一部份只看詞頻的趨勢的結果是不同的。正如同荷蘭學者 Teun van dijk（1991）在討論論述分析時，就認為許多語句間能夠連結扣連，是因為預設閱聽人已有相關的背後知識，所以能夠形成理解（understanding），就本研究來說，這個鋪設好的理解環境正是社會再現。

表 4-6 《自由時報》關於民主之前 25 個搭配詞彙結果

排序	詞頻	搭配詞彙	左置詞彙	右置詞彙	t 值
1	324	臺灣	130	32	11.57225
2	14	北平	5	2	2.37494
3	26	財經	0	26	1.839606
4	58	香港	44	14	1.824316
5	20	學運	11	9	1.470507
6	29	服貿	5	24	1.468037
7	18	九合一	0	18	1.379978
8	19	太陽花	9	10	1.279292
9	32	選舉	11	21	1.249861
10	12	人民	8	4	1.249766
11	7	公投	5	2	1.196129
12	10	人權	4	6	1.140875
13	21	民進黨	12	9	1.095325
14	9	憲政	3	6	1.082329
15	23	自由	16	7	1.063786
16	8	法治	1	7	1.02043
17	7	立委	7	0	0.954525
18	5	改革	1	4	0.806721
19	7	國家	2	5	0.712921
20	16	總統	11	5	0.644076
21	3	中共	2	1	0.624883
22	3	政策	1	2	0.624883
23	3	政黨	3	0	0.624883
24	3	獨立	1	2	0.624883
25	3	白宮	1	2	0.624883

DOI:10.6814/NCCU201901151

五、「民主」之脈絡分析

從上一節來看，即便我們已經瞭解「民主」會與哪些詞彙搭配，但整體來說，仍然缺乏「字彙在文本中的使用脈絡」之分析。關於「民主」這個概念，如何與整體的文本產生詮釋的循環，除了上一節的搭配詞分析外，還需本節的共詞分析（concordance）來解讀其使用脈絡才行。如此一來，我們才可瞭解記者們如何框架「民主」的意涵，並將其呈現在新聞文本中。

（一）《聯合報》之共詞分析

從上一節的搭配詞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聯合報》裡，最常與民主搭配的應該是臺灣一詞，以下舉幾個例子作為說明。

台北市市議員陳政忠、洪濬哲、陳俊源都表示，台灣地區解嚴，顯示政府有決心走向更民主開放的境界;但今後政府對任何政治活動，都應審慎加以規範，使這些活動不致影響到他人自由，或破壞社會秩序與安寧。

【1987-07-15/聯合報/02 版/】

台灣三合一選舉順利結束，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五日評論這次選舉時向台灣人民致賀，他說，因為這次選舉象徵了台灣民主持續成熟化，及具有活力的政黨政治。對於他的老友陳水扁落選，卜睿哲說：「他打了一次很好的選戰，且有良好的出任市長紀錄，他還年輕，應該還有遠大的前景。」

……

我駐美代表陳錫蕃指出，這次的選舉公開公正，顯示台灣民主化政治的成熟；身為外交人員，對此都十分高興，也相信這次選舉對台灣在國際間的形象會更有幫助。

【1998-12-07/聯合報/08 版/選後觀察特別報導】

柯文哲昨受邀發表市政心得，談到日前出訪東南亞，他說，新加坡就是住在籠子裡面的金絲雀，馬來西亞市議員對台灣民主自由羨慕到「流口水」，接著話鋒一轉，繼日前說「香港很無聊」、「一個小島有什麼好看的」，再度對香港開砲，指香港沒有選舉的自由，沒有自由的靈魂有甚麼好羨慕的。

【2017-04-10/聯合報/A4 版/要聞】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當談到臺灣民主的時候，通常都會與當時的民主化歷程相符，比如說 1987 年、1998 年與 2017 年的討論脈絡，恰好與本研究的分期相符合，分別在談論如何鞏固民主、如何深耕民主、以及以臺灣對照其他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國家或地區還不夠民主。這條歷史的軸線未必是線性的，但我們仍可發現其背後的意涵乃是：民主是值得追求的好價值，所以我們才要努力讓自己維持並改善民主制度。另外，從上一節的討論可以發現，民主的搭配詞大致上都符合學者所認為的民主必備要素，但是其實仍較著重在規範的部分，好比說上述的第一個例子，就是在規範人民的權利而非政府的權利，仍是站在當權者（當時是國民黨）的立場來告誡人們不要破壞秩序，但並未提及當權者也不應擴權等面向。所以實際上，在政府的歸責性與公民社會等要素上，仍是較為缺乏的。

另外，從上一節的搭配詞分析中，出現一個頗耐人尋味的字彙：「均富」。我們也可以利用脈絡分析加以解讀。

> 行政院長俞國華昨天在國民黨三中全會指出，政府將繼續致力經濟發展，執行均富政策，預期到民國八十九年，我們平均每人所得，將達一萬三千餘美元，在此之前，中華民國就已進入開發國家之林。
>
> ……
>
> 而且，中華民國的壯大，已明顯說明中共暴政必亡的道理。中共雖然掙扎求變，企圖以放鬆經濟控制來緩和其內部的危機；但是共產制度本身就是反人性、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社會桎梏。在這種桎梏之下，其所謂的「改革」，不僅無助其貧窮與落後的改善，反而加速了大陸知識分子的覺醒，意識型態的混亂與分裂，以及制度的矛盾與衝突。
>
> 【1986-03-31/聯合報/01 版/】

> 蕭萬長在專訪中首先強調，和平統一是我政府不變的目標，但必須統一在民主、自由、均富之下，目前並未訂定統一時間表。
>
> 在兩岸關係問題上，蕭萬長強調，中華民國始終抱持開放、友善的態度，舉凡開放大陸探親、間接貿易與文化交流等，都顯示我方促進雙方關係和諧的努力，也清楚表明希望能與大陸恢復對談；但中共若不放棄武力犯台，並極力圍堵我國際空間，則國防安全與人民福祉就不能不慎重考慮。
>
> 【1998-04-05/聯合報/04 版/政治】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均富」其實是一種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希望讓每個人都富有，而且其指導原則可能都來自於孫文的《三民主義》。雖然我們仍可看出時代的變遷，比如說 1986 年還在追求均富的目標，但是到了 1998 年，儼然已達到均富的水準。另外一個有趣的轉變則是對於中國的態度，在 1986 年時，直接以中華民國的壯大來對比中共的暴政必亡，但是到了 1996 年，雖然還是想要以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來統一中國，但是已經抱持開放、友善的態度，並希望恢復對談，當權的國民黨已經從一個批判中共的角色，變成和平對談的伙

DOI:10.6814/NCCU201901151

伴關係了。

（二）《自由時報》之共詞分析

從上一節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民主」常與「北京」搭配，這是《聯合報》未曾發現的，因此我們進入相關報導的共詞分析來加以解讀，請參考以下例子。

趙天麟表示，台灣人民走過民主化的過程，深刻了解當中的辛苦與困難，對香港人民的處境與心情感同身受；追求民主的夢想會被壓制，但不會消失，民進黨再次呼籲港府與北京當局，尊重港人追求民主的期待，積極回應改革主張，民進黨也將持續關注並聲援香港人民對於民主改革的追求。

【2014-09-23/自由時報】

美國多名過去主張與中國交往的中國問題專家廿九日表示，美國應以質疑眼光看待中國日益加強破壞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民主價值，同時呼籲美國應該認識到北京當局在美國拓展影響力所構成的威脅。專家們還建議，除非美國媒體與學者能在中國享有更大自由，否則應對中國媒體與學者的赴美簽證設限。

【2018-11-30/自由時報】

由於本研究僅收集 2014 年到 2018 年的《自由時報》之報導，此時的國際氛圍已經有所改變。最明顯的即是美國與中國不再是之前的善意交流關係，反而變成略帶敵意的競爭關係，這一點我們可從以上兩則報導清楚看出。另外，當「民主」與「北京」搭配時，通常都是批判北京政府的立場，比如說：第一篇引用的是民進黨的說法，而第二篇則是美國的說法。對臺灣媒體生態熟悉的人，應也不至於太意外，因為相較於其他媒體，《自由時報》的政治立場是偏向獨立的（劉嘉薇, 2018），所以對於北京當局，自然也會呈現較為批判性的言論。

我們可以來看同時期的《聯合報》之報導，即可發現箇中差異。

新黨主席郁慕明十三日出席第四次「連習會」，解讀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談話，郁慕明昨天指出，習的四項堅定不移第一項就是「反對台獨」，同時以「魔高一尺」比喻台獨勢力，強調大陸有「道高一丈」的信心，顯示大陸認知當前兩岸關係「複雜嚴峻」，但堅持反對台獨的立場沒有改變，且因應必有手段，絕非只是坐而言。

【2018-07-16/聯合報/A4 版/要聞】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習近平指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會走擴張主義和殖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民主義道路，更不會給世界造成混亂。習強調，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老祖宗留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丟」。

【2018-06-28/聯合報/A9 版/兩岸・國際】

從以上兩篇報導我們可以發現，同時期的《自由時報》對於北京政府持批判立場時，《聯合報》原則上對於北京政府的立場照單全收，甚至於還會反過來批判執政的民進黨甚至是美國。我們可與之前的報導互相參照，《聯合報》對於中國政府的態度從臺灣是民主國家，所以中國的專制暴政必亡；到臺灣可以接受在自由、民主條件下的和平統一，所以願意進行對等交流；乃至於到目前是不加思索地對於中國的立場和說法照單全收。

也因為《自由時報》的立場較為偏綠，所以我們應該也看看他們對於太陽花學運之報導，以瞭解常民或記者們如何解讀此社會運動。

沒有太陽花學運流血流淚流汗，勇敢衝開兩岸政商權貴共犯集團構築的黑牆，就沒有國民黨的全面潰敗！

太陽花運動帶動人民覺醒的力量，如巨浪兼天湧，橫掃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政商權貴集團，如秋風掃落葉讓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兵敗如山倒。

【2014-12-1/自由時報】

三一八反黑箱服貿運動的參與者在學運後不只「出關播種」，更是進一步「開枝散葉」。除了學生代表林飛帆、陳為廷等人昨天宣布成立的「島國前進」外，更有「民主鬥陣」、「黑潮」、「割闌尾」等團體在各種領域遍地開花，希望未來能夠分進合擊，串連公民力量對政府進行監督。

【2014-5-19/自由時報】

從以上的兩個例子可以發現，《自由時報》對於社會運動、太陽花學運都抱持相當正面與讚揚的描述方式，不但民眾認為這是國民黨選舉潰敗的主因，連記者也認為太陽花學運像是火種一般，點燃了後續更多的社會運動之火，甚至還進一步指出此學運帶來許多正面的效果，至少是帶起了公民的力量，這和本研究的民主息息相關，除了與人權有涉外，也可看成是公民社會的集結力量。我們可以看看同一時期的《聯合報》對於太陽花學運的報導。

學生們堅信「公民抗爭有理」、「公民抵抗有理」，揚言衝撞「制度暴力」，背後又有社運人士、大學教授及校長、律師為後盾，還有大學停課鼓勵，讓他們勇往直前挑戰公權力，甚至將這樣的「犧牲」視為革命。「我反對，所以我占領」。反服貿學生持續採取這樣激烈的衝撞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模式，占了國會、攻進行政院，一邊高舉民主、訴求和平，一邊卻暴力衝撞、藐視法治；這樣的抗爭方式，已經愈來愈危險，也削弱了太陽花學運的正當性。

【2014-03-24/聯合報/A2 版/反服貿第 7 天攻占兩院危機處理】

今年青年節逢太陽花學運等事件，青年反服貿話題沸沸揚揚，昨天又是 330 上凱道活動，台東縣政府在南京路廣場表揚各階段優秀青年時，黃健庭上台致詞，首度公開談服貿協議、學運等。

他鼓勵年輕人多投入社會公益，也應該關心社會脈動、國家發展，但必須在法律規定下進行，即使台灣民主社會可接納不同表達、他也肯定勇於表達的作法，但這次學生反服貿占領國會，使國家不能運作，「我就會有不同看法了」。

【2014-03-31/聯合報/B1 版/高雄屏東台東・運動】

從以上兩則報導，我們不難發現《聯合報》對於太陽花運動多持批判立場，或儘管表達支持表達意見的自由，但仍然要守秩序、守法。我認為這是對於人民的權利規範觀點，因為社會運動必有起因，但是報導中的主角卻都隻字未提起因為何？為何會引起這場社會運動？以及該如何改善？甚至對於當時執政的馬英九也未提出建議，只是一味指責參與運動的學生們的失序或暴力而已。更別說是認為此學運會帶來好的結果了。

兩相比較之下，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同一個社會運動，因為兩大報不同的立場，而有觀點南轅北轍的報導出現。因此，我認為就「民主」此議題來說，政黨傾向確實會影響報導者的社會再現。

六、本章小結

本章利用庫博的語料庫分析軟體進行《聯合報》與《自由時報》中和「民主」有關之議題的語料庫分析，主要有以下三個步驟：

（一）詞頻分析：主要利用軟體計算每個單詞所出現的數量，通常關注在出現頻率高的單詞，不過，有學者也指出缺席的詞彙有時也具有詮釋意義，不應完全遺漏（Van Dijk, 1997）。從本文的社會再現觀點來看，我們其實可將出現頻次較高的詞彙，看成是結構取向中的核心要素，亦即較穩定不變，且會決定社會再現的意義（Abric, 1993）。同時，在文中，我們也將這些高頻次詞彙再依語意細分為六大類，主要有「地理區域、時間和事件」、「選舉與投票」、「國家、政府、國會與政黨」、「由人民統治」、「人權、法治與規範」、「經濟與媒體」等六類，其中第一類佔絕大多數的比例。

（二）搭配詞分析：除了單一詞彙的出現次數外，研究者還會想瞭解該字彙較常與哪些詞彙一起出現，因此就需作搭配詞分析。以《聯合報》來說，搭配詞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大致符合學者們所認可的「民主」必要要素，但似乎較缺少強調政府的歸責性與公民社會等部分。而《自由時報》中的「民主」之搭配詞似乎更偏向支持人民的權利，但其實也較缺少政府的歸責性。

（三）關鍵字脈絡分析：若我們想解讀文本的意義的話，光是瞭解「民主」與哪個詞彙常一起出現可能還不夠，我們需要回到原本的文本中去探究才行。這個階段的分析成果，確實指出《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對於同一件和民主有關之事件，往往有著南轅北轍的報導方式或呈現方式。前者往往是接受中國的想法而反過來批判民進黨或是社運；而後者則通常持批判中國政府的立場，並讚揚社會運動對於臺灣民主化的正面效果。

以上為本章對於媒體如何再現「民主」的大致結論。至於在下一章，我將以「民主語意區分量表」來挖掘「民主」一詞在常民心中的語意空間。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第五章 民主語意區分量表

上一章主要針對報紙進行語料庫分析，雖然得到了關於「民主」之類似於社會再現的結構學派之核心要素，如：中國、台北、兩岸、臺灣等等。也嘗試以搭配詞分析來探究報紙中的「民主」往往和什麼概念或詞彙一起出現？換句話說，就是提及「民主」時，哪些概念常常會連結在一起，形成一種類似於網狀的結構。最後，則是將字彙放回其使用脈絡中去觀察其如何在句子中構成意義、使人瞭解。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內容作為一種社會再現，實際上是因為大眾媒體不只是客觀地反映實在，實際上還會再現實在，也會建構實在（Höijer, 2011）。

某種程度上，上一章已嘗試從報紙新聞的角度打開了一個關於「民主」的語意空間（semantic space）、或說認知、情感與態度的意義空間（cognitive, affective, and attitudinal meaning space）。至於本章的研究設計，則直接指向常民，以問卷的方式來捕捉關於「民主」之語意空間的一個側面。

一、填答者概況說明

本研究為在 Google 表單上設置自行設計的「民主意義量表」，再於 PTT 或是臉書各大交流版，廣邀受試者來參與填答。為了收集到更多問卷資料，也有設計小型的抽獎活動作為誘因。

本問卷在截止時，總共收到 272 份問卷，而且研究者已設定每題皆須作答才會計入資料庫，因此不會有缺答現象。但由於本研究希望瞭解臺灣人對於民主的想法，因此在避免混淆結果的情況下，做了必要的篩選。只有 18 歲以前不住在臺灣（包含外島）者有 6 位；而只有 18 歲以後不住在臺灣者也有 6 位；另有 2 位為不論 18 歲以前或是 18 歲以後都不住在臺灣者。因此刪去這些問卷後，總共有 258 位。

在原本的問卷設計上，年齡的部分為 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51~60 歲以及 61 歲以上，但為了與上一章的歷史分期作配合，本研究就將年齡層濃縮為三個世代，主要是青年世代（30 歲以下）、壯年世代（31~50 歲）、以及年長世代（51 歲以上），青年世代至少見證過學生運動的風起雲湧，而壯年世代則經歷過臺灣幾次民主化的重大事件（如：第一次全民直選總統或第一次政黨輪替等等），至於年長世代則多半經歷過從解嚴到戒嚴的這段時期。填答者概況請參考表 5-1。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表 5-1 填答者概況（本研究整理）

第一層類別	第二層類別	比例
世代	青年	56.2
	壯年	38.7
	年長	5.1
性別	男	51.9
	女	48.1
18 歲以前居住區域	北	43
	中	17
	南	38
	東	1.6
	外島	0.4
目前居住區域	北	69
	中	7.8
	南	22.4
	東	0.8
	外島	0
職業類別	學生	43
	非學生	57
是否曾修習過政治學相關課程	是	32.6
	否	67.4
是否有政黨偏好	國民黨	7
	民進黨	25.6
	時代力量	7.4
	社民黨	3.1
	其他泛藍	1.6
	其他泛綠	10.1
	無政黨偏好	45.2

二、事件排序分析

研究者從臺灣的民主化發展歷程中，挑選了十個我認為有代表性的事件，再請填答者們排序：將他們認為與「民主」最相關者排序為第一，次相關者排序為第二，其餘依此類推，表 5-2 即為依照世代分層的排序結果。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表 5-2 三個世代對於歷史事件的排序結果（本研究整理）

	青年世代	壯年世代	年長世代
1	解除戒嚴	解除戒嚴	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
2	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	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	第一次政黨輪替
3	第一次政黨輪替	第一次政黨輪替	解除戒嚴
4	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學運	中華民國憲法施行
5	民進黨成立	民進黨成立	民進黨成立
6	太陽花學運	中華民國憲法施行	野百合學運
7	中華民國憲法施行	太陽花學運	李登輝繼任總統
8	李登輝繼任總統	李登輝繼任總統	太陽花學運
9	自由廣場更名	自由廣場更名	自由廣場更名
10	凱達格蘭大道更名	凱達格蘭大道更名	凱達格蘭大道更名

（一）青年世代與壯年世代相類似

從以上的排序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原則上青年世代與壯年世代對於歷史事件的排序結果非常類似，在順序上大約只有第六順位和第七順位交換次序而已，其餘皆相同。而且原則上都認為解除戒嚴是和臺灣的「民主」最相關的事件，接下來就是第一次實施全民直選總統與第一次政黨輪替。這大約可以看出一個趨勢，那就是普遍來說，青年世代與壯年世代較為看重與「民主」有關的人權面向，或者說，是法治（rule of law）的積極保障人權面向、而非消極的限制面向。因為解除戒嚴意指解除對自由與人權的限制，而第一次全民直選總統除了是選舉事件外，也和全民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及行使基本人權有關。至於第一次政黨輪替，則是指終結了國民黨執政 55 年的局面，而且還是經由民主的選舉方式，而非革命或暴動。反而兩次的野百合學運與太陽花學運，相比於前幾事件，與「民主」的相關性並未太高，而且兩個世代普遍都認為：野百合學運與「民主」的關連性還大於太陽花學運。我認為，除了野百合學運確實對於學生運動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外；當太陽花學運發生時，有許多當年的野百合學運成員也都站到第一線聲援與保護學生；另外，則是當年的許多成員目前都已在大學裡面教書或是進入民進黨任職，像是：范雲、林佳龍等等，所以對於大眾來說有較大的影響力。

然而，兩個與故事起頭有關的事件，像是：其一是民進黨成立，其二是中華民國憲法施行，其實都被認為與「民主」的相關性較小。無獨有偶地，何孟樺（2016）的訪談資料確實也指出：民進黨創黨雖常被視為是臺灣民主轉型的核心，但對於基層參與者來說反而意義不大。至於中華民國憲法的施行，似乎是有著曖昧的角色。首先，憲法之制訂與施行通常會被視為是法治國家的起點，但是常有例外，好比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有憲法，但至今都還不是法治國家；另外，則是從臺灣的民主化歷程來看，中華民國憲法實施後，因為國共內戰而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且不斷被延長，所以實際上並未真正施行憲法。由此可推測，這大約是人們不認為比起其他事件，中華民國憲法施行會和「民主」較相關，當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然，這也隱約指出憲法或法律的落實遠比憲法的制定還要重要。

至於最後兩個更名事件，是研究者受到歷史學家 Nora（2012）的啟發，將空間的所在地視為歷史記憶的場所。當然，不可否認地，在此觀點下的記憶場所，除了實質可見的空間或建築物外，實際上仍是象徵意涵大於實質的意涵。也因此，似乎都不被認為與「民主」有極大相關。言及此，綜合上述關於憲法落實的重要性，也許可和何孟樺（2016）的論文再作一次參照。在政治乃至於本文所關切的「民主」領域中，行動似乎比只有理念或僅有動動嘴巴而已要來得有影響力。某個程度上來說，這和 Schumpeter（Huntington, 2014）所倡議的，以選舉為核心要素的程序性民主有異曲同工之妙。

總而言之，從表 5-1 我們可以發現，青年世代和壯年世代對於歷史事件的排序相當類似。他們都看重人權與民主的關係、而某些重點事件的開頭也未必會被認為就與民主有極大相關，最後則是隱約有所暗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政治相關領域，實質行動似乎比象徵意義來得更有正面評價，從另外一個臺灣的例子來看，臺灣的副總統通常是作為被為總統的角色，所以象徵意義大於它的實際作用，所以當一般人在回憶某幾任總統時，可能只會對於總統有印象，而對於副總統較無印象，因為他在政治領域上，未必能夠展現出他的實質行動。

（二）年長世代與另兩個世代略有差異

從表 5-2 我們可以發現，排序的最後兩個與前面兩組相同，所以我想原因應該仍是政治領域的象徵性意涵，相較於實質的行動，可能仍較少被看重。但與其他兩組對照，中華民國憲法施行的排序是較為前面的，或許和他們經歷過此年代，而較為熟悉有關。而特別的是，前兩名其實都和選舉有關，排序第一是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排序第二是第一次政黨輪替，某種程度上，這和選舉一直在民主的再現中佔有核心地位可能仍是有關的，而且對於年長世代來說，他們並非一出生就已進入全民投票的時代，可能也因此認為投票選舉與民主較為相關，反而是解除戒嚴的排序不像其他兩組那麼前面。我認為某種程度上，這也和他們讚賞的傳統價值觀有關，比如說：年長世代通常希望互動時要有禮貌、有規矩，然後追求和諧和安定，因此，他們可能對於戒嚴時期的穩定狀態較為懷念，像是可能非常懷念蔣經國的時代等等。像是吳乃德（2004）就曾發表一篇文章來討論懷念蔣經國的現象，他提出的理由是：蔣經國執政時期恰好是台灣經濟最繁榮的時候，但這其實是美援和全球資本主義分工的結果；再者，壓迫性愈強的獨裁者、愈能受到人民愛戴，其主要原因是「所有不利於獨裁者和其施政的負面訊息都禁止公開傳播」；最後，則是曾經受蔣經國提攜的政治人物，如今大部分都仍活躍於政壇。今日國民黨和親民黨的領導階層，以及主流媒體都可說是昔日威權體制的一員。因此，他們不可能呈現蔣經國威權獨裁的面向、也會想辦法掩蓋其他不光彩的資訊。

以上主要是本研究針對歷史排序所做的分析，我們稍微回來看一下 Liu（2005）等人，他們提出通常對於長時間的歷史的再現會以年代較近的為主。但其實我認為這忽略了歷史事件的脈絡性，亦即不見得每個歷史事件對於人們再現的影響力

DOI:10.6814/NCCU201901151

都是等同的。好比說：本研究主要就指出，其實年代的差異，就會造成其對於民主的再現有所差異。

三、民主語意區分量表分析

本研究根據 Osgood 等人（1957）的概念，設計了民主語意區分量表，以探索民主語意空間的一個側面，完整量表請參考附錄一。語意區分量表的結構主要為每組相對的詞語間，有七點量表，請受試者評定他認為「民主」比較靠近哪一邊？表 5-3 為收集受試者資料後，對每項結果作 Kolmogorov-Smirnov 考驗[24]後的結果，以判定各詞語分數分配的偏態，然後把各詞語的顯著左右傾向用箭頭來表示，偏向左邊以←來表示，偏向右邊則以→來表示。本文已事先將受試者的年齡分為三個世代，分別是青年世代、壯年世代與年長世代。其結果如下：

表 5-3 民主語意區分量表分析結果（由研究者整理）

		青年	壯年	老年
1	有必要—無必要	←	←	←
2	很理智—情緒性	←	←	
3	樂觀—悲觀	←	←	←
4	有力—軟弱	←	←	
5	很熱—很冷	←	←	
6	潔淨—骯髒	←	←	
7	變化—穩定	←	←	←
8	幸福—悲傷	←	←	←
9	有意義—無意義	←	←	
10	很硬—很軟	→	←	
11	自由—束縛	←	←	←
12	很健康—不健康	←	←	←
13	光明—黑暗	←	←	
14	相信—懷疑	←	←	
15	快捷—緩慢	→	→	
16	服從多數人的意見—尊重少數人的意見	←	←	
17	保障人權—保障安全	←	←	
18	追求正義—維護公平	←	←	
19	台灣—美國	←	→	→

[24] 這是無母數統計中關於適合度（goodness of fit）的檢定，主要是比較研究所得的樣本分布與假設上的理論分布之間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所採取的理論分布為均勻分布。故而本研究的虛無假設為「實際分布與理論分布一致」，若檢定結果達到顯著即可拒絕虛無假設，也就是說，關於該組詞語的分布並非均勻分布，實際上乃是有左偏或右偏等情況出現。

DOI:10.6814/NCCU201901151

20	台灣—中國	←	←	←
21	台灣—香港	←	←	←
22	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	←	←	←
23	舊型大黨—新興小黨	→	→	←
24	選舉—罷免	←	←	
25	人人皆可投票—某些人才可投票	←	←	←
26	票票等值—選票可依情況（如：性別、族群等）加權	←	←	←
27	拼經濟—堅守主權	→	→	→
28	保障自由—遵守法律	←	←	
29	直接選舉—間接選舉	←	←	←
30	憲法—公投	→	←	
31	營利媒體—非營利媒體	→	→	
32	大眾媒體—小眾媒體	→	→	
33	新媒體（如：網路）—舊媒體（如：電視、報紙、廣播）	←	←	
34	菁英決策—庶民決策	←	←	
35	社會運動—民意信箱	←	←	
36	符合共同利益—維護良善民風	←	←	←
37	完美的制度—夠好的制度	→	→	
38	可供選擇的制度—不得不然的制度	←	←	
39	大勢所趨的制度—需努力追求的制度	→	→	
40	暴力抗爭—非暴力抗爭	→	→	
41	抵抗權威—順從權威	←	←	
42	儒家—道家	←	→	→
43	基督教—佛教	←	→	
44	規劃未來遠景—彌補歷史錯誤	←	←	
45	帶來創新—維護傳統	←	→	
46	政策執行的效率—政策執行的周延性	→	→	
47	提高國民所得—保障最低收入	→	→	

（一）量表設計說明

在本文的設計中，此量表主要分為兩部分，前 15 題原則上很接近 Osgood 等人（1957）的原始設定，就是將相對的形容詞放在一起，藉以探勘目標詞語的語意空間，而本研究的目標詞語自然就是「民主」。但在這個設計中，往往也會放進一些普遍上與目標詞語較不相關的語彙，譬如形容溫度（很熱/很冷）、速度（快捷/緩慢）、亮度（光明/黑暗）等概念的詞語，其出現在量表內容的目的是為了讓受試者以隱喻的方式來表達其體驗內容，基本上可在顯然合理的理由外，另闢表

DOI:10.6814/NCCU201901151

達空間。

至於另外 32 題，則從民主相關的理論中抽取我認為重要的對比概念而來，這些概念未必都是相反的，可能只是相互對照而已，而且基本上應該都沒有標準答案，比如說：選舉/罷免、符合共同利益/維護良善民風、憲法/公投等等，希望能讓受試者在兩難的情境中，選擇他認為與民主較相關的詞彙，藉以探索語意空間中的某個面向。

（二）整體結果說明

1.三個世代的共識：我們先從三個世代的偏向皆相同的詞語說起，比如說：有必要的、樂觀的、變化、幸福、自由、很健康、台灣與中國偏台灣、台灣與香港偏台灣、民主進步黨、堅守主權、人人皆可投票、票票等值、直接選舉、符合共同利益。由於這些詞組在三個世代都呈現相同的偏向，因此，從社會再現的理論來看，這些詞彙應可說是處於核心位置，意即所謂的核心元素，是較為穩定不變的、而且會決定再現的意義。另外，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這些詞語可能也會是專家知識本身就有提及的部分，換句話說，這些詞語可能就是 Moscovici 所謂的霸權式的再現（hegemonic representations）。

我們看到「有必要的」，這確實與當今的世界潮流相符，因為民主如今已獲得正面評價，是個好詞。另外，隨之而來的，「樂觀」的意思，可能不只是一種理性上的評估，還帶有一種情感上的期待，而且通常在時間上是指向未來的，所以這似乎同時指涉了語意或再現的情緒面向和熱情面向（Jovchelovitch, 2007）。這種情緒上的期待，我認為需跟以下兩個詞語一起看，在「台灣」和「中國」間，以及「台灣」和「香港」間，民主的語意都與「台灣」較有關，還有，在「民進黨」與「國民黨」之間，民主的意義也較偏向「民進黨」。這三者都相當符應現實。這意思是在說，即便再現有其建構性，但其內容也絕對不會是天馬行空的，否則這種再現應該不會進入日常生活中而被保留下來。

另者，「拼經濟」與「堅守主權」間，相當有趣地也偏向了「堅守主權」。從本組詞語的結果來看，三個世代仍較為看重民主的正面價值，這與前面 15 組詞語所顯示的正面偏向仍相當符合。這兩個對比概念在泛藍與泛綠傾向的媒體似乎各有偏好，泛藍媒體通常偏愛「經濟凌駕民主」的敘事，而泛綠媒體則偏愛「民主至少和經濟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敘事，所以，基本上，我仍把他歸類為符應現實的再現。尤其是近日來，中國不斷以強烈的措辭要破壞台灣的民主制度，而蔡英文總統則強烈以維護主權的論述回擊。換句話說，再現仍會跟著現實情況而變動，尤其是這種本來具有爭議性質的再現。

正如歷史學家 Carr（2009）在討論歷史事實時，認為即便歷史事實的選取、編排帶有歷史學家的主觀性，他也不認為此主觀性可無限上綱，甚至落入英國哲學家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帶有唯心主義色彩的歷史哲學中。在歷史學家腦中重建過去，的確仰賴經驗證據，不過此一歷程，並非經驗性的；相反地，此一重建過程會主導事實的選擇和詮釋。歷史因而是歷史學家單獨製造出來的，書寫歷史就變成製作歷史的唯一途徑。由此觀之，歷史事實絕非原原本本的來到我們

DOI:10.6814/NCCU201901151

面前，它們是由記載者的心靈所反射出來的。那麼，詮釋既然無可避免，就需解讀作者的弦外之音。再者，歷史學家對於所想要了解的人物之心境，要有「富於想像力的了解」，但是 Carr 在這裡的討論，略顯粗略。我認為他所謂的「富於想像力的了解」，正是德國社會學者 Max Weber 所謂的瞭悟（verstehen）——意義性的理解（meaningful understanding）——之能力，經由此過程，可以詮釋並理解他人的主觀意義。但這絕對不是設身處地的去了解一個基於感情的行動，而是要能掌握住行動所能被了解的主觀意義（Ritzer, 2000）。

而將以上兩種意涵一起看，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再現的功能之一，亦即區分我群和他群，建立好的我群意識。意思是說，這些正面的意涵都和我們自身有所關連，正是因為民主都有好價值，所以我們也要將自身歸為好的那一邊。

另外，三個與投票行為有關的詞語「人人皆可投票」、「票票等值」、「直接選舉」則再次說明了投票或是選舉在有關民主的再現中，是非常顯著與具有穩定性的。最後，我們可以發現「符合共同利益」三個世代都認為與民主有關，但其另一面是維護善良民風，這一題的原本目的是想瞭解民主的目的究竟為何？是古典時期帶有道德意涵的共善呢？還是較為近代的共同利益？就上一小段的分析來說，利益是實質的，但是民風是難以觸摸到的，再加上利益確實可以帶給人們實際的幫助，所以這個結果似乎不那麼令人意外。

2.青年與壯年世代的共識：從結果看來，這兩個世代絕大多數的結果都是一樣的，這與上一段的歷史排序結果相符。某種程度上，似乎仍可說是這兩個世代的價值觀較為相近，即便是有著年齡的差距。但是這兩個世代的相近性，仍可從台灣的民主化歷程與教育制度（James H Liu et al., 2005）來解釋。本段的民主化歷程是指，壯年世代出生的時候，台灣已經進入逐步民主化的歷程了，換句話說，其所成長的環境，已較上個世代開放，基本上可能和青年世代所成長的社會氛圍相差無幾；再者，從正式教育來看，教科書在編輯上不但因一綱多本更為鬆綁，而且也加入更多台灣本土文化的討論，不再從中國的觀點思考台灣，而是直接以台灣作為主體來思考。我認為這兩者都是造就此兩個世代較為接近的原因。

那我們就進入詞語量表來看看兩個世代相同的部分，首先，前 15 組的正面評價有：很理智、有力、很熱、潔淨、有意義、光明、相信。我想先從「相信」開始，因為這兩個世代皆成長於臺灣民主化已開始發展的時代，亦即戒嚴之後，所以並未將台灣歷史中「白色恐怖」時期的害怕，銘刻進入身體的儀態中。但是年長世代，在這兩個對照的概念中，則無法顯示出偏向。將某一套感知世界的方式銘刻進身體此概念，是由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1990）所提出的，他認為慣習（habitus）總是和場域（field）有關。場域是一個社會空間，它是行動者與他們的社會位置所坐落之處。當一個人進入場域時，它同時進入了一套與場域相連的前提預設，而這些預設可能都是無意識的，難以被自身所察覺的，而且浸淫越久，就越習焉不察。每個場域裡都有其因為被強加而認同的價值或信念，也可說是無意識的行動基模，同時也有一些與身體有關的儀態（hexis），像是姿態、姿勢、體態、節奏、動作以及和身體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會在個人的經驗中，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被無意識地內化。正是因為年輕世代與壯年世代並未經歷過極權主義的統治經驗，所以它們會對民主抱持相信的態度，而實際上，在年長世代是不顯著的，亦即沒有特別偏向相信或懷疑。好比說，Markova（2004）就曾指出，在傳統的民主國家中，與信任相對的乃是風險（risk），但如果曾經歷過極權主義的統治，對立於信任的就會是害怕（fear）。

至於「潔淨/骯髒」，實際上在年長世代是偏向不顯著的，我認為這也與前面所述的歷史經驗有關，比如說：本省籍的爸媽們通常都會告誡說：政治很骯髒啊、不要碰啊、盡量不要涉入政治啊、等等的避諱現象，但是外省籍或是泛藍的父母們，似乎較少避諱談論政治，我在下一章會有比較詳細的分析。我認為在前 15 組裡，出現一個有趣的結果，那就是「快捷/緩慢」這組竟然偏向緩慢，但是年長世代組仍然不顯著。畢竟緩慢通常有比較負面的意涵，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民主的必要要素的話，會發現緩慢似乎是必然的結果。因為只有獨裁政府才能完全依自己的意思發號司令，然後就快速達到自己想要的目的。但是民主的政府體系，可能需要層層諮詢、與公民團體討論、又要符合法治程序，不能只依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在效率上自然會比獨裁政府來得緩慢，這也是為何在「政策執行的效率/政策執行的周延性」此組偏向周延性的原因，我認為兩者可一起參看。

至於其他和基本人權面向有關的，比如說：保障人權、保障自由、社會運動、暴力抗爭、抵抗權威等等，大致上都和現有的民主理論相扣合。但在追求正義或公平時，是偏向正義的，這某種程度上也可和保障最低收入一起參看，也就是說固然要保障人權，但是保障的面向是以每個人的情況作為考量基準的，而非是齊頭式的平等。至於在媒體方面，兩個世代都偏向非營利媒體、小眾媒體與新媒體，這三者的意涵雖未必相同，但是可能都與現在的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25]世代的偏好有極大關連性，下一章會從訪談資料中討論這個議題。

再者，則是三個制度層面的意涵，結果是夠好的、可供選擇的、需努力追求的，夠好的制度是指雖有其不完美處，但仍可改善與追求，其實這也是許多民主理論學家正在做的事。另外，即便民主制度受到大家讚揚，但其自身的設計仍保留了可供選擇的空間，亦即保障表達自由或言論自由等等，不會是一言堂而已，也不會強迫每個人都要接受；但是，別忘了，民主也是需要努力追求的制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這可能與青年世代和壯年世代都瞭解到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不是一蹴可幾的，再加上中國也常常語帶威脅要破壞台灣的民主制度，所以兩個世代都給予好的評價，希望能守護這個制度。

最後，則是一個與期望有關的項目，就是「規劃未來遠景」。這是一個關於正向、且朝向未來的投射。前面談到許多結果都是正向的，比如說信任、光明、潔淨，而且也是一種需要努力去追求的制度，換句話說，人們會將情感投注在其中，並據此來調整現況或挑戰現況。正是因為有所期待，才會產生朝向未來的動力。這種預期性的再現（anticipative representations），與時間之未來向度有關的再現，未必在所有的議題中都可以見到（Philogène, 1999）。但是政治領域，正如

[25] 意指從小即生長在具有各式數位產品的環境中，所以對於各式數位產品相當熟悉。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前文所述，不但和每個人現在的生活都息息相關，而且也和美好的未來與期待有關，亦即，一般人之所以關心政治或民主，正是因為他們希望藉此實現更美好的未來，不論是政治制度或是政治文化上的，也因此可以拉出這個語意空間讓我們看到。

（三）「民主」語意區分量表小結

首先，本量表的前 15 題與 Osgood 等人（1957）的原初設計相似，都是屬於對比或矛盾的形容詞詞組。除了「很硬/很軟」此組外，其餘的詞組在三個世代或是青年與壯年此兩世代都有相同的偏向，而且都偏向正面意涵。從結果來看，「民主」的語意不但偏向有力、很熱、而且是有意義的，那麼這組「很硬/很軟」，很可能也與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兩面向有關，好比說：作為承先啟後、出社會多年的壯年世代，可能認為目前的政治體制或政治文化可能較難以改變，因而偏向很硬；但青年世代可能因為剛出社會，其所使用的社群媒體也多半具有「同溫層」效應（意指多半接觸到的都是與自己意見或價值觀相似的朋友），所以可能會認為政治體制或政治文化較為軟性，具有強烈改變的可能性，再進一步來看，這似乎也透露著烏托邦的可實現性，壯年世代縱使認為「民主」具有正面意涵，但未必覺得容易實現；反之，青年世代可能認為「民主」的正面價值會有實現的可能性。但此結論仍待更多資料來驗證，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使用語意區分量表的目的，亦即發現某個語意的問題性所在。

再者，在後面 32 組詞語中，有偏態產生，就是值得觀察的現象。因為題目中的設計，很多都是政治理論同時要兼顧的價值，但是在常民心中，其實還是有所偏好的。「臺灣/美國」此組的結果雖然有世代上的差異，但是對我們來說仍是可理解的。亦即，從壯年世代與年長世代的成長經驗來說，他們會認為美國比起臺灣更民主乃是可以想像的，而青年世代由於已成長於「民主成熟期」的臺灣，因而認為臺灣已相當民主也是說得通的。像是量表中的「舊型大黨/新興小黨」、「憲法/公投」、「帶來創新/維護傳統」等詞語也有類似的情況，因為不同世代所具有的生活經驗以及當前的社會情境（比如說：臺灣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才剛舉行完「婚姻平權」的公投），讓他們對於某些概念產生不同的語意空間，因而在結果上有世代差異。但是因為我們可從臺灣民主化的歷程來理解這樣的差異，所以不會感到怪異。從研究方法的觀點來看，不論是三個世代皆相同、其中兩個世代有相似性、或是世代之間彼此有著可讓人理解的差異性，這都可顯示出本研究之「民主語意區分量表」的效度。

最後，則是一些有待解釋的詞組，除了前述所提的「很硬/很軟」外，還有「菁英決策/庶民決策」、「儒家/道家」、「基督教/佛教」等，似乎都較具有問題性，這正是使用語意區分量表的目的。但假若我們將菁英決策和直接選舉一同參看，也許可推測一般人仍希望能選賢與能，希望能直接選出具有能力的人來幫一般人作決策，如此一來，一般人只需透過民意代表等監督機制來實現心中理想的政治制度即可。至於「儒家/道家」、「基督教/佛教」此兩組詞語，由於詞語本身已去脈絡化，再加上未收集到更多相關資料，因此可能得留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四、本章小結

本研究的線上問卷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受試者的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十個與臺灣民主化有關之事件的排序，第三部分則為民主語意區分量表。

就事件排序來說，青年世代與壯年世代的結果頗為接近，而且都認為「解除戒嚴」和民主最相關，但是年長世代則認為「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比「解除戒嚴」要來得和「民主」相關，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於「投票」的感受度不同。對於年長世代而言，能夠全民直選總統是一段相當漫長的過程，而且「總統直選」代表的也是一種政治制度的主動參與及直接參與，這對於不一定參與過黨外運動，或只是在家看報紙、看電視的一般人來說，可能遠比解嚴的開放黨禁、報禁等措施更能感同身受。但對於其他兩個世代來說，其實可能在成長階段就已經非常習慣能夠投票選舉這件事，因此造成這樣的差異。

至於民主語意區分量表的部分，可以發現，不論是哪個世代，「民主」對他們而言都具有正面意涵，像是樂觀、幸福、很健康等等，這與本文前一章的媒體再現以及陳雨君（2010）對於媒體的敘事分析結果完全相反。亦即，媒體通常都強調或報導政治的負面意涵，而較少關注政治的正面意涵或是帶來的正面效果，但是，在去脈絡的情境下，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期待仍是正面的。換句話說，臺灣的媒體多半只關心實際層面的報導，而不像是美國 ABC 主播 Barbara Walters 或是 CBS 的主播 Walter Cronkite 一樣，還會關注價值或輿論上的領導。而在語意偏向的趨勢上，與第二部分的結果相似，青年世代和壯年世代確實也比較接近。比如說，他們會認為「民主」和有力、潔淨、光明、相信有關，也和保障人權、追求正義有關；在媒體面向上，比較偏向非營利媒體、小眾媒體和新媒體等，在意見表達上也偏向抵抗權威和社會運動等等。從研究方法來看，與一般日常知識較相符的部分，可視為本研究之語意區分量表具有效度；至於與一般日常知識較不同的部分，則可體現出使用語意區分量表的目的所在，亦即開啟一個關於「民主」之語意空間的新面向，亦即關於「民主」語意的問題點所在。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第六章 民主與再現

本文第四章主要偏重在來自於媒體的「民主」社會再現的內容，而第五章則嘗試從一般人的角度打開一個情感意義空間，亦即從問卷的設計中，除了可以得知人們的思考內容外，還隱然標誌出他們對於他者的情感面向。而本章則進入深度訪談的部分，與受訪者進行一對一約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的訪談，希冀能夠得到前面兩章所尚未收集到的資料。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採取深入訪談的研究方法，訪談了 15 位受訪者，這 15 位受訪者是研究者採取滾雪球方式，請親朋好友推薦適合的人選，再由研究者詢問他們的受訪意願而確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請參考下列表 6-1，本文都會以代號的方式呈現各受訪者。

表 6-1 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出生年份	目前職業
A01	男	1990	學生
A02	男	1983	研究員
A03	女	1982	學生
A04	男	1989	研究助理
A05	男	1951	退休
A06	男	1955	補習班老師
A07	女	1998	學生
A08	女	1965	家管
A09	女	1950	退休
A10	男	1952	退休
A11	女	2000	學生
A12	男	1999	學生
A13	女	1979	研究員
A14	男	1978	基金會講師
A15	男	1988	約聘公務員

從表 6-1，可以發現就受訪者的性別來說，男性有 9 位，女性有 6 位。另外，本論文依研究目的而言，也分為三個世代，每個世代各有 5 人：1989 年以後出生的屬於青年世代，有 A01、A04、A07、A11、A12 等 5 人，這個世代至少都經歷過臺灣民主化的成熟期階段；至於 1969 年到 1988 年出生的屬於壯年世代，有

DOI:10.6814/NCCU201901151

A02、A03、A13、A14、A15 等 5 人，這個世代至少都成長於臺灣民主化的深耕期；年長世代則為 1968 年以前出生的，有 A05、A06、A08、A09、A10 等 5 人，此世代有經歷過非常完整的臺灣民主化過程，亦即在 1987 年解除戒嚴時，至少都已有 19 歲左右了。

二、社會再現（的改變）受誰影響？

不論是從 Mead 的符號互動論或是 Winnicott 的對象關係理論來看，我們對於符號的操作能力，都來自於與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互動，雖然通常是母親，但也可能是父親。但不論是哪一個，都指出我們對於再現的學習與內化，從最原初的階段來看，會與原生家庭（的成員）有莫大關係，之後，可能便是與同儕有所關連。因此本小節會試著說明這兩者的影響。

（一）家庭的影響

以受訪者們的經驗來說，雖然他們目前可能都居住在北部地區，但絕大多數都來自於臺灣的其他地區，像是 A02 與 A15 兩位山地原住民，就分別是來自花蓮的阿美族與台東的排灣族。

那麼，我感興趣的問題在於：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殖民政策相當細緻入微，因此原住民多半已成為順從國家的人民；而後來的國民黨接收臺灣以後，雖延續相關政策，但實際上對於臺灣的原住民依舊相當不友善，公領域部分，利用國民教育和考試制度將原住民族原本的文化邊緣化；至於部落生活的部分，也會以或明或暗的權力介入相關的頭目推舉過程（尤剌拉菲, 2007）。那麼在當初，正式教育裡面以漢人的觀點在強勢主導，而缺乏原住民歷史的情況下，在家中，父母親是如何與他們談論自身的族群歷史、以及漢人主導的國家歷史呢？

> 「我爸媽都是國小教師，後來我爸是國小校長退休，所以算是公教家庭背景。雖然是廣義的公務員，但是基本上在家裡也不會談到什麼政治議題或是公共政策的討論。……族群歷史的部分，這樣可能就分兩塊了，但是日常生活的部分，狩獵行為是有在做，這是為了延續什麼部落生活，保存資料文化，但是在意識層面，就比較沒有關注這個事情。是因為後來是到高中大學，因為遇到更多來自不同部落的原住民同學，所以說會習慣會把這種事情拿來和同學討論。不過我爸也不會特別教我們族語，雖然他和老一輩的都講族語，但是他在家都和我們說中文，反而是後來上了大學我才重新去學族語的」（A02）

> 「在國中以前，我都住在台東大武的部落裡。然後國中的時候，才到台東市區去念私立國中。我爸之前是先當過職業軍人，退伍後就去國中教書，當國中老師，然後也擔任國民黨的黨代表。我媽雖然是家庭主婦，但是娘家那邊也都和國民黨很有淵源……所以應該還是算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公教家庭的背景。在家裡，爸媽都和我們講現代漢語，害我後來都覺得有點生氣，為什麼都不教我們族語？他其實也是希望說要我們多融入主流的社會，族語也是到了大學以後才重新回去學的。但是他和部落的長老們也都是講族語為主。而且他其實也不太會和我們講關於排灣族，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是等到我上大學後，知道更多原住民的歷史和文化後，回來和他討論，他才會說加入國民黨其實也是很身不由己啦、有時代的背景在，高中的時候就被教官強迫加入了。其實參與政治都是身不由己的、有很多牽絆啦，重點是要利用這些資源作一些對我們部落有利的事。」（A15）

從兩位壯年世代的生命史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父母已多屬於本研究中的年長世代了。兩位受訪者的爸爸恰好都是老師，A02 的爸爸還曾當到小學校長退休，可以發現他們的漢化程度相當深，也許都和進入廣義的公家體系（學校）有關。漢化程度很深顯現在：其一是自身族群歷史的闕如，不會主動告訴下一代關於自己阿美族或是排灣族的歷史，似乎順從於主流教育體系中的漢人文化觀點，至少不會主動提出異議；其二是自身語言的闕如，和下一代的語言使用上以現代漢語為主，雖然他們和上一輩的耆老還是使用族語為主，但是可能是為了方便溝通的緣故，而非傳承語言的原因，因為這些耆老們不見得會說現代漢語；其三是我認為部落文化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開始出現，在一半是部落、一半是現代性的情況下，自身的族群文化似乎逐漸從本真性（authenticity）轉向展演性（Barker, 2004）。這個意思是說，雖然有在進行著慶典或狩獵文化的儀式，但是已經脫離了這些行動的原本狀態，比如說：祭典原本是為了與祖靈溝通、狩獵原本是為了維持生命所需，這是在人與自然共存的環境中，所發展出來的不同因應方式。但是目前，開始變成像是要表演出一種原住民文化的展演性，彷彿藉由這些表演而讓自己變成了一個原住民，雖然在基因面向上確實是貨真價實的原住民，但是在文化面向上，卻變成一種與原本文化無所連結的空白能指（signifier）而已。像是受訪者 A02 就提及：固然有去狩獵，但是這樣的行動和自己的歷史文化像是分開的兩件事，其實這和前面所分析的歷史文化和語言之缺失有極大的關連性。而受訪者 A15 的父親就更表明，學習漢語是為了更融入主流社會，而且進入政治領域也是為了求得更多有利於自身族群的資源，似乎較為看重利益的層面，而非文化、歷史或傳統的層面。

而我們回到漢人的生命史來看，似乎是另外一種樣貌的故事。好比說，A01 的受訪者是男性，而且是長子，所以在家中獲得比弟妹還要多的資源和特權，當然也有期待。

「主要是我來自於桃園，就是從一個普通的家庭長大，但是關於今天談論的主題就是民主，我覺得我的成長歷程影響我很多。我們家有個非常重男輕女的現象，我是長子，所以說我小時候其實一開始是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被當成天之驕子那樣子，但是妹妹就沒那麼多特權，那後來，妹妹到了四五年級、小學四五年級之後我才漸漸的發現到這是一件很『欺負人』的事情，然後就變得非常的自責，非常的自責。所以說我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非常深刻的意識到我要公平，我認為這個生命經驗，讓後面我對民主那些相關議題的思考有非常重大的關係。」（A01）

我們可以發現，由於受訪者的家庭有非常嚴重的重男輕女現象，因此妹妹一直是被欺負的對象，他開始為妹妹抱不平，也感到很自責。經由這個經驗，讓他更加體會到「公平」的重要性，也影響到他後來對於「民主」議題的相關想法。

至於另一位 A03 的女性受訪者，剛好也從另一個性別的觀點提到父母的期待。

「我的爸爸是公務員，然後我媽媽是家庭主婦，對，她本來也曾經是公務員，但是結婚懷孕之後就辭掉工作，所以她其實常年都是家庭主婦……對，然後因為我爸是軍公教，所以他就很期待兩個小朋友都要去走去軍公教。這個選擇的過程他也會很關心……而且我是老大，所以她對我滿有期待的。而且我們那個家族是一個不太會念書的家庭，然後我下面是弟弟，我們家算是住在市區的地方，然後爸爸是公務員，所以我們家特別注重教育。對，所以我爸原來對我們的期待就是我回去當老師，所以後來我念了師大。也可以提一下，我弟後來其實就是有考上警大，而且是最高分的科學鑑識組，然後他還是有上臺大，但是因為他不想當警察，因為我跟我弟就一個念師大一個念臺大」（A03）

我們可以發現，因為受訪者為女性，所以即使她和弟弟都被期待成為公務員或老師，但是後來只有她順從父母的期望變成老師，而且還被期待能到離家較近的地方教書，至於弟弟則似乎有較大的選擇權或抵抗權，雖然考上了警大，但選擇了一條他自己想選擇的路。

（二）同儕的影響

然而，很多受訪者都提到，自己原生家庭的政治傾向似乎都是偏好國民黨，他們小時候多半也被灌輸「國民黨比較好」的信念。但是到了大學之後，可能因為接觸到更多不一樣的人或相關知識。對於政黨偏好，開始和自己的父母輩不一樣。我們可以看看以下幾個有趣的例子。

「只是我爸偶爾會講一些國民黨的好，但他不會影響到我們。但是他如果在政策，就是在投票事務上面的話，選舉上面的時候，我們回去可以投票，但是他就希望可以投他期待的候選人，他會明白地告訴你。但是進到投票所蓋章的是我，所以我還是就按照我的想法去蓋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章。……平常在家的時候，並沒有很喜歡跟我們討論公共議題，但是到了投票的時候，他就會希望我們投他支持的對象。

我印象中我跟高中同學沒有討論過什麼公共議題，我想一方面是我們那時候花蓮的地區關係，應該沒什麼大型的政治活動或事件，所以比較不會接觸，然後那時候也還沒有投票權，所以不會特別注意到選舉的事情，我印象中沒有對特定的公共議題或政治事情做討論。到大學之後，

接觸更多是關於原住民的相關的政策，討論就會變得比較多。」（A02）

「我是土生土長的屏東人，所以其實我來自南部，其實還蠻保守的的鄉鎮，然後我的爸媽都比較偏軍公教，所以其實我會覺得他們是有點泛藍的，對，所以小時候我們家就都看聯合報，我提這個背景跟我後來整個政治想法的改變有一些關係。……其實後來念師大確實是沒有像臺大，就是會一直在討論一些公共議題。然後電影社當然是相對比較自由、更開放，可是我的感覺是好像也沒有那種集體討論的習慣、沒有任何討論的印象。可是可能那時候網路出現，所以你會通過一些網路串聯，比方說 BBS 或是個人的新聞台，大概知道他們對一些公共議題的想法。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其實會去反思到自己的出身背景……

然後因為它是擴散的點綴，它是溫和的，它不會有一個直接來挑戰你的價值觀。因為我覺得面對面溝通是比較激烈的，因為他是直面的。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我大概可以感覺到說同學裡面有不少人，他們其實是比較支持民進黨，然後我們所謂藍綠，他們是比較綠的。然後可是我也會感覺到那個時候，大概我覺得所謂就是從泛藍家庭裡面出來的那些青年孩子們，他們對很多其實是比較容易、比較容易衝動，就蠻明顯，你會覺得說，是因為以前他們在家裡接收到這方面的資訊也是比較少的。」（A03）

「我爸以前是算那什麼啤酒廠，以前叫什麼公賣局，雖然後來民營化，但是我爸那時候還是煙酒購買就是台啤酒廠，那時候算是公務人員的一種……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大家都覺得台南深綠。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爸跟我媽那邊就是都很藍，所以我以前其實沒有意識到大家覺得台南很綠的這件事情。是一直到比較大一些，我記得是大一的時候、或是升大三大二的暑假，我臺大的同學到台南玩，開車去山上找我，然後看到因為國民黨在很多地方都有什麼民眾服務，他們看到整個嚇到，說他們以為台南沒有國民黨的出沒，但是我那時很習以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為常，因為我們家是藍的，就其實我爸媽他們都會去參加那些服務站辦的活動，然後像我媽就加入婦女會那些也都是周邊的組……」（A04）

同樣地，我們可以看到三位受訪者都出身公教家庭，所以原本家長的政治傾向都偏向國民黨，就臺灣的泛藍支持者來說，此現象似乎也與統計資料相吻合（黃信達, 2017）。不僅如此，在投票時，甚至有家長還會明示希望受訪者投給父母親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但是到了大學後，因為接觸了更多與自己想法相異的同學，而激起更多的火花，並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影響，連帶地影響了自己對於政治的看法或偏向。而之所以受到衝擊，也是因為聽到了更多不一樣的想法或歷史。從 Moscovici 關於社會再現的符號學三角形（semiotic triangle）來看，「自我—他者—對象」三者只要有不平衡的關係出現，就會出現變遷，這就是受訪者 A03 所面臨的情況。因為她離開原生家庭後，在大學裡面遇到很多不同於自己想法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為發聲才會被聽見、才會變成有意義的符號，所以受訪者 A03 遭遇了不同於父母的他者，因而引起她對於政治議題的再現之改變，新的意義出現，進而改變了她原本的再現內容，這被稱為「再現歷程」（re-presentation），以有別於會被當成實在看待的再現內容（representations）（Chryssides et al., 2009）。

三、社會再現的變與不變受什麼影響？

（一）舊媒體的影響

承上所言，上一節主要討論了互動的層面，包括與家人的互動或是與同儕的互動，溝通的層面也略有提及。而這兩者都是社會再現理論堅持「再現」乃是社會性的，而非個體性的主因（Sammut, Andreouli, Gaskell, & Valsiner, 2015），但同時，這些再現也讓互動與溝通變得可能，因為它們會為溝通者鋪排好一個可以相互溝通的環境，其實這些再現就是符號，或更廣泛來說，就是（在地）文化。

但是所謂的互動和溝通僅限於人嗎？是否有包括其他物品呢？但因為研究者無法真正進入受訪者的日常生活，來加以觀察所謂「泛藍父母」所建構的溝通環境，並觀察他們與兒女之間的互動，所以大約只能從訪談的內容中尋找一些蛛絲馬跡。以研究來說，通常物質性的對象比較容易指認，所以我們就看以下的例子：

「我的爺爺奶奶都來自山東，所以你要是問他們是哪裡人的話，他們會說自己是山東人。他們對山東還蠻有認同的，他們也有親自回去過。至於臺灣人，就像他們的飲食習慣還是其他的，他們都會很明顯覺得他跟一般臺灣人有不同。比如說就特別喜歡吃麵，諸如此類……因為我哥大我 12 歲，所以他比我早很多有投票權，所以當要投票的時候，我媽會直接跟他說，要他投誰。就是他們會直接告訴你，但是做不做是你們自己的事，只是說他會有一種下達指令的方式，然後到我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的時候也是一樣。那像他們平常也都會看 TVBS 或是聯合報，我從小就跟著他們看這些電視和報紙長大。」（A07）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他們是有點泛藍的，對，所以小時候我們家就都看聯合報，我提這個背景跟我後來整個政治想法的改變有一些關係。」（A03）

從以上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自認為泛藍的家庭中，基本上都有較為固定偏好的電視台或報紙，這一方面凸顯了臺灣媒體的立場確實鮮明（劉嘉薇, 2018），而且基本上已經變得像大家都知道的常識一樣，所以當你有特定的政治立場時，自然就會偏好特定的媒體。另外一方面也顯示出對於建構再現來說，不只是是和你溝通互動的人有影響力，物質確實也有其影響力。好比說：法國學者 Michel Foucault 的微物理學（micro-physics）就認為：人的心靈乃至於靈魂是權力施加於人身的效果，正是因為一些外在事物的部署與配置，使我們產生特定的身體姿態或是思維方式，當然，這個權力觀點和他的規訓理論息息相關（Foucault, 1992）。亦即，物的安排會導引我們的認識，這在某種程度上，的確還未受到社會再現分析者的重視。但假若社會再現必然牽涉到他者的話，那麼這個他者的主體一定要是能說話發聲的主體嗎？這似乎有待進一步發展。

（二）新媒體的影響

然而，媒體的影響似乎未必只有慣例化（conventionalization）而已。從英國心理學家 Frederic Bartlett 的觀點來看，慣例化可讓文化系統從某個群體移到另一個群體，最後變成一個相對固定且可被接受的形式而被留存下來（Jovchelovitch, 2007, p. 81）。比如說：我們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

「可是可能那時候網路出現，所以你會通過一些網路串聯，比方說 BBS 或是個人的新聞台，大概知道他們對一些公共議題的想法。在那個時候，我覺得其實會去反思到自己的出身背景……」（A03）

「對，還有我還有一點，你剛剛問到說什麼樣的事情讓我覺得民主重要？有，我就想到了我生活中有很大的事情，就是我認識到歐巴馬。好，我坦白說他是我的偶像啦，對，我是他的粉絲。但我對他的瞭解只停留在他的網路上面的內容，也就是那些已經被篩選過的資訊，我不瞭解他，也沒看他自傳，但是他常常讓我感覺到……就舉個例子好了，他在演講的時候有人直接抗議，那個人跟他說，你應該用你總統的權力去做點什麼……

他不但沒有去指責他，反而還解釋得很好，就是你可以要求我，可是我沒有這個權力，然後我們應該要用民主的制度，也就是說你應該去說服你選區的議員，你應該要去找人，去跟他們表達你的意見，

DOI:10.6814/NCCU201901151

鼓勵他們每個都應該要出來投票」（A01）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青年世代或是壯年世代，由於他們已習慣使用網路的關係，所以他們絕大多數的資訊來源都是網路，也就是相對於廣播、報紙、和電視等舊媒體的新媒體。雖然新媒體究竟是促進民主還是阻礙民主尚在辯論階段（謝宗學, 2003），所以從社會再現的觀點來看，似乎還是一種引起爭論的（polemical）再現，可在不同立場或彼此抗爭的群體之間見到（Moscovici, 1988）。但至少從我的研究中指出，網路媒體，亦即新媒體，通常是影響或改變再現的主要媒介，尤其是對於青年世代和壯年世代而言，因為使用網路對他們來說已是相當熟悉的生活場景，這與上一章偏好非營利媒體、小眾媒體與新媒體的研究結果相似。

四、民主與烏托邦

（一）現實中的民主

訪談的結果，多半顯示受訪者認為現實中的臺灣已經是夠好的民主國家，所以僅以一例作代表，像是受訪者 A01 就提及：

「我覺得臺灣雖然離我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制度還有段距離，但是基本上已經算是夠好的民主國家了。至少在言論自由上有保障，也有定期選舉的制度，雖然還是會有一些假新聞的破壞，但基本上可以藉由法律讓這種破壞民主制度的東西受到懲罰，我覺得民主制度還是具有一個自我調整的機制在的，這和中國就相當不一樣，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A01）

但年者世代的受訪者，雖然也都認為臺灣是個民主國家，但是也常常提出中國雖然不是民主國家，不過作為平民百姓也沒多大影響，以下試舉一例說明：

「雖然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對我們這種安份守己的小老百姓沒有太大差別啊，我們就作我們的生意就好，也不用去管什麼政治啊，那就不會覺得有什麼不民主，其實中國也還是有它民主的地方啊，你不參與政治的話，也不是什麼都會被管到」（A10）

從訪談內容中可以發現，為了在中國明哲保身，受訪者仍持有「諱言政治」的態度，而且他還認為作為政治體制的民主與作為日常生活的民主可以一分為二，所以他才會表示「不民主的中國也有民主的地方」，亦即，公領域即便不民主，但是私領域仍可保有某程度上的自由，只要不去觸犯他們的政治禁忌的話。當然，這背後也隱含了「經濟凌駕於民主」的想法，這其實與臺灣泛藍媒體的政治再現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有某種程度上的呼應。。

（二）理想上的民主

從訪談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人對於民主仍有一套理想中的看法，但也不會因此就認為理想中的民主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這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或期待現在的臺灣可以變得更好。以下試舉一例說明：

> 「我覺得臺灣當然可以變得更好、變得更符合我心中理想的民主制度，比如說：大家都能充分瞭解每個候選人的政見、甚至對他們的政見提出批評建議，而不只是看顏色投票而已。然後大家也都能對，嗯……公共政策多關心一下，不是只有在投票時才關心政治。雖然目前看來，還是不太可能做到……不過，我覺得理想的民主不會是烏托邦，而是可以實現完成的。比如說：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具有自我調整的能力，你可以選出一個人，但是覺得他做不好的話，還是可以罷免他；再來，人為的努力還是可以改變這個制度的，像是依靠修法或是社會運動等等」（A12）

這意思是說，其實民主制度本身就有自我調整的能力，其中仍有人為努力可介入的空間，因此可以讓這個制度越來越朝向理想的方向前進，這和上一章語意區分量表所得的結果也相當接近，好比說，多半受測者認為「民主」是「夠好的制度」、「可供選擇的制度」和「需努力追求的制度」。

（三）民主與幸福感

從上一節可以發現，理想中的民主的確帶有正面意涵，那現實中的民主呢？我們可從下面這些例子來觀察：

> 「生活在臺灣這個民主國家，感到最幸福的事喔……我覺得就是可以投票選擇自己想要的候選人耶。尤其是選總統的時候，就覺得自己終於開始對政治有一點影響力了，然後可以透過我的這一票表達自己的意見」（A13）

> 「我覺得生活在臺灣很幸福啊，像是出國的時候，就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因為你拿臺灣護照的話，很多國家都可以免簽，拿中國護照的話就完全行不通」（A03）

從以上訪談中的第一個例子較為偏向對於政治制度（選舉制度）的感受，但第二個例子較與政治文化（國際信任度）有關，然而兩者都指出：現實中的民主，仍可讓一般人感受到幸福感，也就是正面的價值，而且這種正面價值的立基點可能是來自於和其他情境的比較，比如說：從對政治沒有影響力到有影響力、拿臺灣護照可以免簽去很多國家，但是拿中國護照就沒辦法、……等等。綜合以上兩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節來看，不論是現實上的或是理想中的民主，其實都可讓常民感受到正面價值，同時也讓他們能期待過得越來越好，這其實與上一章的民主語意區分量表結論相符合。兩者都顯示，不論是在上一章去脈絡化的抽象再現，或是本章帶有脈絡化的社會再現中，民主都和正面價值有關連，而與媒體再現中的負面意涵不同。

五、民主作為社會再現的說與做

「民主」一詞一直是西方國家政治學或政治哲學的焦點，所以我的研究先將此詞所指的概念放進政治學術語的範疇內來開啟話題。這樣一來，從我的訪談資料中，似乎發現了政治實即有兩個併存面向，亦即「和說有關/和做有關」，其一例是選舉，另一例是社會運動，以下會針對這兩個面向來對此兩實例作分析。

（一）選舉可說，政治不可說

在研究者訪談的過程中，假若問到「你覺得民主是什麼」的時候，最常聽到的回答即是選舉。

「哎呀，民主喔，我不懂啦，我只是家庭主婦而已。那選舉算是你問的民主嗎？」（A08）

「民主喔，我覺得投票就是一種民主的展現啊」（A05）

以上兩位受訪者都屬於本研究中的年長世代，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選舉或投票，這和之前幾個研究的結果非常類似。比如說第四章關於報紙的新聞分析，選舉或投票也是詞頻相當高的詞彙。就這點來說，常民的關於民主的社會再現實際上相當接近於專家的想法，或許這仍是現代民主社會中，最容易對於政治事件表達自己意見的一種方式，因而和「民主」概念連結得相當緊密。

至於在 A02 和 A03 等壯年世代，或是 A07 等青年世代中，則多半會提到爸媽希望他們投票時，會投給爸媽自己覺得好的候選人，雖然這樣說，孩子們通常不一定就會照做。但我們先來看看以下年長世代的訪談：

「R：當時這樣子的話你你會不會跟你的女兒，會不會跟他們討論跟政治或是跟民主有關的議題？

I：沒有，在家裡時連討論的想法都沒有」（A05）

「其實不會，我根本就不會和我的兒子女兒們討論這些事情。他們在學校就都學過啦，而且也沒什麼好討論的」（A06）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為人父母的那一輩，都不太會在家裡跟小孩談論關於政治或民主的事。那麼壯年世代或是青年世代呢？他們的爸媽會跟他們討論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嗎？

「我爸那個時候想要調的時候，是我聽家裡長輩說去拜託議員，然後是因為是國民黨議員，所以有一部分我們家會是藍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南部人說你欠人家人情，對，然後之所以是國民黨，因為好像也是他跟我們家的某個親戚，可能是叔公那一輩是有認識，反正有辦法靠關係，然後請他出來喬找工作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家是藍的的原因是這樣。但是我覺得這已經是我們小時候，父母親跟我談論到政治的極限了，只有在他們投票的時候或者選舉的時候，會說他們支持國民黨，但是聽他們說會投哪個候選人，就是因為候選人是國民黨的而已……

我其實都一直覺得我們家不太談政治，所以我小時候也會覺得，在我比較涉入公共事務之前，我都還是覺得像政治就類似這樣子：抽煙賭博，然後打麻將都是不好的那種。所以不好的東西你不會去看，就像你不會去碰菸，不會去碰，這正是這種東西。所以我一直都覺得，不談政治才是對的。盡量不要談到跟政治有關的事情。就是說我覺得這是一個氛圍，因為我們家幾乎不太會談這件事情，即便是碰到選舉，感覺家人們都很有個共識要看顏色投，因為這個一直影響到我第一次可以選總統，在 2008 年那個時候，我覺得反正我就是要投馬英九。好像這才是正確答案一樣。」（A04）

「說真的，其實在家裡，我爸媽根本就不會跟我們討論這種事情，他們會覺得討論這種事情很無聊、沒有什麼用，還不如多花點時間去看書比較實在，最好是不要去管什麼政治的事情」（A01）

從以上的訪談可以發現，基本上青年世代與壯年世代的爸媽也不會和他們討論民主或政治議題，會覺得沒什麼用、無聊、討論那個幹嘛、最好是不要管，甚至把它說成像是菸、賭博等等不好的東西。頂多會在選舉或投票時提一提而已。

綜合以上的說法，我們可以發現，基本上父母輩是不太會和小孩討論政治或民主相關話題的，除非在選舉的時候，而小孩輩的也確實感受到父母親不太和他們討論這些事情，甚至都將政治淀錨在負面評價，和媒體對於政治的再現所呈現出來的負面價值相符合。另外一個有關的經驗，則是當研究者在尋找受訪者時，很多年長世代（也傾向於是閩南族群）的受訪者在聽了我的研究主題後，就婉拒了我的訪談，但是我在接觸其他兩個世代的受訪者則未曾發生過類似情況。這種不敢、不想談論政治的現象，似乎是臺灣閩南人年長世代的一種常態，而這有什麼意涵呢？根據宋文里（1995, p. 2）對這種言說情態的說法：「『諱』是一種極為弔詭的語言，表面上它似乎是在說不存在，但這種不存在，卻暗指著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另一種存在情態——我們似乎都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但我們不太能多說」。「諱言政治」在本研究裡相當明顯，而且似乎只和某些族群和某些世代有關。我們要了解這種現象，似乎仍得回到台灣本身的歷史脈絡去尋找，那就是「白色恐怖」時期。臺灣自 1949 年實施戒嚴後，隨即通過《懲治罪犯條例》，此《特別法》對於與當局意見不同者可橫施迫害。因為本文中的年長世代都經歷過那個時代，即便不是親身體驗，但也都在關於政治的再現裡，烙下了深刻的痕跡，就像「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的說法所反映的一樣，也正如 Markova（2004）所提出的，對於經歷過威權統治的人而言，信任的反義就是害怕。

（二）社會運動不可說也不可作

接續上一節的討論，雖然對於政治有「諱言」現象存在，但是他們並不避諱討論選舉。然而作為另一種意見表達方式，亦即走上街頭參加社會運動，則多半會遭到父母輩的反對，某種情況下，仍是因為上一節所提及的「白色恐怖」的歷史陰影。好比說，壯年世代的受訪者提及：

「我媽媽會一直跟我說民進黨是不好的。所以那時候我偷偷上台北參加社會運動的時候，根本就不敢告訴她。但是她後來好像有在電視上看到我吧……就打電話來把我臭罵了一頓。還說我是不是上台北後就交了什麼壞朋友，怎麼會去參加什麼社會運動之類的」（A015）

「R[26]：所以他們有曾經透露過不希望你去那些運動的現場嗎？

I[27]：有，因為我有一次在蘋果要被賣給練台生的時候，就是我跟朋友去蘋果日報的那邊抗議，然後因為好像反正有被某些新聞媒體拍的，但因為這件事我也沒有跟家裡講，我去給他們是看到，他們有就打電話來，就說是怎麼發現那個地方，然後覺得他們也沒有很直接的說壞或是好，但是就覺得他們希望就把書念好就好了，盡量不要去搞有的沒的。」（A04）

另外，年長世代的受訪者言論似乎更激烈：

「其實從來都沒有什麼學運、學生運動，學生們自己哪會站出來去爭取那些有的沒的，什麼服貿，複雜得要死，連我都搞不懂。他們怎麼可能會搞懂？然後還集結了一群人要上街頭去抗爭、抗議，這不是吃飽太閒嗎？學生不就是乖乖地在學校裡面唸書就好了嗎？有需要學政客們出來街頭拋頭露面嗎？我跟你說啦，那些學生都是受到政治人物們的煽動，尤其是民進黨的那些人，你沒看他們好多人都有去聲援嗎？我看都是蔡英文派去的……」（A06）

[26] 表示研究者提問，之後也以相同代號表示訪談中的研究者提問。

[27] 受訪者的回答，之後也以相同代號表示訪談中受訪者的回答。

DOI:10.6814/NCCU201901151

「R：那你會覺得說，因為像臺灣這幾年來有發生過一些比較大的抗議活動，比如說 318 學運之類的，你會覺得說這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常態還是怎麼樣的？

I：我認為它能夠受到某些人的操控，你知道嗎？才會這樣子，並不是他們想要的，並不是他們想參加的，並不是他們自己那學生想要的，都被被操控對不對？

我認為破壞就是不對，不應該去破壞公物。我意思是兩個層次，第一個是說人不應該去參加抗議活動，還是說抗議活動應該在民主的社會，這是兩件事。我看了覺得他們受到別人的利用，然後或者是他本身要知名度去搞驅動，它才有上鏡頭、知名度很多種因素的。像這活動就像在說我們是善良百姓人士，所以根本就不會去參加」（A05）

從以上的訪談，我們可以知道：首先，他們都認為學生是無知的、沒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會走上街頭都是因為被政治人物所煽動。對照他們自身的泛藍政黨立場，自然都會覺得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煽動的，甚至還直指蔡英文的名字。再者，社會運動或許可以容忍它發生，但是善良老百姓（如受訪者）是不會去參加的。最後，則是對於暴力的零容忍，年長世代的人他們會認為社會運動中出現暴力根本就不可以。另外，我們也可以發現再現具有區分我群和他群的作用（Howarth, 2006），比如說 A05 就說：我們是善良老百姓，所以根本不會去參加，這說法不但將我們與他們分開，而且還將正面意涵的標籤貼到自己身上。還有 A05 在評論學生運動時，有相當激烈的情感投入，基本上是鄙視那群參加運動的人、以及所謂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的。換句話說，當你在以再現區分我群和他群時，實際上也會投入強大的情感，這也是 Winnicott 在理論上提醒過我們的。

綜合以上兩小節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年長世代來說，在受訪者當中的閩南族群[28]似乎因為「白色恐怖」的陰影，而對於政治相關議題頗有忌諱，進而對於社會運動有負面觀感，基本上也不會和下一代討論相關的議題。但是泛藍政黨傾向的受訪者們，似乎較不忌諱，但他們也對社會運動抱有負面觀感，而且也會強調禮貌和善良等特定的價值，而這和第四章關於《聯合報》之新聞報導的再現，有極大的類似程度。

六、暴力：讓傳統與現代碰頭

上一節，我們提到年長世代因族群和政黨傾向的不同，而對於政治議題有不同看法，但對於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都抱持負面觀感，尤有甚者，泛藍傾向的

[28] 這裡的「閩南族群」應是日常語言中所指的「本省人」。由於受訪者當中的「本省人」實際上沒有包含客家人、原住民或其他少數族裔，但可以明顯辨認的就是閩南族裔，因此本文是以寫實報導的方式下筆的。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年長受訪者都會對於政治中的暴力表示鄙視。我們可看下一例：

「怎麼可以打人呢？打人就是不對的，你看在議會裡面打人，成何體統？暴力就是需要被譴責的。所以你看太陽花學運，那時候那些學生們衝進去立法院，破壞了很多東西對不對？我覺得這就是暴力，無論如何就是不可以有暴力，我們人要理性、要守規矩、要有水準，學生也是一樣啊，你說對不對？你不守規矩的話，不就天下大亂了。所以不應該太過自由，現代的社會就是太自由了」（A09）

「我小時候長大的地方是非常安全，非常安靜，然後很平安，我覺得人民過度的自由很不好，我可能有點約束，因為我覺得我們以前那種生活就是它就是很安心，你不用擔心有的沒的，因為管得嚴，然後慢慢自然開放自由，我就覺得因為言論太自由了，然後無限上綱這樣很紛亂。R：所以你覺得最好有一點管制是會比較好？

I：因為人一定是越自由越紛亂，然後變得沒有節制，然後不懂感恩，然後就是無限上綱。」（A08）

以上是年長世代對於社會運動或國會殿堂中暴力的看法，以及另一位受訪者認為需對於自由有所限制，否則會很亂。

以下，我們再來看看青年世代和壯年世代們的說法：

「我光用口頭沒有辦法，沒有辦法表達我的意見，這時候暴力是可以。就可以。

R：就是說你覺得民主社會可以存在像這樣的抗議的形式，或者是發聲管道存在？

I：如果是在一個權利不均等的情況下，應該要可以容許暴力。這樣的目的，是我覺得比較像是讓其他地方的人，可能其他國家的人也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方向的事情，可能將會帶來改變、這樣比較有機會，因為前提就已經是我們不平等。但這畢竟不是一個好方法，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去使用暴力，對，但是我意思是說可能對方還是有比你大的權力，而且甚至它去侵害你的權利的時候，這種暴力應該是可以。因為這個是面臨權力不均的狀況，但如果是說在一個立法院的裡面，大家都立法委員，基本上我們全是相同的，這時候暴力就不可以被允許的。」（A12）

「我覺得可不可以有暴力要看情況耶，今天如果是說，對方權力比你大，比如是政府、或國家，然後他侵害了你的權利，但是你又沒有其他發聲管道或辦法的時候，那我覺得就可以允許暴力，畢竟那可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能是你能想到的最後辦法了，而且其實那是你的權利。但如果是，阿，立法院的話，因為大家基本上應該可以理性溝通，所以這時候應該就不需要依靠暴力來表達訴求吧」（A14）

原則上，青年世代和壯年世代，此兩個世代對於社會運動中是否可以有暴力的共識相當高，都是認為在權力不均等的情況下，是可以容許的（也就是在表達「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觀念）；反之，在權力相等的情況下，原則上可以理性溝通，而且發聲都是個人的基本權利。

言及此，讓我們回到西方國家對於自由主義式民主的基本要素之看法：法治、選舉、政府的課責性和公民社會。我們可以發現，青年世代和壯年世代對於民主的再現都與這定義相當貼合，甚至還會特別強調保障人權的部分。但是年長世代似乎偏好順服的價值觀，同時也希冀人們以符合有禮貌與守規矩的規範來互動。這些表達在在都讓我們走進了傳統性與現代性對立的研究傳統，總地來說，傳統性展現在五個面向：遵從權威、孝親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優越；而現代性則展現在另五個面向：平權開放、獨立自顧、樂觀進取、尊重情感、兩性平等（高旭繁 & 楊國樞, 2011）。我們可以發現，至少顯現在民主此議題的面向，青年世代都極偏向現代性，而年長世代都極偏向傳統性，至於壯年世代，某種程度上似乎在這兩者之間游移，但是通常的傾向，仍舊和青年世代較為接近。

七、兩個文化傳統碰頭了，然後呢？

從上一節我們可以知道，其實對於民主作為一種社會再現，因為世代的差異，而牽引出背後不同的文化傳統的碰頭，主要是中國傳統性與西方現代性。但這兩種文化碰頭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從本文的訪談內容，或許有一個側面可觀察：

「我個人其實是很民主的，你看我的小孩想做什麼事情就讓他去做，我也不會限制他，反正他遇到困難再回來找我就好了」（A10）

「你看，我女兒自己一個人就跑去機場，只說要和朋友去玩。結果我們去送機的時候，才發現哪有什麼朋友啊，根本就是她要去澳洲打工。那我也沒說啥啊，倒是他媽媽比較捨不得。你看，這其實就是民主嘛，我非常尊重她的意見，她想幹嘛就去幹嘛，不需要管太多嘛，她高興就好，只要不去做壞事、奉公守法都好」（A05）

「其實我爸媽也算滿民主的耶，當初我說要去念某某系，雖然不太能賺錢，但他們也都沒有說話，就說我想念就去念吧。我覺得這也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是一種民主吧」（A14）

這個例子非常有趣，因為我們一直把民主淀錨在政治學的領域、或者說公共領域，但是這個例子卻都將民主放進私領域、或至少是個體層面來理解，而且不管是年長世代或壯年世代都覺得可以如此理解，比如說：民主是一種人格特質（我很民主）、民主是一種互動關係（我尊重她的想法）等等。

這似乎還是一個未曾在所謂民主理論、或是政治哲學出現過的關於民主的再現。我們稍微回到第三章的討論，當討論到民主的時候，可以發現中國本無民主概念，只有民治概念，以前的民主甚至還指涉「民之主」，與現代的想法正好顛倒，因此與現代民主有關的再現很晚才出現。對於年長世代來說，他們以前所受的要求都是要孝順父母、不要違逆父母、以父母的意見為主，但面對新的世代時，似乎也開始改變與他們小孩的互動方式，畢竟社會確實是一直在朝向現代性的方向前進中，若不改變的話，可能會造成溝通不良。這時候，原本來自西方的民主概念就被拿來使用了，變成尊重他人意見的一種再現。它似乎已脫離了原先的幾種言說脈絡：政治學、公領域、官方說法，而打開了一個新的語意空間或價值空間，而這應該就是為了因應社會從傳統性過渡到現代性，以及為了和下一代互動所致。某種程度上，這就回到了社會再現的主要功能，就是促進溝通，以及讓溝通成為可能（Moscovici, 1988）。

八、小結

本章主要從訪談資料中，主要是想瞭解關於前面兩個研究（媒體再現與抽象再現）較難探索的面向，比如說：再現會受到父母、同儕及新舊媒體的影響，現實中的民主與理想中的民主雖有差異，但後者仍可由制度和人為努力而達致，且兩者都讓人有正面感受而有所期待，以及民主作為一種社會再現時，選舉可說但政治不可說、以及社會運動不可說也不可做。隨後討論到社會運動的時候，三個世代對於社會運動時所發生的暴力行為，似乎剛好讓兩種文化傳統碰了頭。以及我發現了一個，基本上不曾在專家學者之民主理論出現過的一種關於「民主」的社會再現：和人格特質與互動關係有關的再現。再更進一步來說，這不只是兩個文化傳統的碰頭，還是「公領域」和「私領域」的碰頭，也是「客觀報導」和「個人價值觀」碰了頭。因為通常大眾媒體並不關心日常生活中涉及「民主」的語意空間，還會將摒棄私領域的報導內容美其名為「客觀報導」，但實際上，民主作為政治文化的一個面向，就會與一般人的價值觀有所關連，比如說：都期待臺灣變得越來越好，而且實際上也可能變得越來越好。

另外，我還想在這個基礎上說些話。以傳統性來說，基本上說的都是家庭裡面的關係，原則上是鞏固家庭關係，而非鞏固現代的國家。所以對於年長世代來說，他們心中的家庭並不在一個現代的國家制度下，他們心中的國與家是分開的——以書寫語言的形式來表示，可寫成「家國」——原則上一家之主只

DOI:10.6814/NCCU201901151

要把家顧好即可，可以不用管國事也沒關係。所以為何年長世代要常常強調自己很民主呢？因為他原本是像君王一樣，可以完全依自己的想法行事，但是現在卻要去尊重下一代的意見，而這和他所熟悉的傳統文化是完全相違的。但是年輕世代與壯年世代的「家/國」想像則不然，因為他們接受了現代性的洗禮，所以瞭解「家必然是在國之中」，唯有國才能保衛本身的家。更進一步來說，所謂政治的語意空間乃是和個人切身價值有關，好比說：為人父母者，通常關注如何維持自身家庭的運作，所以會將注意力放在經濟面、以及和家庭有關的私領域；反之，在臺灣的社會脈絡下，為人子女者，通常無需關注該如何維持家庭的運作，因而可投注心力在政治的理想面、精神面和與政治體制有關的公領域。雖然切身價值各有差異，但從社會整體的觀點來看，這兩種價值觀的相互配合，其實也顯現出整體社會得以賴此而持續，並得以發展下去。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1151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英國文化研究大師 Raymond Williams 在《關鍵詞》一書中指出：「民主」的中心概念難以釐清，一來是「民主」的意涵，從十九世紀前負面的群眾暴力轉向現代的保障人民權利與自由，二來是歷來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都宣稱他們代表「民主的真諦」，但其中多數是以「民主」之名來行「威權」之實、或僅為了獲得個人的政治利益、而非公共利益（Williams, 2003）。

在學術界，對於「民主」一詞所指涉的觀念仍眾說紛紜，且臺灣內部的社會變遷也加劇時，臺灣人究竟是如何思考「民主」的？或說，「民主」作為一種社會再現，它會被怎樣使用？理想的「民主」與現實的「民主」是否有所差異？以及理想的「民主」體制是否可以達成？這是本研究企圖以「社會再現」作為出發點而啟動的觀察和詮釋。

在進入本論文的理論回顧前，先說明本研究對於人的預設是人有其歷史性，這個歷史性可從三個層面來看（Aron, 1987）：其一是「人活在歷史中」，亦即活在臺灣民主化歷程的歷史中；其二是「人生就是歷史性的」，這意思是說，人會受到他所生存的歷史環境所影響；最後，則是人就是歷史，意思就是說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一種因應現實環境的冒險，就像民主這個概念在兩千五百年前的雅典迸生出來，而發展至今是一樣的。

本論文在基本上援引的乃是法國社會心理學家 Moscovici 所發展的「社會再現理論」（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社會再現」的最主要意涵就是對於當代日常知識與共同知識的探究，可將其視為「當代社會的常民想像」，而這個「想像」的對象可能是一個概念、一種理論或是一種生活空間的樣態。職是之故，這已擴充了原本 Moscovici 所關心的原初意涵（亦即由科學概念轉變而來的日常知識），因此本文稱此較為廣泛的觀點為「社會再現取向」，或也可稱為「後－莫斯科维奇」（post-Moscovici）取向。至於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欲比較的三個群體，就是三個不同世代的臺灣人。同時也由於社會再現本身是個複雜的現象，所以我採取量化研究法與質性研究法組合並用的研究設計。本論文主要有三個經驗研究，分別呈現為三章，即第四章是關於媒體再現的部分，第五章為一般人關於去脈絡化的抽象再現，而第六章則是常民深度訪談之社會再現的部分，以下再對此三章作較詳細的綜述。。

第四章關於媒體再現的語料庫分析，基本上可幫助我們瞭解關於民主之媒體再現的內容，以及假若政治立場不同的話，是否在媒體再現的內容上有所差異。從詞頻分析來看，本研究發現高頻次詞彙可再依語意細分為六大類，主要有「地理區域、時間和事件」、「選舉與投票」、「國家、政府、國會與政黨」、「由人民統治」、「人權、法治與規範」、「經濟與媒體」等六類，其中第一類佔絕大多數的比

DOI:10.6814/NCCU201901151

例。從搭配詞分析來看，本研究指出以《聯合報》來說，搭配詞大致符合學者們所認可的「民主」必要要素，但似乎較缺少強調政府的歸責性與公民社會等部分。而《自由時報》中的「民主」之搭配詞似乎更偏向支持人民的權利，但其實也較缺少政府的歸責性。至於關鍵字脈絡分析，研究者發現政治立場不同，確實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再現。比如說：聯合報會有較多規範意涵及批判民進黨與讚揚中國的文章，而自由時報則對社會運動或是基本人權多所鼓勵，並賦予正面意涵。若與專家知識比較的話，就是某些層面會被凸顯，另某些層面會被隱藏。

至於第五章，就「事件排序」來說，青年世代與壯年世代的結果頗為接近，而且都認為「解除戒嚴」和民主最相關，但是年長世代則認為「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比「解除戒嚴」要來得和「民主」更相關，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於「投票」的感受度不同。對於年長世代而言，「總統直選」代表的是一種政治制度的主動參與及直接參與，這對於不一定參與過黨外運動，或只是在家看報紙、看電視的一般人來說，可能遠比解嚴的開放黨禁、報禁等措施更能感同身受。而「民主語意區分量表」的部分，則經由量表來設法探究情感意義的多向度，藉此顯示不僅在專家知識裡的民主本身之概念跌宕多變，實際上在常民言說中所展現的語意空間裡也是多種面向的。普遍來說，三個世代的共識是，民主具有正面意涵，像是有必要的、樂觀的、幸福的等等。而青年世代與壯年世代的共識則偏向人權、正義等與人權有的保障。其中，有多組詞語的偏向符合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日常知識，這可視為本量表所具有的內在效度；另外，有少數幾組詞語（像是很硬/很軟、儒家/道家、基督教/佛教）與一般人對於民主的日常知識不同，不但可指出在我們談論一個社會對象時，日常知識仍有其限制與無法顯現之處，也同時凸顯了本論文使用語意區分量表的目的，就是打開這些難以被媒體或日常知識所再現的維度。

第六章則以訪談內容的分析為主。在訪談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再現之發生與改變，主要來自於父母同儕和網路的影響。至於現實中的民主與理想中的民主雖有差異，但後者仍可由制度和人為努力而達致，且兩者都讓人有正面感受而有所期待。此外，與社會再現有關的兩個面向：說與做，展現在「選舉可說、政治不可說」以及「社會運動不可說也不可做」上。而在關於暴力的議題上，通常年長世代會認為暴力就是不應存在，不論是在日常生活或是社會運動中，但是青年世代和壯年世代則會認為要看情況區分，若在權力不均等的情況下，為了要表達自己的意見，可以允許暴力存在。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議題上，似乎讓兩種文化傳統碰頭，簡單來說，就是傳統性和現代性，通常年長世代較偏前者，而青壯年世代較偏後者。再更進一步來說，這不只是兩個文化傳統碰了頭，還是「公領域」和「私領域」的碰頭，也是「客觀報導」和「個人價值觀」碰了頭。最後，則是本研究浮現出一個新的再現，那就是「民主」作為一種人格特質或是互動關係，這可能是因為傳統性與現代性相互碰撞而產生的新再現。而更深層的脈絡，可能是對於「家/國」的想像不同。對於年長世代來說，現代國家和自己的家庭是分離的、不相干的，一家之主只要把家事打理好即可，在經濟情況允許的情況下，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換個國也無所謂[29]。對於年輕世代則不然，因為他們認為家就在現代的「國」中，唯有保障這個國家的存續，自己的家才會受到保護。更進一步來說，所謂政治的語意空間乃是和個人切身價值有關，好比說：為人父母者，通常關注如何維持自身家庭的運作，所以會將注意力放在經濟面、以及和家庭有關的私領域；反之，在臺灣的社會脈絡下，為人子女者，通常無需投注太多心力在如何維持家庭的運作，因而可以全心關注在政治的理想面、精神面以及與政治體制有關的公領域。總之，雖然切身價值各有差異，但從社會整體的觀點來看，這兩種價值觀的相互配合，其實也讓整體社會得以持續並發展下去。

要而言之，本論文主要探究三種再現：媒體再現、語意空間的抽象再現，以及常民的社會再現，後兩者的資料來源皆為常民，但在語意空間中未給予清楚的脈絡，而訪談則有較清楚的事件脈絡，所以兩者仍有不同。我們可以發現，媒體再現與其他兩者往往不同。首先，在私領域中，可能有許多和民主有關的語意空間和價值空間，可以說：個人的即是政治的，但是大眾媒體並不會談論這個面向。再者，在私領域中，政治或民主和價值或理想必是不可分離的，但是媒體報導總會忽略這種關連，或甚至以中立客觀的名義而避免談論。要之，關於民主的再現，對於常民而言，實際上可能關乎好的生活、好的未來，而不僅止於現在。但是媒體再現的通常只有過去與現在，而且也不引導正面意涵或價值，甚至反覆強調其負面意涵。但這同時也顯現出，常民仍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並非對於大眾媒體的內容與價值觀都會照單全收，甚至也能夠反過來批判大眾媒體，比如說：對於假新聞的反省。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首先，就語料庫分析而言，由於本文採取斷代式的分期，雖然可看出趨勢，但可能會錯失資料中銜接上的細微變化。另外，由於《自由時報》從 2003 年以後才電子化，再加上本文的歷史分期，因此只能以五年的資料作比較分析而已，這是後續研究可再補足之處。

再者，關於民主語意區分量表的部分，雖然本文主要是探究詞語的多義性（polysemy），亦即認知、情感、態度等意義的面向，但僅以「民主」一詞作為目標詞語，可能略顯單薄。另外，也可能造成在某些詞語（儒家/道家或是基督教/佛教）的連結上，因為缺乏更進一步的脈絡，而顯得較難以解釋，後續研究可考慮以網狀的目標詞語來探究。再者，由於本論文受限於網路問卷的形式，所以三個世代的受試者數量仍有相當差異，且職業也多半以學生為主，在後續研究上也許可平均分配三個世代的受試者人數，以及在抽樣時顧及職業類別的多樣分配。

最後，則是關於深度訪談的部分，雖然本文是以臺灣民主化的發展歷程來區分三個世代，然而像是要理解現代的國家這種知識與對於臺灣自身文化的瞭解，仍會與正式教育所教授的內容有關，因此後續研究可考慮以臺灣的中學教科書幾

[29] 「換個國」的實際經驗，對此世代來說，就是指從「日治」到「民國」。

DOI:10.6814/NCCU201901151

次重大修改的時間作為分期，或許更可清楚看到其中不同於媒體影響的另一面向轉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1151

參考文獻

王石蕃（1999）:《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王紹光（2010）:《民主四講》。北京：三聯書局。

何孟樺（2016）:《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何清漣（2019）:《紅色滲透 ： 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新北市：八旗文化出版。

吳乃德（2004）:〈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

吳乃德（2013）:〈導言：我們共同的故事〉。見胡慧玲 （主編）:《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新北市：衛城出版。

宋文里（1995）:〈「批判教育學」的問題陳顯〉。《通識教育季刊》（臺灣），2 卷 4 期，1-15。

宋文里（1998）:〈不信之信：超自然象徵與情感意義叢結〉。《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與社會科學》（臺灣），8 卷 1 期，84-100。

李酉潭（2011）:《自由人權與民主和平 ： 台灣民主化的核心價值》。臺北：五南出版社。

林意璇（2015）。《台灣報紙再現同性婚姻的語料庫與論述分析（2005-2014）》。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海樹兒攴剌拉菲（2007）:《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金耀基（1984）:《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臺北：時報文化。

紀慧君（2018）:〈從語料分析探究有機食物之媒體再現：三十年之意義與轉變〉。《中華傳播學刊》（臺灣），34 期，209-252。

范會芳（2009）:《舒茨現象學社會學：理論建構的邏輯》。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

高旭繁、楊國樞（2011）。〈華人心理傳統性與心理現代性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彰化師大教育學報》，19 期，1-11。

張明貴（2003）:《民主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

郭文平（2015）:〈字彙實踐及媒介再現：語料庫分析方法在總體經濟新聞文本分析運用研究〉。《新聞學研究》，125 期, ，95-142。

郭柏傑（2018）:《台灣新聞媒體中的基改食品》。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諭陵（2005）:《舒茲的現象社會學與教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陳雨君（2010）:《去政治化的政治 ： 台灣政治事件的敘事社會學分析》。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DOI:10.6814/NCCU201901151

黃信達（2017）:《政黨認同之世代差異：以國民黨與民進黨為例》。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彪（2014）:《中國式民主「論述」之初探》。臺北：致知學術。
熊月之（2007）:〈自由、民主、總統三詞彙在近代中國的翻譯與使用〉。Retrieved from http://jds.cssn.cn/ztyj/sxs/201605/t20160506_3325425.shtml
劉嘉薇（2018）:《臺灣民眾的媒體選擇與統獨立場》。臺北：五南出版社。
謝宗學（2003）:〈網際民主與審議民主之實踐：資訊化社會的桃花源村？〉。《資訊社會研究》，4 期，87-139。
謝政育（2007）:《「心理學」的社會再現：在台灣的初探》。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闕河嘉、陳光華（2016）:〈庫博中文獨立語料庫分析工具之開發與應用〉。見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Abric, J.-C. （1993）. Central System, Peripheral System: Their Functions and Roles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Papers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2*, 75-78.
Aron, R. （1987）:《雷蒙・艾宏：入戲的觀眾》。賴建誠譯。臺北：聯經。
Augoustinos, M., & Walker, I. （1995）. *Social Cognition: An Integrated Introduction* （1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aker, P. （2005）. *Public discourses of gay men:That's so gay.* New York: Routledge.
Barker, C. （2004）:《文化研究 ： 理論與實踐》。羅世宏譯。臺北：五南出版社。
Bauer, M. W., & Gaskell, G. （1999）. Towards a Paradigm for Research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9（2）, 163-186.
Bauer, M. W., & Gaskell, G. （2008）.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A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me for social psycholog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8（4）, 335-353.
Bell, D. （2009）:《民主先生在中國 ： 東方與西方的人權與民主對話》。孔新峰、張言亮譯。臺北縣：左岸文化出版。
Billig, M. （1990）. Rhetoric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I. Parker & J. Shotter （Eds.）, *Deconstructing Social Psychology* . London: Routledge.
Billig, M. （1991）. *Ideology and opinions: Studies in rhetor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Billig, M. （1993）. Studying the Thinking Society: Social Representations, Rhetoric, and Attitudes. In G. M. Breakwell & D. V. Canter （Eds.）,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OI:10.6814/NCCU201901151

Billig, M., Condor, S., Edwards, D., Gane, M., Middleton, D., & Radley, A.（1988）. *Ideological dilemma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king*.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Bourdieu, P.（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R. Nice, Tran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radbury, M.（2012）. *Representations of death: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New York: Routledge.

Bratton, M.（2010）. The Meanings of Democracy: Anchoring the" D-Word" in Af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21（4）, 106-113.

Bruner, J.（2018）:《教育的文化：從文化心理學的觀點談教育的本質》。宋文里譯。臺北：遠流出版社。

Carr, E. H.（2009）:《何謂歷史？》。江政寬譯。臺北：博雅書屋。

Chryssides, A., Dashtipour, P., Keshet, S., Righi, C., Sammut, G., & Sartawi, M.（2009）. Commentary: We don't share!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 approach, enactivism and the fundamental incompatibilitie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 & Psychology,* 15（1）, 83-95.

Clemence, A., Doise, W., & Lorenzi-Cioldi, F.（1993）.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Creswell, J. W., & Clark, V. L. P.（2010）:《混合方法研究導論》。謝志偉、王慧玉譯。臺北：心理出版社。

Dahl, R. A.（2006）《民主及其批判》。李培元譯。臺北縣：韋伯文化國際。

Diamond, L.（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oise, W.（1986）. *Levels of Explan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se, W.（1993）. Debating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G. M. Breakwell & D. V. Canter（Eds.）,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 J. D.（1970）.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In J. D. Douglas（Ed.）,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Towar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Douglas, M.（1986）. *How Institutions Think*. Londo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Duveen, G.（2000）. The Power of Ideas. In G. Duveen（E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Polity Press.

Duveen, G.（2001）. Genesis and Structure: Piaget and Moscovici. In F. Buschini & N. Kalampalikis（Eds.）, *Penser la Vie, le Social, la Nature*.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Duveen, G.（2013）. Culture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S. Moscovici, S.

DOI:10.6814/NCCU201901151

Jovchelovitch, & B. Wagoner （Eds.）, *Development as a Social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Duveen, G., & Lloyd, B. （1990）. Introduction. In G. Duveen & B. Lloyd （Ed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cheroth, G., Doise, W., & Reicher, S. （2011）. On the Knowledge of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How a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pproach Helps Us Rethink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32（5）, 729-758.

Emiliani, F., & Passini, S. （2017）. Everyday Life in Social Psycholog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7（1）, 83-97.

Farr, R. （1990）.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s Widespread Beliefs. In C. Fraser & G. Gaskel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y of Widespread Belief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arr, R. （1993）.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G. M. Breakwell & D. V. Canter （Eds.）,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lick, U. （1995）.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J. A. Smith, R. Harré, & L. V. Langenhove （Eds.）, *Rethinking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Foucault, M. （1992）:《規訓與懲罰 : 監獄的誕生》。劉北成譯。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Gadamer, H.-G. （1975）. *Truth and Method* （G. Barden & J. Cumming, Trans.）. 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Geertz, C. （2002）:《地方知識 : 詮釋人類學論文集》。楊德睿譯。臺北：麥田出版。

Gervais, M.-C., & Jovchelovitch, S. （1998）. *The health belief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England: A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y*. London: Health Education Authority.

Glaveanu, V. P. （2014）. *Thinking through Creativity and Culture: Toward an Integrated Model* （1 e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Gough, B., McFadden, M., & McDonald, M. （2013）. *Critical social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reenwood, J. D. （1994）. *Realism, identity and emotion: Reclaiming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Sage.

Greenwood, J. D. （1999）. From Volkerpsychologie to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once and future disciplin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2（4）, 503-514.

Höijer, B. （2011）.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Nordicom review,* 32（2）, 3-16.

Hachour, H. （2008）. *A Communicational Approach to collective Knowledge*

DOI:10.6814/NCCU201901151

Generation: Episteme and Prax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Knowledge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Orlando, United States. http://www.iiis.org/CDs2008/CD2008SCI/KGCM2008/PapersPdf/G790PW.pdf

Hepburn, A.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Sage.

Herzlich, C. （1973a）. *Health and illnes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erzlich, C. （1973b）. *Health and Illnes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D. Graham, Tra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ewstone, M., & Augoustinos, M. （1998）. Social Attributions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U. Flick （Ed.）, *The Psychology of the Social*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mmelweit, H. T. （1990）. Societal Psychology: Implications and Scope. In H. T. Himmelweit & G. Gaskell （Eds.）, *Societal Psycholog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Howarth, C. （2006）. A social representation is not a quiet thing: Exploring the critical potential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1）, 65-86.

Huntington, S. P. （2014）:《第三波 ：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臺北：五南出版社。

Jahoda, G. （1992）. *Crossroads between culture and mind: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i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aspars, J. （1986）. Forum and focus: A personal view of European Social Psych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1）, 3-15.

Jodelet, D. （1988）. Représentations Sociales: Phénomènes, Concept et Théorie. In S. Moscovici （Ed.）, *Psychologie Soci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Jodelet, D. （1991）. *Madness 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Living With the Mad in One French Community* （T. Pownall,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delet, D. （2008）.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 beautiful inven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8（4）, 411-430.

Jovchelovitch, S. （2007）. *Knowledge in context: Representations, community and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Kuhn, T. （2004）:《科學革命的結構》。王道還譯。臺北：遠流出版社。

Kurlantzick, J. （2015）:《民主在退潮 ： 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湯錦台譯。臺北：如果出版。

DOI:10.6814/NCCU201901151

Liu, J. H., Goldstein-Hawes, R., Hilton, D., Huang, L.-L., Gastardo-Conaco, C., Dresler-Hawke, E., . . . Abraham, S. （2005）.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events and people in world history across 12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6（2）, 171-191.

Liu, J. H., & Hilton, D. J. （2005）. How the past weighs on the present: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history and their role in identity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4（4）, 537-556.

Liu, J. H., & Sibley, C. G. （2015）. Representations of world history. In G. Sammut, E. Andreouli, G. Gaskell, & J. Valsiner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u, L. （2003）. *Quality of life in China: A social 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Unpublished PH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ászló, J. （2008）. *The science of stories: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Magioglou, T. （2014）. Introduction: Societal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Paris. In T. Magioglou （Ed.）, *Culture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a Societal Perspective*. Charlotte: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Markova, I. （2000）. Amédée or how to get rid of it: Social representations from a dialogical perspective. *Culture & Psychology,* 6（4）, 419-460.

Markova, I. （2004）. Introduction: Trust/risk and trust/fear. In I. Markova （Ed.）, *Trust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kova, I. （2016）. *The Dialogical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d, G. H. （1995）:《心靈，自我與社會》。胡榮、王小章譯。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Miller, P. H. （2008）:《發展心理學理論：從過去到現在》。程景琳、林慧資、胡肇勳譯。臺北：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Moscovici, S. （1973）. Foreword （D. Graham, Trans.）. In C. Herzlich （Ed.）, *Health and Illnes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Moscovici, S. （1976）. *La Psychanalyse, Son Image et Son Public* .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Moscovici, S. （1981）.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J. Forgas （Ed.）,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s on Everyday Understanding*. London: Academic Press.

Moscovici, S. （1984a）. The Myth of the Lonely Paradigm: A Rejoinder. *Social*

DOI:10.6814/NCCU201901151

Research, 51（4）, 939-967.
Moscovici, S. （1984b）.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R. M. Farr & S. Moscovici （Ed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scovici, S. （1988）. Notes Towards a Descripti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3）, 211-250.
Moscovici, S. （1989）. Des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 aux Représentations Sociales: Elements pour une Histoire. In D. Jodelet （Ed.）, *Les Représentations Socia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Moscovici, S. （1990a）. The Origins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 response to Michael.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8（3）, 383-388.
Moscovici, S. （1990b）. Social Psychology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Extending the Conversation. In G. Duveen & B. Lloyd （Ed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scovici, S. （1991）. New Problems for Social psychology in a New Europe. *European Bulletin of Social Psychology,* 2, 2-10.
Moscovici, S. （1993）. *The Invention of Society: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for Social Phenomena* （W. D. Halls, Trans.）. Oxford: Polity Press.
Moscovici, S. （1998）. The History and Actualit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U. Flick （Ed.）, *The Psychology of the Soci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scovici, S. （2000a）. Idea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 dialogue between Serge Moscovici and Ivana Marková.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oscovici, S. （2000b）. Society and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G. Duveen （E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Polity Press.
Moscovici, S. （2008）. *Psychoanalysis: Its Image and Its Public* （D. Macey,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oscovici, S., & Hewstone, M. （1983）.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Social Explanations: From the 'Naïve' to the 'Amateur' Scientist. In M. Hewstone （Ed.）, *Attribution Theory : Social and Functional Extensions*. Oxford: Blackwell.
Nora, P. （1996）. General introduction: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Lawrence D. Kritzman（Ed.）,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ora, P. （2012）:《記憶所繫之處》。戴麗娟譯。臺北：行人文化。

DOI:10.6814/NCCU201901151

Osgood, C. E., Suci , G. J., & Tannenbaum, P. H. （1957）.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hilogène, G. （1999）. *From Black to African American: A New Social Representation*.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Pickering, W. S. F. （1999）. What Do Representations Represent? The Issue of Reality. In W. S. F. Pickering （Ed.）, *Durkheim and Represent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Ritzer, G. （2000）:《社會學理論》。馬康莊、陳信木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de Rosa, A. S. d. （2013）. Research fields i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snapshot views from a meta-theoretical analysis. In A. S. D. Rosa （E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the 'Social Arena'* . London: Routledge.

Rose, R., Mishler, W., & Haerpfer, C. （1998）. *Democracy and its alternatives: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ress.

Rose, R., & Shin, D. C. （2001）. Democratization backwards: The problem of third-wave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2）, 331-354.

Sammut, G., Andreouli, E., Gaskell, G., & Valsiner, J. （2015）.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 revolutionary paradigm? In G. Sammut, E. Andereouli, G. Gaskell & J. Valsiner（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rtori, G.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Schutz, A. （1970）.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utz, A., & Luckmann, T. （1973）. *The Structure of the Life-World* （R. M. Zaner & H. T. Engelhardt,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en, A. K. （1999）.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10（3）, 3-17.

Shweder, R. A. （1990）. Cultural Psychology—What Is It? . In J. W. Stigler, R. A. Shweder, & G. Herdt （Eds.）, *Cultural Psychology: Essays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eagă, C. （2013）. *Political Psych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lman, C. （1994）. *Psychology, society and subjectivity: An introduction to German cr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Van Dijk, T. A. （1991）.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News as Discourse. In K.

DOI:10.6814/NCCU201901151

B. Jensen & N. W.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New York: Routledge.

Van Dijk, T. A. （1997）. 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the press. In A. Bell. & P. Garrett（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Mass. : Blackwell Publishers.

Wagner, W. （1998）.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beyond: Brute facts, symbolic coping and domesticated worlds. *Culture & Psychology,* 4（3）, 297-329.

Wagner, W., & Hayes, N. （2005）. *Everyday Discourse and Common Sen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Wagoner, B. （2017）. *The Constructive Mind: Bartlett's Psychology in Reconstruc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 （2003）:《關鍵詞 ： 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劉建基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Winnicott, D. W. （2009）:《遊戲與現實》。朱恩伶譯。臺北：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1901151

附錄一

「民主」語意區分量表

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撥空參與這項研究問卷，您的熱心填寫將對台灣政治文化的未來發展有所助益。

本研究是關於「一般人對於民主之想法」的學術研究問卷，期望能瞭解台灣人如何理解民主、及其意義何在，以作為後續學術研究的參考。

為確保您的個人權益，本問卷採匿名方式進行，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分析使用。請您放心根據自己的想法來填答，並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

指導教授：方孝謙博士、宋文里博士

博士候選人 謝政育 敬上

E-mail：g914806@gmail.com

備註：若為有效問卷，即可參加100元現金抽獎共5份，請踴躍填答，謝謝。

*必填

一、個人基本資料

1. **1.**年齡 *

單選。

- ◯ 20歲以下
- ◯ 21~30歲
- ◯ 31~40歲
- ◯ 41~50歲
- ◯ 51~60歲
- ◯ 61歲以上

2. **2.**性別 *

單選。

- ◯ 女
- ◯ 男

3. **3.18**歲以前居住區域 *

單選。

- ◯ 北部區域（包括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桃園市、新竹縣及宜蘭縣）
- ◯ 中部區域（包括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
- ◯ 南部區域（包括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
- ◯ 東部區域（包括花蓮縣及臺東縣）
- ◯ 外島（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 ◯ 其他

4. **4.**目前居住區域 *

單選。

- ◯ 北部區域（包括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桃園市、新竹縣及宜蘭縣）
- ◯ 中部區域（包括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
- ◯ 南部區域（包括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
- ◯ 東部區域（包括花蓮縣及臺東縣）
- ◯ 外島（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 ◯ 其他

5. **5.**職業類別 *

單選。

- ◯ 學生
- ◯ 軍公教
- ◯ 服務業
- ◯ 金融業
- ◯ 資訊／科技業
- ◯ 傳播/廣告/設計
- ◯ 藝文
- ◯ 自由業
- ◯ 醫療
- ◯ 製造業
- ◯ 農林漁牧
- ◯ 家管／退休
- ◯ 其他：_____

6. **6.**是否曾修習過政治學相關課程？ *

單選。

- ◯ 是
- ◯ 否

7. **7.是否有政黨偏好？** *

單選。

- 是，偏好國民黨
- 是，偏好民進黨
- 是，偏好時代力量
- 是，偏好社民黨
- 是，偏好其他泛藍政黨
- 是，偏好其他泛綠政黨
- 無政黨偏好

請跳到第 8 題。

二、事件排序

8. 請從下列十個事件中，依序排出您覺得與「民主」最有關連性之事件，最相關者請排第一、次相關者請排第二、**.....**並依此類推。本題並無標準答案，請依照您的想法作答即可。（溫馨提醒，若您無法一次看到十個欄位，題目下方有拖曳條可右移調整） *

每列請僅選取一個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第一次政黨輪替	◯	◯	◯	◯	◯	◯	◯	◯	◯	◯
2.野百合學運	◯	◯	◯	◯	◯	◯	◯	◯	◯	◯
3.太陽花學運	◯	◯	◯	◯	◯	◯	◯	◯	◯	◯
4.中華民國憲法施行	◯	◯	◯	◯	◯	◯	◯	◯	◯	◯
5.自由廣場更名	◯	◯	◯	◯	◯	◯	◯	◯	◯	◯
6.李登輝繼任總統	◯	◯	◯	◯	◯	◯	◯	◯	◯	◯
7.民進黨成立	◯	◯	◯	◯	◯	◯	◯	◯	◯	◯
8.解除戒嚴	◯	◯	◯	◯	◯	◯	◯	◯	◯	◯
9.凱達格蘭大道更名	◯	◯	◯	◯	◯	◯	◯	◯	◯	◯
10.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	◯	◯	◯	◯	◯	◯	◯	◯	◯	◯

請跳到第 9 題。

三、意義量表

請根據您的感覺，從以下的對比詞組中，選擇您認為「民主」較接近哪個意思？

9. **1.** *

單選。

	1	2	3	4	5	6	7	
有必要	◯	◯	◯	◯	◯	◯	◯	無必要

10. **2.** *

單選。

	1	2	3	4	5	6	7	
很理智	◯	◯	◯	◯	◯	◯	◯	情緒性

11. **3.** *

單選。

	1	2	3	4	5	6	7	
樂觀	◯	◯	◯	◯	◯	◯	◯	悲觀

12. **4.** *

單選。

	1	2	3	4	5	6	7	
有力	◯	◯	◯	◯	◯	◯	◯	軟弱

13. **5.** *

單選。

	1	2	3	4	5	6	7	
很熱	◯	◯	◯	◯	◯	◯	◯	很冷

14. **6.** *

單選。

	1	2	3	4	5	6	7	
潔淨	◯	◯	◯	◯	◯	◯	◯	骯髒

15. **7.** *

單選。

	1	2	3	4	5	6	7	
變化	◯	◯	◯	◯	◯	◯	◯	穩定

16. **8.** *

單選。

	1	2	3	4	5	6	7	
幸福	◯	◯	◯	◯	◯	◯	◯	悲傷

17. **9.** *

單選。

	1	2	3	4	5	6	7	
有意義	◯	◯	◯	◯	◯	◯	◯	無意義

18. **10.** *
單選。

	1	2	3	4	5	6	7	
很硬	◯	◯	◯	◯	◯	◯	◯	很軟

19. **11.** *
單選。

	1	2	3	4	5	6	7	
自由	◯	◯	◯	◯	◯	◯	◯	束縛

20. **12.** *
單選。

	1	2	3	4	5	6	7	
很健康	◯	◯	◯	◯	◯	◯	◯	不健康

21. **13.** *
單選。

	1	2	3	4	5	6	7	
光明	◯	◯	◯	◯	◯	◯	◯	黑暗

22. **14.** *
單選。

	1	2	3	4	5	6	7	
相信	◯	◯	◯	◯	◯	◯	◯	懷疑

23. **15.** *
單選。

	1	2	3	4	5	6	7	
快捷	◯	◯	◯	◯	◯	◯	◯	緩慢

24. **16.** *
單選。

	1	2	3	4	5	6	7	
服從多數人的意見	◯	◯	◯	◯	◯	◯	◯	尊重少數人的意見

)01151

25. **17.** *

單選。

	1	2	3	4	5	6	7	
保障人權	◯	◯	◯	◯	◯	◯	◯	保障安全

26. **18.** *

單選。

	1	2	3	4	5	6	7	
追求正義	◯	◯	◯	◯	◯	◯	◯	維護公平

27. **19.** *

單選。

	1	2	3	4	5	6	7	
臺灣	◯	◯	◯	◯	◯	◯	◯	美國

28. **20.** *

單選。

	1	2	3	4	5	6	7	
臺灣	◯	◯	◯	◯	◯	◯	◯	中國

29. **21.** *

單選。

	1	2	3	4	5	6	7	
臺灣	◯	◯	◯	◯	◯	◯	◯	香港

30. **22.** *

單選。

	1	2	3	4	5	6	7	
民主進步黨	◯	◯	◯	◯	◯	◯	◯	中國國民黨

31. **23.** *

單選。

	1	2	3	4	5	6	7	
舊型大黨	◯	◯	◯	◯	◯	◯	◯	新興小黨

32. **24.** *

單選。

	1	2	3	4	5	6	7	
選舉	◯	◯	◯	◯	◯	◯	◯	罷免

33. **25.** *

單選。

	1	2	3	4	5	6	7	
人人皆可投票	◯	◯	◯	◯	◯	◯	◯	某些人才可投票

請根據您的感覺，從以下的對比詞組中，選擇您認為「民主」較接近哪個意思？

34. **26.** *

單選。

	1	2	3	4	5	6	7	
票票等值	◯	◯	◯	◯	◯	◯	◯	票數可依情況（如：性別、族群、.....等）加權

35. **27.** *

單選。

	1	2	3	4	5	6	7	
拼經濟	◯	◯	◯	◯	◯	◯	◯	堅守主權

36. **28.** *

單選。

	1	2	3	4	5	6	7	
保障自由	◯	◯	◯	◯	◯	◯	◯	遵守法律

37. **29.** *

單選。

	1	2	3	4	5	6	7	
直接選舉	◯	◯	◯	◯	◯	◯	◯	間接選舉

38. **30.** *

單選。

	1	2	3	4	5	6	7	
憲法	◯	◯	◯	◯	◯	◯	◯	公投

39. **31.** *

單選。

	1	2	3	4	5	6	7	
營利媒體	◯	◯	◯	◯	◯	◯	◯	非營利媒體

40. **32.** *

單選。

	1	2	3	4	5	6	7	
大眾媒體	◯	◯	◯	◯	◯	◯	◯	小眾媒體

41. **33.** *

單選。

	1	2	3	4	5	6	7	
新媒體（如：網路）	◯	◯	◯	◯	◯	◯	◯	舊媒體（如：電視、報紙、廣播）

42. **34.** *

單選。

	1	2	3	4	5	6	7	
菁英決策	◯	◯	◯	◯	◯	◯	◯	庶民決策

43. **35.** *

單選。

	1	2	3	4	5	6	7	
社會運動	◯	◯	◯	◯	◯	◯	◯	民意信箱

44. **36.** *

單選。

	1	2	3	4	5	6	7	
符合共同利益	◯	◯	◯	◯	◯	◯	◯	維護良善民風

45. **37.** *

單選。

	1	2	3	4	5	6	7	
完美的制度	◯	◯	◯	◯	◯	◯	◯	夠好的制度

46. **38.** *
單選。

	1	2	3	4	5	6	7	
可供選擇的制度	◯	◯	◯	◯	◯	◯	◯	不得不然的制度

47. **39.** *
單選。

	1	2	3	4	5	6	7	
大勢所趨的制度	◯	◯	◯	◯	◯	◯	◯	需努力追求的制度

48. **40.** *
單選。

	1	2	3	4	5	6	7	
暴力抗爭	◯	◯	◯	◯	◯	◯	◯	非暴力抗爭

49. **41.** *
單選。

	1	2	3	4	5	6	7	
抵抗權威	◯	◯	◯	◯	◯	◯	◯	順從權威

50. **42.** *
單選。

	1	2	3	4	5	6	7	
儒家	◯	◯	◯	◯	◯	◯	◯	道家

51. **43.** *
單選。

	1	2	3	4	5	6	7	
基督教	◯	◯	◯	◯	◯	◯	◯	佛教

52. **44.** *
單選。

	1	2	3	4	5	6	7	
規劃未來遠景	◯	◯	◯	◯	◯	◯	◯	彌補歷史錯誤

53. **45.** *

單選。

	1	2	3	4	5	6	7	
帶來創新	◯	◯	◯	◯	◯	◯	◯	維護傳統

54. **46.** *

單選。

	1	2	3	4	5	6	7	
政策執行的效率	◯	◯	◯	◯	◯	◯	◯	政策執行的周延性

55. **47.** *

單選。

	1	2	3	4	5	6	7	
提高國民所得	◯	◯	◯	◯	◯	◯	◯	保障最低收入

抽獎聯絡方式

您好：若您想參加抽獎，可請您留下聯絡方式，研究者之後會與您聯絡，謝謝。

56. 是否想參加抽獎？ *

單選。

- ◯ 是　*請跳到第 57 題。*
- ◯ 否　*請停止填寫此表單。*

請留下您的姓名與聯絡方式

57. 姓名或暱稱 *

_____

58. 手機或**email** *

_____

技術提供：
Google Forms

DOI:10.6814/NCCU201901151

附錄二

訪談大綱

1. 請簡述一下個人的生命史，比如說：來自哪裡？目前住在哪裡？族群認同？是否和家人同住？會討論相關的議題嗎？求學過程？等等。
2. 請問你覺得民主是什麼？它在追求什麼？它的價值何在？它可以帶來什麼好處？心中是否有一個理想的民主制度？若有的話，是什麼？這是一個純粹的烏托邦或是可以達致的嗎？這是一個需努力追求的制度？還是這是整個世界的大勢所趨？
3. 你覺得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嗎？為什麼它在你心目中是(或不是)民主國家？和你心中的理想相較，有何差異？
4. 你覺得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嗎？為什麼它在你心目中是(或不是)民主國家？和你心中的理想相較，有何差異？
5. 你覺得香港是一個民主地區嗎？為什麼它在你心目中是(或不是)民主地區？和你心中的理想相較，有何差異？
6. 你覺得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嗎？為什麼它在你心目中是(或不是)民主國家？和你心中的理想相較，有何差異？
7. 那生活在民主國家會讓你感到幸福嗎？為什麼？
8. 就個人的生命經驗而言，是否曾有某事件讓你突然意識到自己生活在民主社會？那是什麼感覺？或是否有某事件讓你覺得生活在民主的社會中真好？
9. 你覺得民主社會中的媒體應扮演何種角色？而目前台灣的媒體現況是否符合你的期待？而台灣的媒體會促進民主發展或是阻礙民主發展？
10. 你覺得民主制度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制度嗎？為什麼？那你是信任制度？還是信任政治人物？
11. 你覺得民主和經濟發展有沒有關係？若有的話，關係是什麼？
12. 你覺得民主是保障你有更美好的未來或是彌補過去的歷史錯誤？為什麼？
13. 你覺得民主制度是確保效率還是確保周延性？為什麼？
14. 你覺得民主社會中的抗議或社會運動是常態嗎？為什麼？

DOI:10.6814/NCCU201901151